

（美）迈克尔·夏邦斯 著  
吴晓文 译

# 东方的 经济改革

——从50年代到90年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世界经济论坛 ·

# 东 方 的 经 济 改 革

——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

[法] 贝尔纳·夏旺斯 著

吴波龙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的经济改革/(法)贝尔纳·夏旺斯著;吴波龙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6

(世界经济论坛)

ISBN 7-80149-127-0

I. 东… II. ①贝… ②吴… III.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IV. F1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803 号

本书出版列入法国的资助出版计划,并得到  
法国外交部以及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的大力支持

贝尔纳·夏旺斯是巴黎第七大学教授，擅长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作者在书中分析和归纳了东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并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从改革到转轨的各种进程中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比较分析。相信书中不少的独到见解定能开阔读者的思路，也使读者能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了解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看法。

# 《世界经济论坛》

## 总 序

80年代末,冷战的结束以及接踵而来的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巨变,使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冷战以及美苏两霸争夺局面的结束,至少暂时解决了战后闹得世界不得安宁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当前,尽管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仍然矛盾重重,但在政治上却失去了与之争夺的对手,世界比以前安定了许多。原苏联不仅因为其本身及原东欧国家社会制度的剧变而不复存在,而且它的继承者——俄罗斯也因为经济改革缺乏成就及国内民族纷争而至今不能完全摆脱危机的困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已经到达谷底。但是,它要想恢复到原苏联解体以前的实力,恐怕至少要等到2010年以后。尽管俄罗斯不会放弃它昔日称霸世界的梦想,但是至少在今后15年内无力使世界重新出现以往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局面。在这期间,国际上将逐步形成“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多个大国和国家集团并存,可以从多个方面制约美国的行动,从而更加以利于保持世界局势的相对稳定。尽管个别地区和国家之间或内部矛盾和斗争不时会激化,世界不会完全太平,但是还不至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对抗和战争,因而未来的世界将维持“局部动荡,大局稳定”的局面。

同时,世界经济自摆脱了90年代初的危机以来也已经进入了稳定增长的时期。30年代,世界经济曾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这个期间,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了以微电子、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为先导的信息革命,使它们率先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尤其是美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经济具有深刻的影响。它在80年代大力增加投资,发展包括集成电路、计算机软件、个人

电脑、光缆等在内的信息产业的同时,努力以信息技术装备和改造钢铁、汽车和化工等传统产业部门,使之逐步成为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从而使美国经济迅速从工业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在摆脱了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后,特别是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以后,率先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美国经济进入了强劲增长的时期。尽管美联储把2.5%的经济增长率和6%的失业率视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调控目标,但是199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高达3.8%,而失业率却下降到4.9%;公司利润从1990年的4000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70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由1991年的4.5%下降到1997年的1.5%,实现了所谓的“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并且经济形势继续看好。于是,无论是美国国内还国外,许多经济学家都乐观地把当前美国经济称之为“新经济”。不管这种称谓是否恰当,美国经济估计还将有一个较长的增长时期,并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与美国不同,日本和欧盟各国经济在摆脱了9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却困难重重,迟迟不能出现经济高涨的局面。其原因,除了它们在体制上多有缺陷,不能完全适应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外,主要是在80年代发展信息产业的同时,没有及时以最新的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因此,日本和欧盟各国想要走出经济困境,实现新的经济增长,必须及时调整它们的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有迹象表明,随着信息技术在世界的推广和普及,世界范围内将出现一个产业结构改革和优化的高潮。与此同时,自从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围绕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而发展起来的各种“清洁生产”等环保技术也将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极好的机遇。因此,有不少人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有人甚至预言,它将持续几十年。笔者虽然很难准确地说出

这个增长期将持续多少年,但是它至少可以维持到下世纪初。即使在世纪之交可能出现一次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但是经济下降的幅度将十分有限,远不足以中止世界经济的增长进程。

然而,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增长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而且挑战或许要大于机遇。因为在这一轮增长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因素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在经济中的广泛应用。而在信息技术等科技领域内,发展中国家不具有优势地位。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在国内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必定会把许多成熟的技术转移到基础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它们提供新的发展机会。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仍然要依靠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的急剧增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将不可避免地趋于扩大。同时,1997年7月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表明,东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体制上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严重障碍,随时可能陷于困境。可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本国的经济体制进行及时的、适当的改革,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消除经济发展中的隐患。尽管经过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东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技术上严重滞后,人们有理由怀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能否像以前希望的那样逐步接近和超过发达国家。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想有效地发展经济,唯有发展教育和科技,提高人的素质和经济发展的质量。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员。它的发展无疑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近2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仍然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艰巨任务。由于在这两个

转变方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不断地总结和自身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而且还应该认真地研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和教训。事实表明,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然而,由于我国过去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多、过细、过严的行政干预,使经济规律发生了扭曲,以至于很难从自身的经历中发现经济规律作用的轨迹。因此,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地总结和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经验和教训。因为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规律在那里受到尊重,可以比较充分地发挥作用。我们可以从它们的经验教训中找到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然后,结合中国本国的实际情况,将这些规律运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事业,就可能走出一条既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只要稍稍浏览一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农业发展道路、国有企业改革、科研发展与成果转化等等),都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过,并且已经得到解决的。我们只要总结它们的经验,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就可能比较顺利地解决难题,走出困境。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决定陆续推出《世界经济论坛》,希望把我国学者有关世界经济的力作(无论是有关历史问题的,还是现实问题的论著)汇集起来,为我国的经济领导部门和决策者、研究者等提供参考,希望它们能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事业作出一份贡献。

不仅如此,《世界经济论坛》,特别是其中有关热点问题的论著,由于它们对问题的全面的、系统的、精辟的分析,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问题产生的前因后果,把握其发展趋势。因此,它们也可以

成为工商业、外经贸以及外交事务从业人员把握国际形势、审时度势、规避风险、发展自己的工具。

总之,《世界经济论坛》是为各方面读者服务的。在这方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曾经为读者提供过许多很好的作品,我们相信,《世界经济论坛》将推出更多的优秀论著,以饯读者。

徐世

1998年7月12日于北京

# 目 录

引 言 .....	7
-----------	---

## 第一部分 传统的体制

第一章 制度的基石 .....	17
一、国有化和国家控制 .....	17
二、一党制 .....	19
第二章 集中化的计划管理 .....	21
一、全面的等级控制 .....	21
二、分级的目标管理 .....	22
三、用行政手段分配投入 .....	23
四、用行政手段规定价格 .....	23
五、预算的再分配 .....	25
六、控制工资基金 .....	25
七、单一银行制 .....	27
第三章 体制的其他要素 .....	31
一、农业集体化 .....	31
二、对外贸易垄断 .....	33

三、私有部门的次要地位.....	35
四、企业的单一领导制.....	35
<b>第四章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b> .....	37
一、“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模式.....	37
二、社会主义所有制.....	39
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39
四、计划管理.....	41
<b>第二部分 传统的调整</b>	
<b>第五章 先锋者波兰和落后者波兰(1956~1979)</b> .....	45
一、1956年10月和第一次改革浪潮.....	45
二、W.布鲁斯的分权模式.....	47
三、60年代.....	49
四、盖莱克的战略和大型经济组织.....	51
<b>第六章 老大哥走向现代化:苏联(1957~1985)</b> .....	55
一、地区经济委员会.....	55
二、1965年的改革.....	57
三、困境与周期重组.....	59
<b>第七章 一条独特的道路:东德(1963~1989)</b> .....	63
一、新经济体制.....	63

二、70年代的再度集中化·····	65
三、联合企业的体制·····	67

### 第三部分 激进的改革

<b>第八章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与非计划化 (1950 ~ 1964)</b> ·····	73
一、抛弃传统模式·····	73
二、一党制的变化·····	75
三、社会所有制与工人自治·····	77
四 附加值的分配·····	79
五、中央再分配的衰落·····	79
六、社会计划·····	81
<b>第九章 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和市场 (1966 ~ 1969)</b> ·····	85
一、第一次浪潮的经验·····	85
二、市场和人道主义面孔的社会主义 ·····	87
三、价格、工资和就业·····	89
四、间接的计划管理·····	91
五、工人自治的范围·····	93
六、正常化·····	95
<b>第十章 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 (1968 ~ 1979)</b> ·····	97
一、废除指令性计划·····	99
二、价格形成中的灵活做法·····	101
三、对企业收入的管理·····	101

四、投资方面的局部放权·····	103
五、工资与就业·····	105
六、农业与私有部门·····	107
七、新经济体制的成效·····	109
八、70年代的急刹车·····	109
<b>第十一章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 (1979 ~ 1989)</b> ·····	<b>115</b>
一、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浪花·····	117
二、农村改革与非集体化·····	119
三、城市改革与工业改革·····	121
四、对外开放·····	125
五、经济的区域化倾向·····	125
六、宏观经济控制的衰微·····	127

## 第四部分 走向体制的解体

<b>第十二章 80年代改革观念的演变</b> ·····	<b>131</b>
一、从体制的乐观主义到体制的悲观主义·····	131
二、理论的影响·····	133
三、自我批评式的总结·····	135
四、资本市场·····	137
五、所有权和资本的控制·····	139
六、西风吹·····	139
七、市场社会主义的黄昏·····	141

<b>第十三章 南斯拉夫的新经验 (1965 ~ 1991)</b> .....	145
一、工人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 .....	147
二、70年代的新一轮改革 .....	149
三、契约计划的尝试 .....	151
四、体制的危机与不稳定 .....	153
五、关键的10年：80年代 .....	155
<b>第十四章 波兰从团结工会到“大爆炸” (1980 ~ 1991)</b> .....	159
一、自律的革命 .....	159
二、重返工人自治 .....	161
三、军管状态下的改革 .....	163
四、“第二阶段”的重新推进 .....	165
五、走向大转折 .....	169
六、休克疗法 .....	169
七、向资本主义过渡：大跃进还是转轨？ .....	171
八、私有化 .....	175
<b>第十五章 匈牙利激进改革的实验室 (1980 ~ 1991)</b> .....	177
一、对新经济体制的评判 .....	177
二、初次推进局部的改革 .....	181
三、银行和税收改革 .....	183
四、走向激进化 .....	185
五、“转轨”与自发的私有化 .....	187
六、安托尔政府 .....	189
七、私有化的问题 .....	189

<b>第十六章 从民主德国到五个新州 (1990 ~ 1991)</b> .....	193
一、迈向统一.....	193
二、宏观经济的冲击.....	197
三、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197
四、返还与私有化.....	199
<b>结 论</b> .....	201
<b>后 记</b> .....	207
<b>参考书目</b> .....	221

# 引 言

在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现实的大变革表现为一种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因而，这是一次经济体制质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取代现有的以共产党政权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而逐步实现。在40年的时间里（苏联为60年），社会主义被这些国家描绘成一种取代资本主义并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我们所目睹的动荡因此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和历史的意义。这场著名的体制之争经历了冷战或和平竞赛的许多阶段，由于其对手的放弃和转变，资本主义被宣布为赢家。

理解当前的大转折并预见到将来的发展变化——因为历史没有终结——要求有一种追溯以往的眼光去观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尝试的经济改革的各种经验。通过这种经验总结，经济体制比较分析试图弄清的所有大问题就呈现在面前了：协调机制、机构和行为在整个调节中的作用、社会及政治因素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进行了迂回曲折的改革尝试，经过与资本主义决

斗之后，社会主义放弃斗争的方式就不足为奇了。这段历史能够使我们明白两种体制之间的过渡正在遇到和即将遇到的困境和困难。通过比较研究本身这面镜子，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本质以及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改革的三次浪潮

所有经济改革都烙上了实施改革的国家内部和外部政治经济局势的印迹。在苏联霸权集团中，苏联本身的变化起着基本的作用，即准许或限制的作用。对于这个集团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或中国，其内部发展占优先的地位，但是每次都与国际事件特别是苏维埃区域的事件相互影响。

苏联模式的传统体制的第一次真正改革，1950年开始于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它伴随着一次政治分裂，这次分裂只是共产党世界将要经历的第一次。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运动的出现直接与非斯大林化及其后果有关。它主要对几种计划的运转采取批判性反思的形式。苏联本身、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波兰都经历了这种反思。波兰在1956年事件之后，开始了变革管理的一种真正尝试，但是它在几年内就陷入了困境。

第二次改革浪潮比第一次规模更大、更深刻，它成为60年代的特征。除了波兰和非典型的阿尔巴尼亚，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甚至苏联在1965年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重组，而这次重组是赫鲁晓夫(1965年被罢免)时期开始准备的。同一年，走自己道路的南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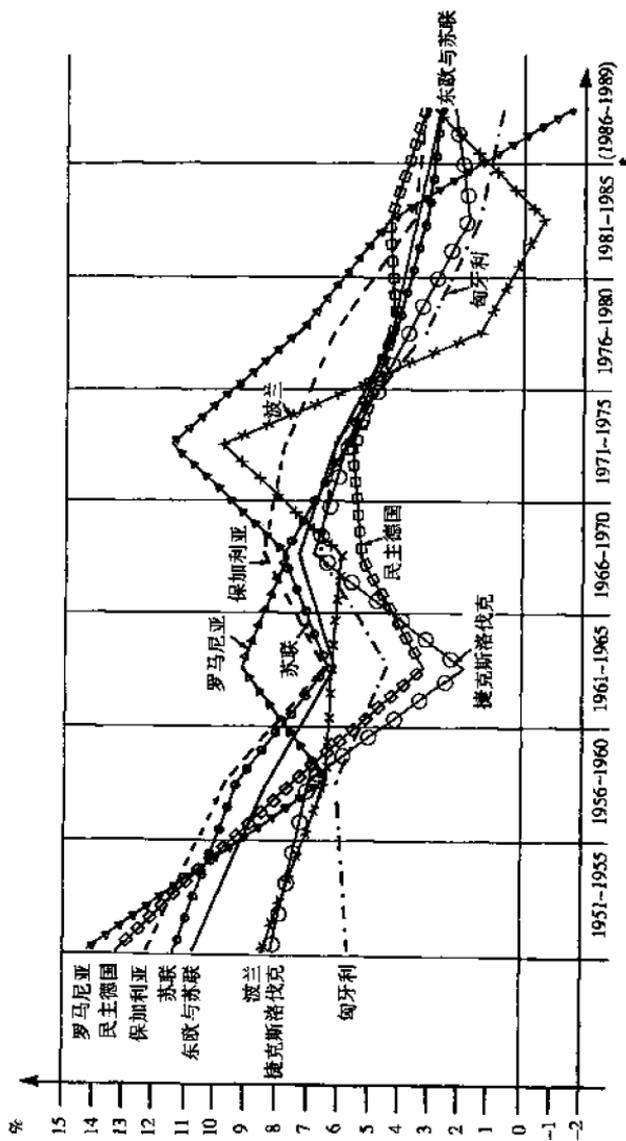
拉夫摧毁了以前变革中留存下来的计划管理的最后一些要素。但是60年代却以中欧改革的全面倒退而结束：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先是受到苏联反对布拉格之春的干涉，尔后实行的正常化则断送了改革；然而，匈牙利则更加谨慎地继续落实1968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体制。

70年代是改革周期中的一个长长的波谷，这主要因为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处于上升时期。一些零星的调整在这里或那里尝试着，但并没有很大的成果。只有南斯拉夫，因为要纠正以前的改革的负面影响，尝试了一种工人自治的新计划体制，但它很横图快就使倡导者大失所望。

第三次浪潮始于80年代，是随着团结工会在波兰的出现而轰轰烈烈地登场的。匈牙利经济学家清楚地表达了进行更加激进的经济机制变革的方向。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重新开始改革；随着对勃列日涅夫遗产的否定及社会经济重组的乱轰轰进程，这种改革变得越来越直截了当。在整个80年代，在毛泽东时代曾经走过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的中国在农业、工业和对外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明显地改变了它的经济体制，改变了它的发展模式。

1989年的东欧革命、1990年和1991年苏联的变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实际上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中国除外）都宣布今后的目标是市场经济。问题已不再是要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

东欧与苏联物质净值年平均增长率的变化情况(以5年为一期)



资料来源：《欧洲经济概览》，（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纽约。

## 改革的分类

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它是一揽子的改革计划，它运用一整套制度措施，旨在改善体制的运转和业绩；在保留国家所有制和一党制基石的同时，它一般把注意力集中在扩大经济中的横向关系、减少纵向联系。这种改革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体制的调整将在集中化的计划管理方面或在体制的其他要素（农业、对外关系……）方面实行一些灵活的做法，而不进行重大的制度变革。激进的改革则对一些制度进行大幅度的变革（对决定体制的基石除外），例如废除集中化的计划管理或进行农业的非集体化。如果制度基石中的一个要素发生改变、或者两个要素都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体制的解体。这就成了质的变化：这不再是体制内的问题，而是体制间的问题——这说明用改革一词是正确的。这是一种变化。

本书对改革的分析并不是完全按照三个浪潮的先后顺序进行的，而是根据前面提到的分类安排的。对传统体制作过介绍（第一部分）之后，接着是体制调整的经验（第二部分）、激进的改革（第三部分）以及体制的解体（第四部分）。其中出现的年代差距有时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所遵循的不同道路。依我看，这种方法能够更好地突出改革的经济学家或领导者的思想变迁及其所关注问题的变化。这种变化尽管受到指责和自我批评，却构成了这漫长历史中的基本方面。

这里谈到的改革史主要论及体制、经济机构的变化以及改革观念的发展。读者应该将它重新放回到那种左右它的各个时期和各个国家的更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背景之中去。

# 传统的体制

## 体制的根本要素

1. 制度的基石
  - 国家所有制
  - 一党制
2. 集中化的计划管理
  - 等级控制
  - 分级的目标管理
  - 用行政手段分配投入
  - 用行政手段规定价格
  - 利润的再分配
  - 工资基金的宏观经济控制
  - 单一银行制

## 其他要素

- 农业集体化
- 对外贸易垄断
- 对私有部门的限制
- 企业单一领导制第一部分传统的体制

## 第一部分

# 传统的体制

1	制度的基石 .....	17
2	集中化的计划管理 .....	21
3	体制的其他要素 .....	31
4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 .....	3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中，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所进行的根本性制度变革经历了不同的道路，其进展的快慢也各不相同。然而，这些变革都汇合到当时被这些国家领导人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无可争议的那种模式即苏联体制上，这种形成于本世纪30年代的体制似乎在取得了反纳粹德国的胜利时找到了自己的合法性。对于一个力求超越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来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经济组织为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图式。集体化的农业、国有的工业和银行、旨在推动体制迅速变化并加速经济增长的集中计划管理，这些就是这种体制的目标。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就是要试图改变这种从苏联那里模仿来的传统体制。这种体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它既有内部冲突又总体上相互协调，这是系统的分析试图加以解释的。

经济改革的历史表明，这种传统制度一经确立就缺乏活力。这种自动再现的趋势首先是这种体制根本要素的特点，而这一些根本要素是由制度的基石（国家所有制和一党制）和集中的计划管理组成的。经验表明，农业集体化、对外贸易垄断、对私有部门的限制以及企业中单一的等级领导权等传统结构可以有某种灵活性或较大的适应能力。因此它们可以被看作传统体制的另一些要素。

与斯大林时代的典型组织方式相联系的发展方式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发展的战略，即试图通过高积累达到快速的增长以及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完成工业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严格的计划管理和物资日益短缺的环境中，个人或集体的变通行为伴随着这一战略的实施而出现，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现象。过度的积累、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优先发展形成的积累不平衡、消费的残留变化、农业生产的滞后发展、自给自足的趋势、短缺的调节，所有这些就是传统经济模式在发展方面的主要特征。这些严峻的情况必定会引起改革者的关注。他们将要调整和批判斯大林的经济理论，从而重新设计和合理地确立社会主义体制的新的运行模式。

## 1952年工业生产和零售贸易营业额的国有化比例(%)

	工 业	商 业
阿尔巴尼亚(1950年)	98	88
保加利亚	100	98
匈牙利	97	82
波兰	99	93
民主德国	77	54
罗马尼亚	97	76
捷克斯洛伐克	98	97

1948年,南斯拉夫曾达到与保加利亚1952年相似的比率。

资料来源:W.布鲁斯:《1945~1985年东欧经济史》,第33页,发现出版社,1986。

## 50年代初东欧住房的国家控制

“面对住房建设低速发展的状况,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在大城市或中等城市通过正式的或隐秘的方式征用住宅楼,从而将整个住宅楼群控制在它们的手中。自1950年起住房管理办公室就开始全面控制住房的分配。它们将房租定得很低,除了民主德国之外,房租有时纯粹是一种形式。在城市中新住宅的建设完全交由国有部门来进行,

新住房则几乎无偿地分配给那些根据政治或业务标准筛选出的受益者。私有住房的建设主要局限在农村,它受经济总体形势和建筑材料极度短缺双重阻力的限制。”

资料来源:W.布鲁斯:《1945~1985年东欧经济史》,第65页。

## 制度的基石

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制度，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将两个看似不同质的原则结合在一起：国家所有制和一党制。虽然，与西方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具备商品、货币经济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具有工资经济的特点，但是，它在这种结合之中显示出不容置疑的特殊性，同样，这种特殊性也存在于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之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一党专政可以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或基石，而集中化的计划管理则不是，因为它必须以前者为前提条件。

### 一 国有化和国家控制

在农业以外，改变所有制的工作在各地迅速展开（在中国，所有制的转变发生在50年代中期，中国当时采取了对原所有者给予补偿的特殊做法）。其结果，国有制不仅在关键工业部门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在银行、建筑、运输和贸易等部门也占绝对优势。至于合作社，虽然它们仅在有限的部门中存在，但是由于它们同属于等级体制、服

## 特权制度的一些特点

“——党的特权制度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领导岗位，而不管这些岗位的领导者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任命的。这个规定不加分别地涉及现有的所有机构：政党、国家、工会以及所有社会组织。

在政府机构中，这条规定实际的适用范围很广。事实上，不仅政府各部（其人员是任命的），而且还有苏联的各级苏维埃和其他国家的市政府（由被选举人组成），均不能被看作是处于党的等级体制之外的机构。不管国家的代表们是任命的还是选举的，他们都服从同级党的机构。

此外，党的特权制度决不区分党员和‘非党’干部。

——并不像人们当初想象的那样，这种特权制度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官僚体制。实际上，根据波兰文献，党的上

级机关总是能够直接介入属于党的下级机关责权范围内的决策。这也就是说它不须通过等级渠道逐级进行。传统官僚体制的一个最根本的规则就这样被取消了。对于领导干部的罢免也一样，它往往是瞬间的且似乎是无法申诉的，因而也是反官僚的做法。

——国家机器各部门（行政、经济、安全等部门）中的一系列领导职务受双重领导：一方面受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受上级政府机构的领导。但是党组织的决定从逻辑上说比其他机构的决定优先。因此，可以说政府部门的职务受双重控制，而党内的领导职务则不然。”

资料来源：T. 洛维特：《东欧有国家吗？》，《法国社会学杂志》，第二十卷，第二期，第443~444页，1979。

从于中央的计划管理以及受党的机构领导，特别是党指定负责人的做法等，所以它们也是受国家控制的。

## 二 一党制

在政治方面，虽然做法不尽相同，但是效仿苏联模式却是比较普遍的。在一旦清除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或必要时将社会民主党并入共产党之后，一党制在各国就占主导地位（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形式上仍保留一些小党，作为共产党的同盟者）。共产党的这种排他的权力应该被看作是国家机器的权力，而不是全体党员的权力。党的领导地位被写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之中，这对经济方面尤为重要。依靠对所有制的国有化以及等级化的经济管理组织，党的领导地位主要体现在特权制度上，通过这一种制度可以控制各级经济机构领导职务的任免。党拥有与政府部门相同的结构。各级政府部门服从双重隶属关系的原则：既服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又服从上级政府部门的领导（而上级政府部门本身又受其同级党组织的领导，直至国家最高行政部门亦然，它服从党中央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这种集中化的经济决策所具有的政治和行政两方面的双重性是实行指令性计划所必不可少的：行政命令可以跟政治动员和控制结合在一起。但是多样化的控制途径同样也是各种利益和权力冲突的根源……

工会服从党组织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性质：它成为中央决定的传输带，是一个对劳动力进行编配和动员的机构，不具有独立表达、谈判或请愿的权利。

## 政府的体制

“政府经济方面的一个部作为部门经济政策的中心担负着广泛的具体的计划管理和直接监督下属各级机构日常活动之职责，因此，不可能负责太宽广的领域。这一情形导致专门经济部的迅速繁殖，它们各自负责越来越窄的领域，这样就将原先的政府各部弄得支离破碎：除了阿尔巴尼亚只有6个经济部之外，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斯大林主义盛行之时均未曾少于10个经济部。波兰在一段时间曾拥有26个经济部（其中仅建筑方面就有3个，交通方面也有

3个）。这种经济部的迅猛增加需要政府内部加强协调，这就解释了出现一大批副总理将相关的部委集中在各自门下的现象，捷克斯洛伐克有10位副总理，波兰有9位，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6位，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有5位。民主德国在1950年有5位副总理，1954年则有7位，但是稍有区别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联盟中的从属党派。”

资料来源：W. 布鲁斯：《1945~1985年东欧经济史》，第40页。

### 50年代中期波兰经济领域的政府各部一览表

工业方面：	农业方面：	交通方面：	贸易方面：	综合方面：
城镇建设部	农业部	铁道部	国内贸易部	财政部
工业建设部	林业部	公路交通和航空部	对外贸易部	公共管理部
能源部	国营农场部	海运部		市镇经济部
冶金部				
化工部				
机械工业部				
轻工部				
农村工业和食品工业部				
小型工业和手工业部				

资料来源：J. 马尔切夫斯基：《人民民主国家的计划与经济增长》，第二卷，第316页。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

# 2

## 集中化的计划管理

计划管理的重点是国家的工业部门，其结构形式则由东欧国家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从苏联模仿来的一整套的机构和程式决定的（中国在50年代中期）。正如苏联那样，计划体制被赋予了实施主观的发展战略和进行结构性变革的任务，而由于所有制的统一以及政治经济权力的极端集中化，这一任务的实施才成为可能。

### 一 全面的等级控制

国家的整个工业是单一的等级结构，它根据部门原则即生产部门而组织起来。在顶层的是处于核心的政府和党的领导机关，还有附属于它们的中央计划委员会，属于中间层次的是政府产业（或技术）各部，它们各自管辖着一定范围的生产部门。一个政府部除了有（综合服务的）职能局之外，还包括主要的产业局。由于部属各局负责对所属企业的经营管理，因而是企业直接上级主管单位，它们决定所有有关生产计划、原材料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由供销中心负

责)、价格、工资基金、以及与财政体制的关系等方面的事宜。主要产业局的数量根据各部委和各国的情况而不尽相同,也因各部分管的领域差别而不同(有时数目很大,例如1951年波兰重工业部有20个局)。最后,企业为第三层次,即国家部门等级体制的最低层,其代表为企业的负责人,而他的任命、管理业绩的评估和升迁都由主管部决定。

国家所有制与产业等级组织相结合的重要后果是创立新企业的决定权完全属于产业主管机构或中央机构。政府各部的专业化总体上说相当严格,各部门间的资本流动不取决于基层(企业)或中间层、更不取决于个体经营者,而只能由经济的最上层决策机构通过积累过程的集中化来进行。

## 二 分级的目标管理

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模式中,集中化的计划管理不仅指制定宏观经济的数量指标,而且特别是指在行业(各部)、然后在每一个行业的企业中逐层分配这些指标。这种将中央计划指标分解为部门、中间层次的经济目标,然后在微观经济层面再分解为指令性指标下达给每个企业,这一过程可以看作传统经济模式的基础。国营部门的这种等级结构使得企业能够完成一整套细致的指令计划,而每一企业(年度的)指令性计划原则上构成所属政府部计划的一部分,而这政府部的计划又构成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在这种体制下,等级结构各级负责人的业绩将由其上级根据其完成计划的情况进行裁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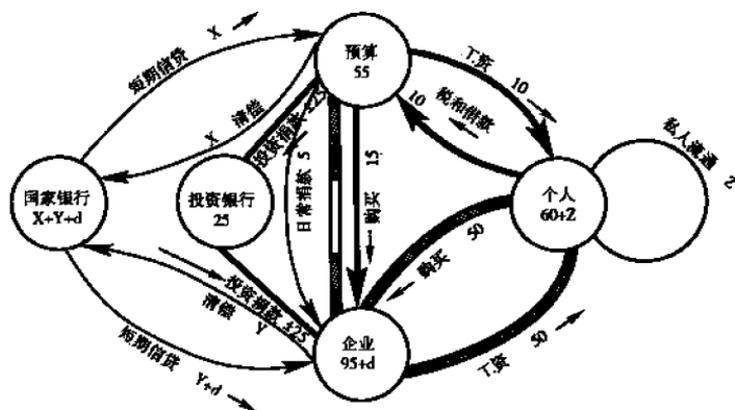
### 三 用行政手段分配投入

在企业生产计划纵向的指令当中，还交织着企业与它的供应者和客户保持横向关系的规定。在下游，企业被强行指定客户（消费品的贸易组织，接受中间产品的企业或批发销售站）。相应地，在上游，对计划范围内的生产，其原材料的供应由生产企业或部属的供应站根据计划内的行政指令提供。因此，这是一种特别的定量供应，因为企业的负责人必须从所属部获取所有计划内供应物资的发货单，而且供应单位是指定的。这种买卖商品的形式仍然存在，但货币和价格的作用极其有限，而作为竞争的一个基本方面，即变换供应者或寻找新的客户的可能性则被取消了。这种集中化供应的紊乱状况，有可能危及生产计划的执行，导致保护性做法的出现（如囤积）或者使得企业负责人的非正式横向关系得到发展。

### 四 用行政手段规定价格

传统体制一经确立，价格方面的规章制度也同样向 30 年代苏联的做法看齐。主要的内容有三点。企业不能决定价格，而是上级经济主管部门决定价格，因此，也间接地决定了企业的利润，因为原材料供应的价格和工资也是由主管部门规定的。保持物价稳定的原则使得物价长期刻板不变（50 年代前 5 年东欧和中国制止了消费品价格上涨之后）。最后，零售价格一般根据供需平衡原则确定，而批发价则根据计划内的平均成本加上按部门确定的一定比率的利润来计算（“附加成本”原则）。消费品的价格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就这样被分隔开了：这种价格体系是混杂的。

## 人民民主国家货币和财政的流通情况 (示意图)



图中的数字代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近似值。然而国家银行的短期信贷的数量无法确定，因为除了东德之外没有有关货币流通的统计材料。发放给国家的短期信贷“ $x$ ”可以认为与清偿数目相等，因为，预算通常是平衡的。相反地，发放给企业的信贷“ $x+d$ ”比清偿数目多出未知数  $d$ ，因为在一个迅猛发展的经济当中，周转资金必须逐渐增加。增加量  $d$  为生产提供了资金，因此，将计

入下一阶段的国家收入中。在官方严格管理的流通中附带还有一个未知量“ $z$ ”的私人流通，它代表居民与私人手工业和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易。为了简略起见，流通中的折旧忽略不计。

资料来源：J. 马尔切夫斯基：《人民民主国家的计划与经济增长》，第二卷，第 411 页。

## 五 预算的再分配

通过上述手段确定价格的同时，行政部门一方面确定了企业和部门的利润，另一方面也确定了批发与零售的差价（视产品而不同），这一差价总量构成营业税，它是交纳给国库的“差价税”，主要是对消费品征收的。而企业的利润，根据传统体制，它的大部分也要上交国库（包括折旧基金）。因此，国家预算收入主要由营业税和企业利润的提成组成，根据苏联理论，即“经济生活中产生的获取纯收入的两种方法”。作为这种社会利润集中化的对应方面是通过财政拨款形式拨给企业或部门投资基金，而不管它们的效益如何。

通过这种对经济余额的有效再分配或者说利润和亏损（它们本身也受定价的影响）的社会化，国家对这种由它本身造成的收益不均的状况进行补偿或修正，更准确地说，国家将一个部门实现的利润（或亏损）和该部门要进行的投资分隔开来。企业用自身利润进行投资或寻求投资信贷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中央政府就这样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来决定全国的积累率，并且保证某些重点部门的优先发展，这就是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战略的两个最根本的目标。

## 六 控制工资基金

在确定“投入”价格和产品价格的同时，国家对分配给企业的工资基金也有严格的管理。工资等级以及就业人数也由中央政府部门确定。在传统体制中，反映计划目标的最重要的指标（如总产值）对企业的工资基金有影响。如果计划目标完成了，那么工资基金也将达到计

## 苏联有关利润提成的指令性特色

“从利润的提成方式上可以看出，不管表面上如何，实际上直到1965年，在国家财政和企业财政之间始终存在着混乱的现象，这完全与财政自主的原则相违背。实际上对利润的提成是一种分摊税：每一财政年度都会规定一个计划提成总数，它根据预期利润估算来计算并须减去一小部分企业留存（平均4~5%）及给予经济管理部门的那部分储备基金。如果年度当中超额完成利润计划，则提取总量就可能增加。经济管理部门接着就将这些税分摊给那些有效益的企业。可以容易看出，在这种情

形下，企业决没有动力去提高其利润：如果它超额完成利润计划，那些超额部分将收归国库，相反地，如果企业亏损，它总能得到补贴来填补赤字。当然，1965年前的体制曾规定用利润来建立企业基金，但是由于实施的条件过于繁琐，企业常常不能达到要求；而且由于吸引力不大，因而企业也不怎么热心。”

资料来源：M.拉维涅：《苏联和欧洲的社会主义经济》，第335页，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79。

划中的数量。如果超额完成计划，额外的资金将增加到工资基金中去。发给工人的奖金与发给干部的奖金并不相同，但这种奖励在 60 年代改革之前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对工资基金和工资等级标准的管理，是控制工资总量的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扩大的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

因此，企业中创造附加值的条件及附加值在工资和利润上的分配方式都是由外部的行政命令来决定的（确定投入和产品的价格、控制工资基金）。管理的主要标准就是完成生产的（有形的）数量目标，像前面提及的那样，企业或部门的投资能力，从再分配过程看，与其收益或生产效率无关。

## 七 单一银行制

斯大林模式的银行体系表现为一种统一的或单一的国家机构的形式，其中央银行和二级银行的职责并没有什么区别。银行发行的信用货币用于支付工资和用于个人购买消费品，而其他的交易则使用代表货币，通过企业在银行地方分支机构中的帐户进行转账。这种银行体系的基本职能就是管理货币流量，即根据计划中预先规定的具体目标来管理信用货币和代表货币这两种不同形式货币的流量，因此，银行在完成监督计划方面的作用，无论从工业部门之间交流还是从工资基金角度看都是重要的。专业银行发放的投资，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是以无需偿还的预算拨款的形式发放的（甚至不带利息）。信贷主要是短期的，它是由国家银行发放的，且只能用于日常的生产活动。

## 积极货币和消极货币

看来“在集权模式下，货币对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品市场起着积极的作用，即以货币单位表示的经济量值（工资、价格）对决策者（工人、消费者）的选择有影响，因此，中央借助于这些量值来建立其希望的那种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因而，这些量值不能仅仅被看做是传统意义上的会计数据”。

“在中央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本身间的关系中，货币则扮演着另外一种不同的角色。”

“中央及其下属机构的经济决策以详尽的指令形式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所有重要方面都作了规定，特别是产量和生产结构、生产方式、供应渠道和流通渠道等方面。这样，货币就不是对再生产过程中真实要素的运动起作用的一种积极的工具；相反地，它只是一种消

极的反映。企业并不是在采取（更准确地说是接到）决策前，而是在这之后才进行规划计算的。企业往往只满足于将预先规定的计划目标和生产方式所需的开支开列出来，因此，这种计划化的财政结果（收益或亏损）是那种强制性指标及价格结构的消极反映。企业要替换生产资料或受价格结构的影响而要改变技术参数，原则上都是不准许的，因为有关的指令已经规定要用哪种设备或哪种原材料。因此，企业财政上的赢利并不会更多地使企业得到扩大，同样企业的亏损也不会导致其减少经营。”

资料来源：W. 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第98页和第100页，马斯佩罗出版社，1968。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计划的制定者千方百计想使总购买力（减去预期的个人在单一制银行下属的储蓄所存入的存款）与消费品计划供应量及服务相平衡。为此，每年都需制定工资总量和非工资收入的计划。

## 东欧农业用地的社会化 (1952 ~ 1957 年)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阿尔巴尼亚	—	6	—	8	8	9	—	15	31	34	58	61
保加利亚	53	61	60	63	—	—	61	64	63	—	87	90
匈牙利	25	37	26	39	18	31	22	34	9	—	12	—
波兰	5	17	7	19	8	19	11	24	9	22	1	13
民主德国	3	—	12	30	14	28	20	33	23	30	25	34
罗马尼亚	5 <sup>a</sup>	—	11 <sup>a</sup>	25	11 <sup>a</sup>	24	13 <sup>a</sup>	26	13	38	20 <sup>a</sup>	48
捷克斯洛伐克	34	43	33	43	29	42	29	43	33	49	51	68
南斯拉夫	13 <sup>b</sup>	—	3 <sup>b</sup>	—	2 <sup>b</sup>	23	2 <sup>b</sup>	—	—	23 <sup>b</sup>	—	—

注：(1)指集体农场占有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2)指集体和国有农场占有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a. 包括共同耕作协会

b. 仅指农民生产合作社

注：表中的数字一般指当年最后季度的数字；在某些情况下，资料来源差别很大，这可能是因为对土地的定义（农业用地或耕地）、合作社的定义（是否包括最松散的协会）、合作社所有权的定义（是否包括自留地）等等的差别。由此可见，从绝对层次上说这些数字的可比性是比较差的，但是这些数字反映了变化发展的总趋向。

资料来源：W. 布鲁斯：《1945—1985年东欧经济史》，第83页。

# 3

## 体制的其他要素

在这一标题下，我们可以将传统模式的某些特征作些分类，这些特征并不是次要的或附属性的，比如说农业，只是这些特征在各种改革过程中显示出更大的易变性，即比制度的基石和集中化的计划管理这一僵硬的体制根本要素更加灵活可变。

### 一 农业集体化

在东欧，特别是在中国，集体化的进程尽管不像苏联那样剧烈，但50年代由集体化而来的制度模式则到处都与苏联的集体农庄体制相似。在集体农庄或“合作社”，除了受严格限制的家庭小块自留地之外，土地都是公共财产，由集体共同耕种。农业机械及拖拉机站属于国有企业，只有它们才有权掌握设备并将这些设备租给合作社使用，同时对合作社进行监督。斯大林针对农业方面所倡导的捐税政策首先是按固定和始终低廉的价格向国家义务交纳农产品。在东欧，50年代农业与工业部门的交换关系已经退化（但是中国的情况要好些）。国营农

# 1950 ~ 1958 年中国从私有农业到农业集体化 (占农户的百分比)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8			
						6月	12月	1月	2月	6月	12月	4月	8月	9月	12月
互助组	11	18	40	39	58	50						-	-	-	-
低级社	-	-	0.1	0.1	11	14	59	50	36	29	9	-	-	-	-
高级社	-	-	-	-	-	14	59	0.03	4	11	51	63	88	100	70
人民公社	-	-	-	-	-	-	-	-	-	-	-	-	30	98	99

资料来源：C. 里斯金：《中国政治经济学》，第 86 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

## 斯大林与农业机械及拖拉机站

1952 年，斯大林反对将农业机械及拖拉机站（国有企业）解散并将它们卖给集体农庄的改革建议。斯大林认为，那样做将使社会主义的低级所有制形式（集体农庄）得到加强，从而损害了社会主义的高级所有制（国家或“全民”所有制），不但不能限制反而会扩大商品经济的范围。

采取这一措施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第一，集体农庄就成为这些主要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也即它们将处于我们国家任何企业所没有的极其特殊的地位。因为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家，国有企业本身还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我们怎么能够仅仅因为有几个人在说它是一种进步、一种前进就要使集体农庄这种特殊的地位合法化呢？我们是否可以

说这种状况有利于将集体所有制提升到全民所有制的地位，进而加速我们社会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种状况只能使集体所有制离全民所有制越来越远，同时使我们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不是使我们更加接近它，这样说难道不更正确些吗？第二，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需要在其中投入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萨尼纳同志和文格尔同志对此怎么看呢？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有助于我们向共产主义目标前进吗？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只能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目标的迈进，这样说不是更正确些吗？”

资料来源：J.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 99 页，社会出版社，1953。

场这一部门数量比较有限，它们以工业企业的方式管理，跟农业集体化后占优势地位的集体农庄并存。

## 二 对外贸易垄断

在与外国的经济关系方面，中央集权在本国的生产者与外国合作伙伴之间编织了一个“筛子”。在计划范围内，企业根据计划进口或出口的产品的价格均是国内价格，这些产品的进出口业务都通过中央贸易机构进行。而中央贸易机构则根据国际价格购买或者向国外销售产品，由国内国际价格差价而形成的利润或亏损都统一计入国家预算。汇率在此完全不起什么作用。这种体制被称作价格平准体制。不仅企业与外国合作伙伴的直接联系被切断，而且国内价格也与国际价格脱钩，这跟国内的批发价与零售价相分离的情形有些相似。这种价格分离的做法不论是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中还是与社会主义伙伴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均一视同仁（1949年成立的经互会在50年代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本国货币为不可兑换货币。

这种对外贸易的垄断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国家能够在数量和结构方面控制与外国的贸易，并将其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保护本国经济不受失控的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危险的或有害的影响。人们常常说社会主义国家厌恶贸易，至少是厌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在50年代，所有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但南斯拉夫除外）都极力将它们的贸易限定在社会主义阵营范围之内。

## 外贸结构的转变

在调整贸易的地理定向的同时，各人民民主国家遵从苏联发展战略的做法同样表现在它们进出口产品的结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从一开始就重视机械设备：这方面的贸易在1953年占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其比例将进一步增长。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这两个工业化国家担当起向其他次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向苏联）提供设备的角色。东德在1953年前后的机械设备出口占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不包括留出于用于维修的那部分。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经受了一次真正的转产：出口的消费品逐年递减（纺织品和玻璃制品从1937年的31.6%下降到1953年的9.9%），而出口的机械设备逐年递增（1937年为9%，1953年达到40%）。与此同时，机械设备在保加利亚的进口总量中的比例1951年上升至45%，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苏联相当。同样的情形可以在那些中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看到，而这些国家——匈牙利尤其突出——已经同时成为了设备的出口国。”

资料来源：J.-C. 阿斯兰：《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和利润》，第98页。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1981。

## 1967年各部门社会化比率

单位：%

	农业土地	工业生产	零售业	国民收入
保加利亚	99	99	100	95
匈牙利	94	99	99	96
波兰	15	100	99	76
民主德国	95	88	79	94
罗马尼亚	91	100	100	95
捷克斯洛伐克	90	100	100	95
苏联	98	100	100	96
南斯拉夫	16	98		77
平均数(近似值)	92	99	98	95

资料来源：J. 维尔钦斯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第3页。麦克米伦出版社，

### 三 私有部门的次要地位

因为无法做到像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样，除了集体农庄的自留地之外，几乎完全取消合法的私有部门，正如 60 年代的数字显示的那样（见附表），所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转而采取一些非常严格的限制性措施（除了南斯拉夫和波兰在 50 年代重新采取了农业私有化的做法之外，当时只有民主德国相对来说是一个例外）。

在农业方面，斯大林首先在 1935 年开始采取自留地这一做法，作为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化的一种让步，而许多国家则周期性地采取限制或是放开自留地的作法，与此同时，当局仍将自留地看作是私有制令人头痛的残渣余孽。此外，被批准的私人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受严格的限制，而且均局限于次要的部门：手工业、餐饮业、零售业……

### 四 企业的单一领导制

企业领导的绝对权威这一苏联原则应该是传统体制的一个重要要素。虽然企业领导实际上完全服从于主管部的领导，即主管部负责对他的任免并对之实行控制，但是他在企业中却是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人。党委当然拥有重要权力，但是企业领导是党委成员。在这个原则下，关键是企业排除了劳动者参与或共同管理的所有可能，而工会组织则服从于党组织和企业领导本人。一些国家如 40 年代末的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出的工人自治愿望因而受到了压制，但是在以后的各种政治或社会危机过程中重现的这种自治愿望，无疑将在动荡的改革历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资本主义的地狱与社会主义的天堂

苏联经济学家 E. 瓦尔加 1937 年首次在其《两种制度》一书中对走向衰亡的资本主义和走向胜利的社会主义这两种对立的制度模式进行了理论阐释。当时该书(译本)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传播。从该书的目录可以了解一些他分析问题的方法:

1. 资本积累和社会主义积累
2. 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3. 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工业生产
4. 资本主义国家固定资本的部分使用和苏联生产资料的充分使用
5. 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劳动收益
6.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失业和苏联工人的充分就业
7. 资本主义国家市场问题日益严重和苏联市场问题的解决
8. 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危机和苏联农业的进步
9. 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的贬值和苏联货币地位的巩固
10. 资本主义经济的分化瓦解和

社会主义经济的加强

11.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市场调节和苏联的计划经济
12. 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苏联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
13. 资本主义国家农民的破产和苏联走向富裕的生活
14. 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压迫及殖民压迫和苏联各民族的自由平等
15. 资本主义世界从资产阶级民主走向法西斯主义和苏联从沙皇专制到真正的民主
16. 法西斯主义者希望世界大战和苏联保卫和平

资料来源: E. 瓦尔加:《两种制度: 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巴黎, 国际出版社, 1938。

(如果西方大萧条及对 30 年代苏联经济缺乏可靠的信息能够允许这样一种带讽刺意义的宣传的话, 那么二战之后,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及其经济的高速增长, 这种有些缓和的说法却似乎又变得盛行起来。)

##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

传统体制在理论上的合法性相当晚才最终获得承认。援引斯大林1936年有关苏联宪法的论述以及1938年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经典表述的是1952年斯大林去世前几个月出版的斯大林本人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4年）。这两本著作均被译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文字，其中第二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教育和经济思想有着持久的影响。如果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三十多年中启迪了各种总体上维护这一传统体制的保守思潮，而且还因为人们能够解释改革的经济学家面对这些教条而逐渐形成的思想解放的发展。

### 一 “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模式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被描绘成是与资本主义这一反面模式相对立的正面模式。根据这种论述，它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紧接着资本主

## 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种体制，它有两种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在这种制度下，人剥削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发展，从而满足劳动者不断增长的需要，同时不断发展以高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资料来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科学院，1955年第二版；巴黎，社会出版社，1956年版，第400页。

## 商品、价值规律和货币

1.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国家生产和集体农庄生产。在这种状况下就需要有商品生产。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主要限于个人消费品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没有资本家。它是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

2.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有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和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社会主义没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创造使用价值和改善产品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3. 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受到限制。价值规律不能支配生产而只能对生产发生影响，价值规律对商品流通具有调节作用。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要运用价值规律。在计划价格的过程中要考虑到价值规律的作用。

4.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是一种一般等价物，是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一种经济手段，同时也是统计和控制社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工具，也是衡量劳动和消费的尺度……

资料来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497页。

义制度，它没有那些导致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矛盾：社会冲突、竞争、无政府主义、危机甚至战争。经济和社会实际上在国家所有制和一党制的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得到统一、均衡并组织起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制）的束缚，其优越性应该主要地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在 1928 年提出的这一口号在 50 年代再次地被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所延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确信，它不仅是一个动员口号，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带来的一种必然趋势。

## 二 社会主义所有制

所有制的形式是确定一种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或者说社会所有制有两种典型的形式。国有制即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它处于主导地位。集体所有制即特定群体的所有制，它在社会中所涵盖的比例比较小，是所有制的一种低级形式。私有制没有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被认为是一种残余物，是一种到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时候注定要消亡的过渡形式。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这一最高阶段过渡当中需要将集体所有制转变成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因此斯大林反对将农机站卖给集体农庄，毛泽东称赞人民公社的创立（将农业合作社组织在一起）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步。

## 三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商品和货币，而马克思主义传统观

## 计划管理的可行性、现状或失误

30年代卫道士的肤浅说教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存在机能不健全和比例失调的状况。斯大林在1952年试图完善他的理论。<sup>1</sup>根据对比分析的方法,假设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客观规律”,他断言:

“不能将年度计划、五年计划与国民经济和谐的、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淆在一起。国民经济和谐发展的规律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竞争和无政府主义规律而出现的。它是在生产的竞争和无政府主义规律失去作用之后,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基础上出现的。这一规律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只能在国民经济和谐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就。这就是说国民经济和谐发展的规律使得我们的计划部门有可能制订出正

确的社会生产计划。但是人们不能将现实性和可能性混淆在一起,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就必须研究这一经济规律、掌握这一规律,在了解清楚后须努力将之付诸实践;必须制定充分反映这一规律所要求的计划。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已经充分反映了这一经济规律的要求。”

资料来源:J.·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9页。

(斯大林不曾料到,这种新学说以及他的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的论述已经为一种“羞羞答答”的改革方向打开了一个理论缺口。)

点则认为它们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本身的东西？斯大林解释说，这是因为同时存在两种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在国有工业和集体农业的交换中，所有者发生变更，因此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关系。消费品是真正的商品。生产资料则不同，它在国有制部门内进行生产和交换。这里，和工资一样，商品的范畴（货币、价格）是统计和管理的手段，用以方便制订统一的经济计划。（非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确实存在，但是只是在有限的领域和计划的范围内存在。因为作为计划管理的工具，其作用也已发生了改变。在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时，随着所有制的统一，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将退出历史舞台，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那时的经济不再有商品和货币的特征。

#### 四 计划管理

在斯大林学说中，计划经济的概念具有双重性且显得模糊不清。它是指，制度要服从于国家计划，而且实际上，至少是潜在地，制度要以符合国家计划的方式发展。如果说计划管理导致了有组织的经济，这是相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竞争而言的。计划管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带来了组织和社会（利益单位）的均一化。由于经济逐级地得到统一，从某种情况说就如同一个大型企业，劳动分工不再是社会方面的原因，而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解决微观经济问题已经与掌握宏观经济规模以及总体发展的大方向联系在一起。



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63年

## 第二部分

### 传统的调整

- |   |                        |    |
|---|------------------------|----|
| 5 | 先锋者波兰和落后者波兰(1956~1979) | 45 |
| 6 | 老大哥走向现代化:苏联(1957~1985) | 55 |
| 7 | 一条独特的道路:东德(1963~1989)  | 63 |

使传统体制变得合理和温和但不改变其原则，这样一种完善体制的尝试是一种较小的、最初的经济改革：体制的调整。这些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寻找劳动者个人、企业和国家更加和谐的行为方式。这些改革因此集中在中央计划范围内的管理方式方面以及主要针对企业负责人的激励机制方面。

实际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在某一时期都曾尝试进行体制的调整。我们将列举3个典型例子，即在理论方面有深远影响的波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处于领导地位并起着重要作用的苏联，最后是在这方面显示出一些特色的东德。

# 5

## 先锋者波兰和落后者波兰 (1956 ~ 1979)

### 一 1956年10月和第一次改革浪潮

1956年波兰的政治空气充满了浓重的反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色彩。受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的影响，这关键性的一年中发生了许多根本的变化。在这一年中，有波兹南工人反抗运动和十月起义及哥穆尔卡重掌大权，还看到了工人委员会的诞生和解散集体经济的做法。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开始了一些改革尝试，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仍将是该国1980年前最重要的一次改革。这次改革对其他国家将来的改革将具有重大的思想影响。

围绕着政府下设的以奥斯卡·兰格为主席的经济委员会并在华沙最知名的经济学家(C. 博布罗夫斯基、W. 布鲁斯、M. 卡莱茨基、E. 利平斯基……)的参与下展开了一场论战；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场论战中有关改革的各种观点已经形成。在两个极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

## 波兰 1957 年 4 月的论述

奥斯卡·兰格领导的经济委员会发表的《关于变更经济模式的几点方针的论述》，虽然带有某些折中看法，1957年7月还是得到了政府积极的评价，它标志着50年代改革思想的进步。文章将中央计划管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作为目标；它要求，为了实现计划，中央机构应首先运用“经济手段”（即财政激励），而行政手段应仅仅作为辅助。指令性目标应该取消（除特殊情况外），除了那些短缺的原材料之外，“投入”的定量分配也应该取消。利润应该成为企业经营的目标，行政命令和激励手段不应自相矛盾。企业用留存的利润或银行信贷进行的自主投资应该得到发展。当企业获得对折旧基金的控制权的时候，它应该对无需偿还的投资拨款支付利息。激励机制不应再与企业完成生产计划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应该建立物质激励基金以便提供长期的激励作用。过去由上级控制的工资基金可以改由企业根据其净产值（不是以前的总产值）进

行调整。价格双轨制（批发和零售）应该取消，迫切的批发价格的改革应该注意合理计算产品的单位价格、国际价格以及每一产品最重要的生产者的成本，应该消除企业“计划性赤字”的现象。在确定价格的同时，国家还应该运用间接调节的办法（生产行为和市场行为）。价格改革应该是为期两年的各种变革的开端。文章最后指出，“国民经济管理的民主化要求工人、工人委员会、地方当局和议会能够积极参加计划的制定工作”。

经济委员会的文章被波兰当局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它的出版发行对邻国的经济学家意义重大。

资料来源：W. 布鲁斯：《1945~1985年东欧经济史》，第138~140页。M. 蒙蒂亚斯：《波兰的中央计划》，第277~278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62。

面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像 S. 库罗夫斯基，他们反对集中化的计划管理，认为它是反民主的和违背消费者至高权益的；另一方面是现行制度的捍卫者。与此相反，学术界的观点却逐渐趋于一致，其部分观点反映在经济委员会 1957 年 4 月发表的文章中。委员会认为集中化的管理应该限于宏观经济的大方向方面，特别是对投资的控制方面，而对企业则应将自主决定权交还给它们，中央应更多地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影响企业。

改革的一些有效的措施深受上述观点的影响，但这些措施在实施中相互间缺乏协调性和完整性，而且政治领导集团对它们的信心也急速下降。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少企业的指令性指标和国家调拨的产品的数目，建立企业基金以奖励劳动成果，制定工人委员会法律；工人委员会是在生产单位中经自由和自主地选举而产生的。它原则上有权监督企业的管理和甚至监督企业领导的任命。

然而，哥穆卡尔及上层领导集团不赞成激进的措施，1956 年狂潮一过去，主张变革的冲动就逐渐受到了抑制。中央集权的指挥棒重新达到了顶点，表现为极大地淡化工人委员会的作用，1958 年又将它改造为“工人自治大会”：其中三分之一的代表仍由基层选举产生，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代表则由企业领导、工会和党委来指定。

## 二 W. 布鲁斯的分权模式

在写于 1959 ~ 1960 年间并于 1961 年在华沙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一书中，W. 布鲁斯对第一次浪潮（可能也对第二

## 布鲁斯模式

在以计划和有管理的市场机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模式中，W. 布鲁斯是围绕着两个主要因素进行论述的：中央和企业。

中央从社会的长远需要出发制订宏观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涉及生产的增长、国民收入在积累和消费方面的分配、部门和地区投资的主要方向、收入结构的调整、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对外贸易的总量和结构等等。但是这些计划指标不是强制性的，也不再逐级下达到各企业，企业自主地进行日常的决策，不再有集中化的投入拨款，也不再集中化的产品调拨。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赢利——经营的综合标准。中央制定大政

方针，借助于有关价格、工资、税收、信贷、海关税率和外汇等方面的间接决策来影响企业。“在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在国有制内部，人们运用货币的积极作用来达到与集权模式下的强制计划的同样类型的目标。”作者指出了这种非集中的计划管理和工人自治之间的相融性，这种相融性“在实际中之所以能够实现的经济基础是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给企业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资料来源：W. 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第175~182页和第195页。

次浪潮)中的改革派论点作了精彩的理论阐释。他在承认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义(国家所有制、没有剥削和按劳分配)的同时,认为有必要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原则与那些不同的“运行模式”区别开来。因此,直到当时仍然有效的集权模式不应该认为就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还可以有一种“分权模式”。当时这一有特色的“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论点力图将斯大林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变异模式(只是当时有效或者说从一开始就走样了);同时它还为政治和经济改革辩护,认为这些改革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原则,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里总是被构想成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布鲁斯认为,想知道是否需要运用市场机制这个问题不应该用意识形态的观点来处理,而是应具体地来看问题:它是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用工具?《一般问题》的作者对此作了肯定的和有论有据的答复,同时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不触及制度的基石,而是要取消分级目标管理和集中调拨的作法,中央通过间接的经济杠杆发挥作用,同时保留对投资体制和价格形成的决定权。

### 三 60年代

波兰在50年代是改革的先锋,到60年代则处于落后的地位,那时所有邻国都处于汹涌的第二次改革浪潮当中。1965~1968年出现一种羞羞答答的重新推动变革的努力,即在地方试点基础上采取了局部变革的做法,但在实践中没有太大效果。尽管1968年政治危机之后的反修大清洗使得改革的经济学家们成为主要的受害者,但经济改革的主题在60年代末仍然再度出现,这次主要围绕着激励方法和价格体制两个问题(第一次批发价格的调整是在1960年进行的)。定于

## 放松对外贸的控制

“新政府保留了哥穆尔卡制定的一些措施并准备在1971年初实施。这些措施涉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特别是对外贸易体制的重组。当时人们考虑要对外贸体制进行两大变革。第一是从外贸部所属的那些专门公司垄断外贸的局面中打开一个缺口。主管工业的政府各部以及（企业）联合会从此获准建立自己的外贸企业或者将它们的出口委托给专门公司并向它们支付佣金。这种开放大大加强了工业部门投身外贸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制成品出口方面尤为明显。第二是仿照匈牙利和东德，取消

了价格平准体制，转而代之以由进口商以人们所说的‘交易价格’向出口商支付款项，交易价格也就是指借助于每一货币区域的特别汇率将外汇转换成兹罗提而得的价格：西方国家为可兑换货币，发展中国家为补偿贸易，经互会地区是可转让的卢布。实际上价格很难完全符合这条简单的规则，但是这种变化足以从财政上使工业企业发生兴趣，从而改变它们对外贸的态度。”

资料来源：W. 布鲁斯：《1945~1985年东欧经济史》，第255页。

1971年1月1日实施的改革为生产资料的价格规定了一套新的计算限定价格的办法，同时还规定在某些情形下实行最高浮动价和合同价来取代固定价格。在零售价格方面，食品的零售价格将大幅度上涨，这主要与旨在抑制近年来积聚的通涨的压力的紧缩计划相关（将工资基金冻结在1970年的水平上，直至1972年）。这些涨价的计划在1970年圣诞节前夕突然公布后，引起了格但斯克工人的暴动，但很快被镇压，然后哥穆尔卡倒台。他的继承人爱德华·盖莱克上台伊始就取消了提价和新的激励机制。波兰工人这第一次“否决”行动是波兰走向团结工会、东欧走进1989年的进程中的重要一幕。

#### 四 盖莱克的战略和大型经济组织

在70年代，盖莱克为波兰制定了一个极其主观的增长战略，试图将改善生活水平和投资快速增长协调起来。这是一种由进口带动的寻求经济增长的极端的作法，它主要表现在技术部门，其目的是借助于不断增强的出口能力来达到延期付款。这一政策使经济失衡加剧，债务增加，最终导致了1980年的大爆发。然而与此同时，周期性的体制调整的冲动仍然不断。1973年一项工业集中化即建立“大型经济组织”的政策出台了，它通过重新组合企业，以便将政府各部的简政放权和各个（大型）经济单位增强自主权这两种优势结合起来。1976年，这种大型经济组织有110个，占工业品销售和服务行业的三分之二，占整个就业总数的61%。特别是，大型经济组织被列为“试点单位”，因而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即有权根据生产增长的业绩（约略地说，即附加值）确定就业人数和工资。随着工资的过度增长，这一敏感领域从1975年起重新回到集中管理上。授予试点单位利润留存的权利与从事信贷

## 中央放松对工资和就业的控制

从前一直是作为上层特权的就业和工资政策从今以后开始由大型经济组织和下层单位决定，但须按如下规则进行：企业掌握的工资基金的增长必须是增加值增长额的一部分  $R$ （根据行业和企业不同， $R$  在 0.3 与 0.95 之间变动，即始终小于 1）。“这项规则引入了一种机制，旨在减少工资在附加值中所占的比例。我们可将其视为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对应的微观经济政策；而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要增加积累和非消费性支出（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为了便于形成储备或建立一种安全机制。工资（和劳动者的奖金）超出现有的

工资基金时可以通过信贷来支出（利率高得吓人，而且企业经理们将失去自己的奖金）；扣除实际支出的所有剩余部分可留作储备。理论上，这种做法是有可能通过减少增加值和就业的增长来增加平均工资的，但是事实上并没有看到大企业实行一种限制性的就业政策——相反地，企业获得的这些新权力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长期的压力。”

资料来源：D.M. 努蒂：《1973~1980 年波兰的工业企业：经济政策与改革》，收入 I. 杰弗里斯编辑的《东欧的工业企业》，第 43 页，普雷格出版社，1981。

及分散投资的权力在当时同样加剧了由于中央发展战略所引起的过度积累。在70年代后半期,重归集中化的调控体制后,并没有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政府虽不断出台“重点的纠正措施”却最终失去了对体制演变的控制。

1980年初,经济压力达到最严重的程度:生产下降、物资短缺(和定量供应)、通货膨胀、外贸失衡及负债,这时,一场比1973~1975年更彻底的、更全面的改革正在酝酿之中。1980年8~9月的革命,导致了政界领导的再次更迭,罢工合法化,团结工会被承认为独立的工会组织,公民权益扩大了,工资获得了10%的增幅,这些就是波兰工人和反对派运动的最初尝试和经济危机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结果。1981年12月,波兰进入了一个奇特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既有紧急状态和持久的社会危机,还有种种激进的经济改革尝试。

## 对激励体制的初次批判性分析

1955年，一位来自哈尔科夫的教授——他以后逐渐知名——曾提议用利润来取代总产量作为确定奖金数量的标准（按部门来分的各种中央标准所得出的收益率这时被规定为利润与成本的比率）。他指出了当时通行办法的一些缺陷：“在现行的奖金发放制度中，好像物质奖励只能在完成生产计划之后进行，而不是之前；这种奖励办法有时甚至与计划目标背道而驰。众所周知，企业间计划指标的分配是以其取得的成果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何常常会看到为生产搞得不好的企业确定的指标会比较低，而完成计划的重担就落到了生产搞得好的企业头上。而企业不愿意接受过高的指标而有意掩盖其生产能力的原由也在此。”

“分配给企业的计划往往是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间一种特殊类型的较量的结果。实践表明，这种为企业指定生产目标的方式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同时也远不能确保充分发挥企业的生产潜

能。企业比其他任何机构更了解发展和完善生产的真正源泉。如果企业从中能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的话，它就能迅速和明确地调动它的资源。”

“因为整个奖励体制是以超额完成计划为基础的，技术更新的结果不仅没有使企业更容易获得与其付出的努力相当的物质奖励，反而更难。这正好说明了，企业的劳动者经常以‘为完成计划而奋斗’为借口公开或不公开地阻碍实施科学方法，不进行有前途的实验工作，而只愿意用过时的技术生产陈旧的但却定型的产品。这种做法的结果是那种旨在鼓励完成计划的办法常常变成一种促使技术发展停止不前的办法。”

资料来源：E. 利别尔曼：《经济核算和工业劳动者的物质奖励》，《经济问题》，1955年第6期（译成法文并收录在《苏联经济改革：1955~1965年的论战》，《文献摘要与研究》，法国文献出版社，1969年2月17日第3564期，第11页）。

# 6

## 老大哥走向现代化:苏联(1957 ~ 1985)

从苏共二十大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一时期,苏联进行了规模不等的体制调整的尝试(1957、1965、1973、1979、1983),但其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 一 地区经济委员会

1957年赫鲁晓夫对经济管理部门进行突然的重组,目标是将政府各产业部的权利下放,同时寻求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企业的上级机关不再是政府的一个产业部,而变为地区经济委员会,它领导所在地区的企业,而不管这些企业分属什么产业。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使集中化的领导部门贴近地方的各种条件,这也是中国一再追求的目标。这种等级管理体制的重组,可以说同传统的部门权力下放的情形类似,很快带来了地方主义和地方自给自足的消极倾向。60年代初重返部门管理原则的步伐相当缓慢,但1965年的改革最终完成这一回归。

## 涅姆钦诺夫计划

苏联数理经济学派重要人物之一 V. 涅姆钦诺夫 (1964 年去世) 在 1965 年之前的改革论战中对体制提出了全面批评, 并勾画了一个体制运行的替代模式。他的观点对其他国家改革者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是巨大的。

涅姆钦诺夫认为, 应该在经济管理的集中化和民主化之间寻找一种最佳组合, 也就是一种以财务自主为基础的体制。中央只保留有限数量的指令性指标, 特别是按照长期的并且对所有经济活动主体都具有强制作用的标准而采取行动 (用于激励基金的利润扣减比率、保证投资效益的部门标准……)。银行和财政体制在信息传递和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该起到基础的作用。企业在产品的流通和原材料的供应方面应该有管理的自由 (批发贸易取代集中化的“投入”定量分配), 企业还应该折旧基金, 其经营活动应以赢利为依归。在这样一种体制下, 企业间将自由地建立合同关系, 但是必须在中央规定的“标准”范围内进行; 国家订货可以通过招标方式进行, 但只有当国家与选定的企业间建立合同关系之后, 它才能成为强制性的任务。

资料来源: M. 莱温: 《苏联经济论战中的

政治暗流: 从布哈林到现代的改革者》, 第 177~179 页, 普林斯敦大学出版社, 1974。

在引用上下级间相互的权利与义务这一观点时 (柯西金 1965 年重提这一观点), 涅姆钦诺夫在下面段落中指出了计划进程的不一致特点:

“上级机关在制定计划时对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定量错误一般不承担任何责任。生产计划、劳动力计划、投资计划、信贷计划、物资与技术供应计划互相间通常不存在协调关系。原因是, 各项经济要素计划的制定是分别进行的。当前这种计划机制的构建, 其结果使得计划的各个方面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基础。改变某些计划指标并不能伴随着带来其他指标的变化。相互间的义务关系并不总是像订货方与执行者之间的合同所规定的那样。合同的惩戒作用也极其微弱。”

资料来源: V. 涅姆钦诺夫: 《社会主义经管体制和生产的计划化》, 《共产党人》, 1964 年第 5 期 (译成法文并收录在《苏联经济改革: 1955~1965 年的论战》, 第 37~38 页)。

在农业方面，赫鲁晓夫在 1958 年还进行了一次制度性变革：开始拒绝斯大林主义，取消农业机械及拖拉机站，将其设备卖给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从此有权拥有和购买农业机械。

## 二 1965 年的改革

在柯西金有关 1965 年苏联改革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将要进行重大的体制调整。而赫鲁晓夫时期展开的各种论战已经为这次改革准备了方向。在有关经济核算问题、投资选择或管理价格的恰当计算方法等方面观点相互对立的讨论当中，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大多数经济学家最终不得不承认“货币与商品的关系”对整个经济包括对国有部门都确实起作用，然而，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却仍然意见分歧、缺乏协调性。数理学派（L. 康托罗维奇、V. 涅姆钦诺夫、V. 诺沃日洛夫）开始了“最优计划”的研究，在经济研究中再次引入当时仍被排斥的边际效用学说的一些概念（效用、稀缺、边际计算）。自从 E. 利别尔曼 1962 年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后，一场围绕着激励手段与利润作为企业效益（计划化的）标准的问题的争论在报刊上展开了。

柯西金的改革包括几个层面。通过行政重组恢复了政府的各产业部门，同时加强了职能管理部门的权力（如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负责集中的供应工作）。计划强度的减弱使企业的指令性指标减少（减至 9 个），同时重视产品的销售和赢利。企业通过留存一部分利润并建立企业基金来寻求改善激励机制（奖金、公益事业、自主投资）。最后，1967 年改革了（受管制的）批发价格的结构，从而减少了各部门间收益

## 作为现代化要素的体制调整

在阐述 1965 年改革的报告中，A. 柯西金列举了下列一些问题：国民收入、单位固定资产的工业产出、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增长放慢，农业增长和工业中第二产业的增长滞后，供应困难，大型工程资金浪费而且工期延长，利用发明和技术进步的节奏太慢。

“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认真地分析了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不足，指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原因。分析表明，我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那些众所周知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能够在短时期内克服这些困难。根据苏联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意见，在解决今后工业发展成熟过程中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工业管理的方式方法上面。当前工业中，现行的领导方式、计划和激励方式已不再适应目前的经济和技术要求，不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应该将对劳动者的激励与改善企

业效益更好地联系在一起，在制定计划的工作中采取更加灵活的做法，能够迅速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老百姓需求的变化，加速技术进步。

“只有当集中化的计划管理与企业、集体的经济创新精神、与发展生产的经济杠杆和物质奖励的加强、与完全的财务经济等方面结合在一起，上述目标才有可能达到。那时候经济管理体制将完全能够适应生产效率迅速提高的问题。代表大会所提的建议是从集中化的计划管理在我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原则上面得到了启发。离开这一原则就不可避免地会丧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资料来源：《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 A·柯西金有关经济改革的报告》，1965 年 9 月 27 日；《文献摘要与研究》，法国文献出版社，1965 年 11 月 30 日第 3241 期，第 5~7 页。

的波动；然而，价格的双轨制仍然继续保留，因为零售价仍未受影响。

### 三 困境与周期重组

1965年的改革包含相互矛盾的两方面，即同时存在权力集中和权力下放。实际上，由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改革失败了。用行政手段确定价格以及保留分级目标管理的原则都阻碍了企业追求利润的努力。自主投资由于始终有效的集中化的供应等因素而不能扩大。保守派认为，1965年后工资增长过快的原因在于新的激励体制。特别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勃列日涅夫保守思想相对于柯西金现代化的愿望越来越占上风。改革措施中只有权力集中这方面的做法一直延续到70年代。

1965年柯西金的改革计划包括将企业集中起来建立联合会的措施，以便提高其专业化水平、获得规模经济的效益，并且减少行政管理开支。此外，社会主义的卖方市场总是成为大多数体制调整的主题（如东德的企业联合会与联合企业、波兰的大型经济组织）。1973年苏联通过建立生产联合会或“科学与生产联合会”的方式（将企业与研究所结合在一起），再次推行了集中化的政策；至于工业联合会，它们只涉及某些政府部门，这种工业联合会将转变成按财务自主原则运作的超级企业。尽管采取这些措施后工业巨型化的数量确实增加了，但是希望中的企业合并却仍然是缓慢的、局部的、常常是形式上的。在政府权力加强的大环境中，传统的行为方式仍继续存在。

1979年一个新法令很好地反映了勃列日涅夫进行强制性重组的

## 1982 ~ 1985 年的“大规模”尝试

在勃列日涅夫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那段权力真空时期，苏联通过采取一些实际举措再次进行了纠正集中化计划管理的弊端的尝试。它当时仅限于几个企业或政府部，但原则上将逐步扩大到其他部门。主要的措施如下：

——减少指令性指标的数量；

——在有计划的发货中强调合同义务(用奖励基金建立奖惩制度)；

——新的技术革新的激励手段(允许将部分利润用于投资和向银行贷

款)；

——重视“最终结果”(以便鼓励降低成本并与中间环节的浪费现象作斗争)；

——用那种将工资与产量及“赋值的增加值”相结合的长期标准取代传统的工资基金限额；

——强调标准和规范的稳定性。

资料来源：A. 诺夫：《苏联经济体制》第三版，第82页，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86。

方式。尽管人们能够从中找到进行更全面的体制调整尝试的声音，然而对可能遇到的问题的相互依存性的所有关注则处于次要的地位。这个法令强调了一些很少得到贯彻的原则：计划应该是可实现的、平衡的和稳定的，不应事后修改计划而使之降到实际完成的水平。……合同的概念得到重申；同时宣布五年计划比年度计划优先。为了不再鼓励代价昂贵的“投入”，有关增值（赋范的净产值）的指令性指标从此应发挥主要作用。希望推行一些新的指标以便限制现有指标的反常影响的想法也同样出现在下述项目中：注重质量的产量、销售总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大的用工数、总利润（代替赢利）、降低成本、引进新技术等。

这种最大限度的重组实际上加快了权力的重新集中，它并没有阻止停滞状态的加剧，因而不比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进行的有限的、短暂的实践所带来的效果要好。所以，苏联要等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才能迎来 1965 年精神的复兴，但这种复兴本身又将逐渐变得激进化。

## 企业联合会

在新经济体制中，原先各部的管理部门和企业联合会都改变了身份：它们从行政性机构转变成由下属企业组成的经济集团（实际上具有双重性）。作为企业联合会，它开始实行财务自主，并根据利润标准而对其作出评价和奖励。企业联合会将研究与生产结合在一起，同时它也获得一部分原先属于各产业部的职能：确定结余、制定标准、调整

工资和投资、将一部分利润和折旧金在企业间进行再分配。这是一种中间层次的集中化，它牺牲了产业部和基层单位的利益，其目的就是要对集中化的管理采取灵活的控制措施。专业银行的一些部门依附于一个或几个企业联合会（企业联合会总数为 80 个）。这种模式使人多少联想起德国从前的卡特尔或日本的财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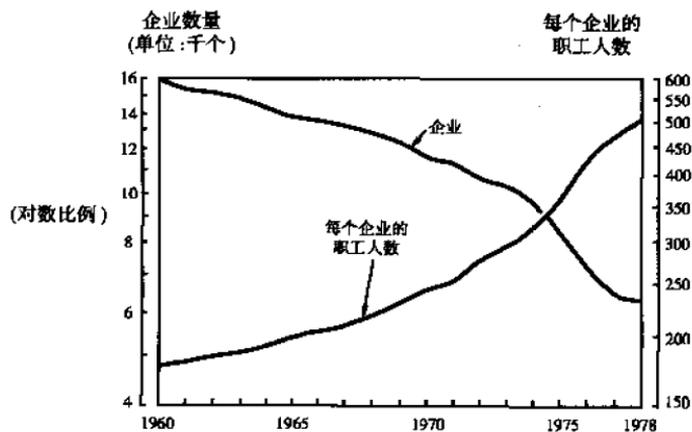
## 一条独特的道路: 东德(1963 ~ 1989)

### 一 新经济体制

东德的领导人对1962年苏联的“利别尔曼论战”作出积极的响应,紧接着,他们于1963年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二次改革浪潮,即60年代的改革浪潮。“柏林墙”筑成后的两年,乌布利希在党的两位书记E.阿佩尔和G.米塔格的监督下制定并亲自宣布了“新经济体制”的原则。体制的乐观主义、现代化的努力、局部修改集中化的计划管理的结构和程序、进一步认识到各部门变革的联系;所有这些体制调整有代表性的方面都能在东德改革中找到。1963年7月通过的“方针”指出旧的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国家现阶段“集约式发展”的状况。新经济体制的目标就是要“以一种全面的、协调的经济杠杆体系的形式”将中央的计划管理与“物质奖励的广泛实施”结合起来。这些经济杠杆是管理的间接手段(在1968年的匈牙利改革中,这些间接管理手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评估企业成绩时,人们重视诸如销售额、成本、利润等这些财政指标。

## 东德工业的集中化

60~70年代作为基层单位的企业集中化进程一直没有停顿。



资料来源: M·梅尔泽:《东德工业中企业的形成和企业的角色》,收入 I. 杰弗里斯编辑的《东欧的工业企业》,第 108 页。

60年代逐步实施的新体制明显地减少了生产资料定量分配的范围、减少了对工资和就业的控制、重新调整了批发价(1967年原材料提价70%，半成品提价40%，成品提价4%)，还加强了利润作为成功指标和激励手段的作用以及利润对自供资金投资的作用，尽管投资的总方向仍受中央控制。我们还应指出，改革有两个方面比较独特。1967年单一银行体制出现了松动，建立了一些专业银行(如工商银行)。这些银行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督，它们在提供投资信贷方面以及在确定相关利率方面获得一些自主权。它们在根据预期的赢利评估项目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另一方面，东德出现了以企业联合会为标志的典型做法，即中间层次的集中化。这种企业联合会在第二次改革浪潮中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并且在80年代联合企业的体制中再次出现。至于对外贸易的权力下放以及某些企业获准直接从事出口并且有可能将出口中挣得的部分外汇留存下来的种种做法，这些方面就不是那么独特，而是在当时东欧其他国家改革中均能见到的情况。

## 二 70年代的再度集中化

1963年的改革将一种相对灵活的做法引进到集中化的模式中，当时这样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计划制定者的抱负，降低了来自计划的压力。意味深长的是，自1968年起，主观主义的复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重点部门的“结构性计划”引起的失衡，产生了一种反向的运动，尤其是从1970年起；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1970年的波兰事件也加速了反对改革的政治转向。新经济体制在1967年被改称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在70年代初昂纳克接替乌布利希之时(1971年)就被取消了。许多原先转移到企业联合会的决策

## 东德的主要联合企业

联合企业名称	1987 ~ 1988 年职工数量
石油化工联合企业(施韦特)	30000
优质钢联合企业(勃兰登堡)	38000 *
电子机械联合企业(德累斯顿)	30000
“弗里茨·黑克特”机床联合企业(卡尔·马克思城)	30000
“十·七”机床联合企业(柏林)	22000
“维尔纳·兰贝茨”印刷机械联合企业(莱比锡)	16000
纺织机械联合企业(卡尔·马克思城)	35000
塔克拉夫重型机械制造联合企业(莱比锡)	40000
微电子联合企业(爱尔福特)	65000
机器人联合企业(德累斯顿)	68000
卡尔·蔡司光学仪器联合企业(耶拿)	68000
家用电器联合企业(卡尔·马克思城)	28000 *
乐器联合企业(马克诺伊基兴/克林根塔尔)	24000 *
纺织联合企业(卡尔·马克思城)	70000
埃斯达针织品联合企业(塔尔海姆)	16000

\* 1986

资料来源:联邦德国经济研究所,《经济通报》1989年4月;引自《东欧概况》,《东方国家通讯》,第309~311期(增刊:1990年出版)

权力很快被收回到政府各部。从 1971 年到 1973 年，东德原先存在的大部分私有和半私有企业都被国有化。70 年代的混乱状况，比如从苏联进口的原材料的提价和西方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控制的倾向。

### 三 联合企业的体制

1980 年在“完善”体制方面再度调整了方向，采取了一种中间层次集中化的新形式即联合企业。昂纳克认为，联合企业应该成为经济组织的支柱。这种联合企业总数有大约 150 家，涵盖整个工业领域。与原先的企业联合会的区别在于，它们是纯粹的经济团体，它们不仅重视横向联合也重视纵向联合（与供应部门的联合）。这些巨型的垄断组织一般包括 20~40 个企业、拥有 5000~70000 名职工（平均 25000 人），通过它们的战略性的计划，从而减轻集中化管理的重负，同时提高了再分配的能力和内部合理化的能力。某一部门经营业绩欠佳的企业就得受联合企业总经理的领导，而总经理本身往往就是联合企业内部主导企业的经理。

这种联合企业的模式一时间好像为激进的改革提供了另一条迷人的道路。80 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甚至戈尔巴乔夫上台头几年的苏联都对此表示出兴趣。人们认为这种模式的优越性是：获得了规模经济效益（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被高估）、研究与生产得到更好的结合、因而技术革新的推广更加迅速、随着内部自给自足能力的提高从而减轻了供应的困难、更加自主地方便地进行对外交流、在计划过程中企业对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

## 联合企业中的自给自足和“管理的灵活性”

“经济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封闭的再生产循环的观点是指它在自己内部集中了经济循环所需的全部要素，从研究和生产直至销售、外贸和市场考察等。1986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十一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联合企业的生产过程一般包括从原材料、基础材料开始、直到最高层次的加工。……应该发展联合企业使它能自己生产优质的原材料。这是所有高效率工作的基本条件，而且首先是能够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做出迅速反应的基本条件。’可以看出，联合企业即使不是要自给自足，但它仍在寻求最大限度的自主，以及企业的灵活性，以便引导企业面向需求、减少满足需求所需的时间。”

“联合企业不仅将企业集中在一起，而且还将企业联合成一个整体。总经理可以在企业间重新分配生产计划，在联合企业的层次上他集中了科学技术手段和投资。他，而不再是部长，将唯一有权力做企业负责人间的调解工作

并向他们发号施令。对企业负责人来说，联合企业这种形式的改革是一种真正的权力集中，但对各产业部和政府来说，这又是一次权力下放：政府方面失去一部分特权；详细的计划和管理的大权都转到总经理手中，而国家保留确定各项大指标的权力、负责总体平衡以及管理一定数量的战略性产品。总经理成为东德经济中的关键人物。按照一种非正式但逐步制度化的程序，国家经济方面的负责人G.米塔格从1981年起每年召集总经理们在莱比锡开‘讨论会’，总经理们在会议上以个人名义保证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完成年度经济的高目标。就这样，G.米塔格成为临驾于各产业部部长之上的人物。”

资料来源：I. 萨姆森：《昂纳克时代的民主德国或寻找普鲁士式的社会主义》，《东西方比较研究杂志》1989年第20卷，第31～32页。

这种模式相对于传统的部委体制来说，尽管其灵活性有所提高，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很快就显现出来了。这种联合企业的巨型规模和垄断性意味着需要一种强大的中央管理，特别在价格领域。因此，中央运用直接和间接（参数的）手段相结合的、一种相对缺乏条理的混合管理方式。缺乏竞争的压力限制了对经济内部的经营业绩进行比较评估。为国际经验所肯定的中小型企业技术革新的潜力被窒息了。由于追求自给自足而造成的臃肿和专门化的丧失妨碍了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在机械设备和半成品方面（消费品也一样，因为每个联合企业至少要将其5%的生产能力用于消费品生产）。更一般地说，联合企业的模式虽然有时能够缓和但却没有消除短缺经济中的老问题。它在80年代后5年并没有阻止在经济、社会、生态以及最终在政治方面的紧张状态的升级。

## 80年代一些完善体制的措施

许多对传统体制进行调整的措施在建立联合企业过程中出现了。现举三个例子：

——从工资基金中征收特别高的税（70%）用于社会基金的作法从1984年起开始普及，目的在于迫使联合企业和企业减少或限制超员。这种独特的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1982年和1983年，传统的总产量指标（工业产品的产量）失去了原有的重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另外四种指标：净利润、净产量、消费

品和服务总量、出口。联合企业和企业的负责人继续接受一百来个指令性指标。

——在70年代后5年，特别是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在限价方面进行的许多重大的调整。然而提价只限于批发价或耐用消费品；越来越多的日用消费品（食品、交通、住房、电）获得更多的补贴。对新产品的价格实行新的规定，以便企业在二三年中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像60年代以来的苏联那样，企业往往利用这种政策虚构一些“新产品”，从中谋利。



奥塔·锡克

## 第三部分

# 激进的改革

- 8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与非计划化(1950~1964) ..... 73
- 9 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和市场(1966~1969) ..... 85
- 10 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1968~1979) ..... 97
- 11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1979~1989) ..... 115

激进改革赖以确立的总体构想，表现为对传统体制弊端的更尖锐的批评以及对体制调整未能显著地减少这些缺陷的认识。激进改革的捍卫者们对合理调整后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基本上持乐观态度，认为这种制度能够在增长、合理性和社会公正方面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定义缩小到“制度的基石”这一范围。自从计划开始部分或全部地失去集中化的特点以来，尽管继续保留着计划，但这并不能掩盖计划已不能像从前那样发挥作用的事实。激进改革的一个根本主题，准确地说，是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问题。计划应该指导长期的发展并放宽对投资的控制，市场则负责规范日常的微观经济的决策。因此，对传统计划管理的变革——而不再是简单的调整——已经成为这种激进改革的中心任务，如果说这种改革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根本要素的改变，那么它同时也带来了体制中其他要素的一些实际变化：农业、对外关系、私有部门、企业权力。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经历了4次激进的改革。第一次是50年代及60年代初南斯拉夫的改革，改革使之与起初的苏联模式逐渐拉开距离。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两个邻国同时代的两次改革标志着60年代改革的高潮，这两国改革的历史命运，正如大家所知，是相反的。最后，中国在80年代以公认的现代化形式进行了最长时间的改革尝试。

# 8

##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与非计划化 (1950 ~ 1964)

50年代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并没有被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称作经济改革。这种变革的目标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要建设一种以工人自治为特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既不同于苏联的国家干涉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从1948年中断与苏联的关系之后，对苏联模式的批评显得极其尖锐。此外，南斯拉夫变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体制变化具有持续的和累积的特点，它与其他国家时间更加短暂的改革插曲形成对照。然而，如果从引言中所提出的定义出发，南斯拉夫1965年前的经历应属于激进的经济改革，这种改革往往走向体制的解体。

### 一 抛弃传统模式

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新领导人表现得极其正统，特别是在建立传

## 企业中的工人自治

自1950年6月法律颁布之后，“在十多年中，工人自治这个基本的组织原则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企业的所有劳动者和职工构成工人集体。这个工人集体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工人委员会。委员会包括15~120名成员，其任期开始时为一年，近来改成2年。这是一个决定企业政策的组织，它每月或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它选举出一个管理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管理委员会有3~11名成员，其中四分之三必须是工人。经理是企业负责人，他是管理委员会的当然成员。……起初，经理由政府机构任命。1952年，任命的权力被赋予市镇

（地方当局）。1953年，开始采用公开竞选的方式竞争经理职位，在选举委员会中市镇的代表占三分之二的多数。1958年，工人委员会与市镇当局在选举委员会获得均等席位，它们共同负责任命和解聘企业的经理。目前（1976年），企业的经理是通过公开竞选并经选举委员会批准成为候选人，再由工人委员会从中任命而来的。他每四年可以连选连任，但是工人委员会有权解聘他。”

资料来源：B. 霍尔瓦特：《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第157~158页，纽约，夏普出版社，1976。

统的苏联体制方面。他们很快确立了一党制、工业国有化、产业部建制、集中化的计划与调拨、高度的国家再分配、对外贸易的垄断；同时推行了一种重视重工业轻视农业的发展战略。这就是南斯拉夫在一段时间内推行的传统体制，此外还有农业集体化，它从1949年开始尝试，涉及的土地不超过四分之一，但自1951年起就放弃了。

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谴责了铁托的离经叛道，当时作为南斯拉夫主要贸易伙伴的苏联阵营随后对南斯拉夫进行封锁，迫使南斯拉夫领导人对体制做出抉择。南斯拉夫不久实行了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认为这种体制的特点不仅是工人参加企业的管理，而且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以及政府权力的渐趋削弱。南斯拉夫当时谴责苏联体制，认为它是腐朽的官僚主义、是对其控制的国家实行帝国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南斯拉夫从1950年起开始了一场权力下放的运动，其间虽然有反复，但这场运动还是一直持续到70年代。它逐渐削弱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大了各共和国、地区、地方(市镇)和企业的权力。

## 二 一党制的变化

体制的基石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2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更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政府机关中的党组织被取消，上级党组织失去了对下级党组织发号施令的权力。特权制度实际上被取消或削弱了。企业的工人自治和地方自治得到加强。党、国家与经济管理部门之间开始有些分工。然而，党组织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仍很大。特别是南共联盟1958年卢布尔雅那大会之后，联盟要求更多地充当教育的角色而不是领导的角色，但是不接受多党制。实际上，联盟仍然实行一

## 比率制(1951~1954年): 规范附加值分配的一次尝试

在经济学家B.基德里奇设计的计划管理指标化体系中,收入政策与货币政策成为中央调控经济的重要的间接手段。“积累和基金率”的管理是如何进行的?“在估算一个企业的收入和工资支出时,人们会考虑企业的生产能力、潜在的劳动力以及一个标准的工资梯级。这样,收入(扣除折旧)与工资支出的差额就成为当时所称的“积累和基金”(当时人们很谨慎地避免使用“利润和赢余”)。积累和基金率定义为积累和基金与工资支出的比率。企业与地方之间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是中央确定这种积累和基金率的各种标准(作为标准比率);各种税收则作为其补充。然而,这种标准比率在整个经济中无法做到一视同仁。主要原因是分配给企业支

配的资金是无偿的,这就有必要根据各部门情况制定差别较大的标准比率。但是即使标准比率有这样大的差异也没能阻止工资间的巨大差距,因为企业面对的市场条件并不相同(更准确地说,它们处于不同的地位,影响市场的能力不同)。通过税收制度作为补充、以期解决问题的尝试最终失败了,结果使企业间比率的差距加大。正如一位著名的南斯拉夫经济学家解释的那样,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与新体制精神相违背的直接行政干预’,并不久发展到取消借助于积累和基金率来进行的再分配办法。”

资料来源:W.布鲁斯:《1945~1985年东欧经济史》,第51页。

党制（工会也一样），但随着地区和地方机构作用增大，其强度有所减弱。作为经济权力下放的对应面的政治统一化，如同铁托的人格一样，确实在保持联盟的独特性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这期间危机也时有发生：1954年德热拉斯被开除，1966年兰科维奇事件、1970~1971年克罗地亚人的反抗活动等。

### 三 社会所有制与工人自治

工人自治的体制开始于1950年的一个根本法律，它改变了所有制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整个复杂的权利：法律上的占有、管理和控制、产品的占有权、处置权（出售或其他方式）。1953年宪法提到了国家所有制向惟一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所有制”的过渡；南斯拉夫思想家们参考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而这一理论在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学说中已被删除。自从取消了等级控制（产业部和集中领导在1951~1952年被废除）以及肯定了自治企业的管理自主权，社会所有制从此与国家所有制明显地区别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1965年之后，随着企业在增加值的分配以及利润的使用方面取得广泛的权力的时候，这两种所有制的区别进一步加大。“社会所有制”的真实本质问题引起南斯拉夫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无数争论和论战：无论如何它不再是一种国家所有制，国家失去了所有者这一正式头衔，丧失了管理权（经理由选举产生，不再有集中的计划管理）、自由占有权（国家仅剩税收）以及处置权。而且这项处置权从此不属于任何人。

## 社会投资基金

1952年，联邦预算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行政支出，另一部分为各种参与和投资基金（特别是基础资本发展基金，它继续发放投资资金而无需偿还）。

“1952年，联邦政府将几乎所有的投资资金都集中在它的投资基金中。…第二年，一些资助投资活动的基金就设立了。企业建立它们自己的投资基金，其资金从计划规定的利润中支出。这两种措施给形成资本的资金投入下放很大的权力。1954年这种体制获得了更加持久的形式即在联邦、共和国、县和市镇各级都建立了社会投资基金。从那时起（直至60年代的改革），社

会投资基金向生产企业发放贷款，而政府预算则继续为非营利部门（学校、医院、行政机关等）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1955年，设立了住房建设的特殊基金。社会投资资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它的创立对人们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各级政府不断受到巨大的投资压力。由于基金已从预算中分离，所以它们的资金有膨胀的趋势，远远超出社会计划预计的数量。在1955~1960年期间，投资总量超过社会计划规定目标的20%。”

资料来源：B. 霍尔瓦特：《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第219~220页。

## 四 附加值的分配

1952年，农产品强行上交的做法被废除了，大多数价格正式放开。1955年起，开始实行政管理物价体制，它包括下列各种措施：对一些产品或服务规定固定价格（电、交通、糖、油）、对某些生产资料规定最高限价（冶金产品、煤、石油）、所有提价措施均须向联邦管理部门提前申报、在一些紧急情况下采用冻结物价的办法。……但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只是在60年代才有所抬头。因此南斯拉夫从用行政手段规定物价转变为对物价的调控，从而在这方面留有灵活处置的余地。至于企业中分配增加值的规定，它是随着工人自治立法的变化而改变的。在1951~1954年实行“比率制”之后，开始推行“利润分配制”。根据这种方法，工资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财务工资”（或称最低工资），另一部分工资取决于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营业税和利润税）。此外，当时对固定资本征收6%利息，作为支付社会资本的使用价格。1957年，工资中可变部分的收入上升到占全部工资的10%。1958年，在表明要取消过时的工资和利润等级的同时，开始实行“收入分配制度”。根据这种规定，今后原则上由工人委员会决定“个人收入”（工资）和各种基金（包括投资基金）之间的分配比例。这项自主权只是1961年之后才真正起作用，因为1961年工会和市镇失去了对企业中纯收入分配和工资梯级的控制权。1958年出现的工资失控局面进一步加剧。1961年起，开始出现通货膨胀，一些经济学家将之归因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特别应该看到另一原因即直至当时仍相当有效的控制工资增长的措施（税收、工会作用）已被取消。

## 五 中央再分配的衰落

如果说工人自治的企业在工资分配方面的自主权逐渐增大的话，

## 银行体制的多样化

“1961年3月15日的银行法大大加强了市镇银行和专业银行在投资拨款方面的作用。直至1954年初，国家银行仍通过其分支机构体系，一直垄断着南斯拉夫的银行业务。1954年1月28日，银行与邮政储蓄法准许市镇当局设立自己的银行，以便经营商业银行的业务，同时监督地方预算在各地的实施情况。在50年代剩余的那几年当中，市镇银行体系与国家银行的部门体系共存和平行发展。

专业银行（南斯拉夫投资银行、农业银行和外贸银行）成立于50年代中期，目的是管理联邦的投资基金。国家

银行也拨给它们资金，使它们能够自主地提供信贷。1961年3月15日的银行法规定国家银行不再行使商业银行的职能，这项职能从此成为市镇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唯一特权。虽然整体上说这三个专业银行只控制商业银行系统65%的资本，但这对地方来说仍然是一次重要的银行职能的权力下放。投资基金体制仍将再维持两年不会受到触动，直至1963年对其进行改革为止。”

资料来源：C. 普劳特：《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第24~25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

那么这种趋势在提供投资资金方面也同样显现出来了。然而，虽然企业自我投入增加了，但是利润提成比例和再分配比例直到 60 年代都保持相当高的水平。建立在各级行政机关中并以税收作滋养的社会投资基金仍处于主导地位，但是联邦基金的份额在减少，而共和国特别是市镇的基金增加了。1953 年宪法使市镇在经济领域的权力大大加强，市镇尤其是在确定企业地方税方面获得广泛的权力。人们看到市镇往往对效益好的企业课以重税，用于资助其他受到地方政策照顾的企业所提出的雄心勃勃或经常缺乏可行性的计划。人们还常常提到市镇当局建立“政治企业”的举措。

投资方面的权力下放之所以在这段时间是有实效的，并且取得了进展，主要是因为联邦的作用减小了。从企业的角度看，投资方面的行政控制或介入仍相当多。再分配的比重仍然很高，但是由于各共和国以及市镇的作用不断加强，再分配方面的集中程度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高。60 年代中期即临近 1965 年的自由改革时期，商业银行和信贷在提供投资资金方面的作用大大加强。

## 六 社会计划

1950 ~ 1964 年间南斯拉夫改革的根本特点不仅在于工人自治的创新和所有制形式的变更，而且主要是取消了集中化的计划。即使利润的再分配和单一银行体制退出舞台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 50 年代初随着等级控制、目标分级管理、集中调拨和控制工资基金等做法被一一取消，改革就触及了斯大林模式的核心。南斯拉夫这时实行的改革基本上是一种间接的和指标性的宏观经济计划，然而其主要的方法

## 投资的资金提供:从预算到自供资金和信贷

以资金来源划分的固定资本投资情况①(百分比)

	1948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60	1962	1964	1966	1968	1971
基金与社会预算	99	98	98	87	74	64	52	59	36	16	16	15
联邦	60	50	95	71	50	47	37	30	7	6	9	8
共和国	27	41	2	11	12	9	7	9	8	3	3	3
市镇和县	12	7	1	5	12	8	18	20	21	7	4	4
劳动组织	1	2	2	13	26	35	37	38	32	46	37	34
企业	1	2	2	13	26	27	31	30	26	39	31	27
非营利机构	-	-	-	-	-	8	6	8	6	7	6	7
银行	-	-	-	-	-	1	1	3	32	39	47	51

①不包括私人投资。

资料来源: B. 霍尔瓦特:《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第 222 页。

## 改革的另一方面:对外贸易

1951年,原先对外贸易垄断部门实行的数量控制体制被一整套复杂的进出口补贴和税收做法取代,其基础是17个从0.8到4的“价格平准系数”。这个体制的目的是要使贸易结构与社会计划的投资目标相协调,但效果平平。这一体制实际上仍然使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保持着隔离状态(我们看到,与苏联有关的那些国家的封锁迫使南

斯拉夫将其贸易转向西方)。1961年,南斯拉夫对外贸易改革更加深入,多种汇率的做法被取消了,而贸易的数量限制也逐渐代之以海关关税(仍保持一些进口额度和一部分出口奖励)。这种新的观念与当时南斯拉夫希望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成员国有关,同时也也受到西方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鼓励。

则是：对大量的投资进行控制。

1956年，国家的计划变成以更广泛的参与和协商为基础的“社会计划”。中央主要是制订那些“大的比例指标”计划：积累率、通过普通投资基金进行的投资分配、集体消费的比例。企业则以这些大比例指标为基础，结合市场情况，自主地制订生产计划。50年代后5年，南斯拉夫重新对发展战略作了调整，以便有利于消费品生产的发展。这是一个发展迅猛的时期。60年代初经济危机的动向与计划管理的危机正好相吻合。

## 更加普遍的市场模式

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68年出版的内部研究文集中，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即如今以极端自由主义著称的财政部部长V.克劳斯批评了以“简单商品生产”为基础的有关市场的狭隘观念。他写道，“如果没有两个平行的市场存在”，就不能解决“商品市场的问题，即在商品价格中加入生产要素的价格：劳动力价格和资本价格”。应该建立“货币市场”，使投资者能在实际投资或“其他非实际经营”之间做出选择。“只要投资者不做这样的权衡，只要没有一种利率能够调节资金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合理分配，经济就不能平衡发展，这种制度将继续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目前信贷和利息的存在不表明货币市场的存在。“只有当有可能选择资金的去向时，当一部分资金从商品市场上的现金转变成金融资产

时以及当货币开始成为微观与宏观经济活动的工具和联结现在与未来的要素时，货币市场才能出现，否则就不会出现。金融市场可以通过发行一系列国家的、公共的、银行和企业的债券的方式建立，它对经济体制的合理运行会有显著的贡献”。

至于劳动力市场，不应将它等同于失业，而应将它看作“消除目前存在的安逸和虚假安全感的工具，同时还作为消除劳动力的静止特性和消除劳动力不恰当的及刻板的运动的工具。这样就能给劳动力带来生气和活力”。

（80年代匈牙利一位有影响的改革者M.陶尔多什在其论著中再次提到这一论点。）

资料来源：《通货膨胀、工资和市场》，经济研究所，布拉格，1968。

## 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和市场 (1966 ~ 1969)

### 一 第一次浪潮的经验

1958 ~ 1959 年间,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开始了一次与当时波兰改革相似的体制调整的尝试。这种调整有三个目标:希望以牺牲年度经营计划为代价加强中长期计划的作用,使企业避免年度计划的不稳定状况;为了与掩盖生产能力的行为作斗争,促使企业提出比预计更高的目标,企业采用了“反计划”的做法;下放部分投资权力。这最后一种情况与工业集中化的努力有关,即企业通过联合组成近 400 个“经济生产单位”,这些经济生产单位是体制调整的第二次浪潮中众多典型的联合会或联合企业的前身。1958 年进行了价格的调整。由于党内的政治清洗和对外贸易变化的影响(苏联优先地位的变化,1961 年与中国关系的破裂),这个改革很快就消声匿迹了。

受赫鲁晓夫七年计划和中国大跃进的影响,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

## 大幅度发展的终结

“在劳动力全面匮乏的情况下，在（活的和物化的）社会劳动的总成本开始比社会生产增长更快的情况下”，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就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正常的大幅度发展会演变成负面增长，从而对不断增长的资金投入的需求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最终完全破坏了这一增长的进程。”

“因此，如果当初存在的大幅度增长的条件逐步消失，如果不及时认识到这一点，继续坚持（原先的）的经济政策、保持（原先的）的计划和管理程式，那么，在一定时候必定会走向失败。随

着大幅度增长的源泉的干涸，尽管有计划指令（在大幅度增长经验的基础上规定高增长率），增长率仍将减慢，同时，落后的社会生产率和与大幅度发展相关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投入之间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加深。”

“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所经历的情况。”

资料来源：奥塔·锡克：《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第56~57页，布拉格，科学院出版社，1967。

“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但是紧接着在 1963 年前后它却经历了所有东欧国家中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直到 1961 年仍然失控的（集中化的和非集中化的）投资剧减，1963 年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下降，这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史无前例的。危机结束了重新集中化的进程，但同时揭开了 60 年代中期激进的改革运动的序幕。

1965 年，横向和纵向的工业集中化加剧了，经济生产单位减少至 102 个巨型的“产业单位”，每个单位平均有 3 万职工。采取了一些新的革新措施作为试验，如从指令性指标过渡到以总收入或利润作为管理标准的做法。但是，尤其是多年来在科学院经济所工作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群体与所长及代言人奥塔·锡克一道，越来越公开地提出他们的管理体制的新方案，与官方完善和调整体制的观念发生了冲突。

## 二 市场和人道主义面孔的社会主义

为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准备条件的改革观念应该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反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中进行阐释，这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希望通过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隐蔽方面，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再现生机，同时又不触及这种体制的制度基石。这一思潮延续了南斯拉夫的某些做法，或者说是波兰有创造力的“修正主义”的继续，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反映在奥塔·锡克或 Z. 姆利纳日的著作中的这一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有关“社会利益”的问题。在反对社会均一化和普遍利益至上这些斯大林主义教条的同时，他们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或集

## 一九六六年改革者提出的模式

经济改革计划是由一批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研究人员在1964年前后制定的。这一批学者的领头人奥塔·锡克当时向党的领导集团辩护他的观点（他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所属的经济委员会的成员）。1966年在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介绍了改革计划（在政治局的O. 瑟尼克详细阐述官方的有关体制调整的不同的构想之前）。他提出的改革原则如下：

- 计划作为外部运行机制必须通过重新建立市场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自我调节的内部机制来加以补充。

- 计划只能规定宏观经济的总体发展。

- 企业应该有自主权，以便它们能够根据生产和市场条件的变化作出反应，企业不应服从计划指令。

- 经济调节应该取代计划指令。中央机构应通过对所有企业相同的法定标准（游戏规则）优化经济比例，管理和规范企业收入的再分配，管理信贷、利息、税收和折旧等。这些游戏规则应该是长期稳定的。

- 各专业部应该取消。远景规划和投资等的协调职能将由企业联合会承担。

- 企业与政府机关不再是从属

关系。法律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 对外贸易的垄断做法要修改，对外贸易的权力下放到联合会或企业。

- 总收入成为企业经营的标准，其使用（扣除应付款项之后）则是企业自己的事情。

- 为了鼓励竞争，经济应该逐步向世界市场开放。向可兑换货币的过渡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 改革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在部门间和部门内）调整批发价的水平。

- 参加企业联合会将是自愿的，企业可以自由地加入或脱离联合会。

- 将实行三种类型的价格：中央规定的固定价格（基础产品：原材料、食品）、限定价格（中央规定一个最高价和最低价）、自由价。

- 实行固定资本税，恢复利率的积极作用以便突出资本在创造价值方面的作用，使得合理的经济核算成为可能。

- 工资水平将取决于企业的总收入。国家只保证最低工资。

资料来源：R. 塞卢茨基：《东欧的经济改革》，第86-87页，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2。

体利益的多样性及其潜在的分歧，同时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表达和协调这些利益的复杂的机制来满足“普遍的社会利益”。计划与市场决不是对立的，它们应该在这样一个目标下结合在一起。探索与体制基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重新发挥工会的作用、一种“结构化的社会所有制”的观点（即将各种形式国有企业与集体或个体单位结合起来）、政治与经济民主的问题，所有这些“布拉格之春”的内容均与这一主题相关，它表明传统模式的一种地方化。

在激进改革的历史中，1968年经验的特殊性在于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经济改革进程的相互配合。这一特殊的结合使得经济改革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否则则不然。众所周知，这也是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担惊受怕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苏联军事干涉的最终原因。而苏联的军事干涉结束了这场绝无仅有的插曲。

### 三 价格、工资和就业

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改革的原则1965年才被正式采纳，1966年党的十三大决定“加速实施”改革计划。批发价格的调整是其中一项措施；根据匈牙利的“双渠道”程式（成本+6%投入资本+25%劳资基金）重新计算物价，1967年实施的新价格比原先计划的要高（上涨29%，而预计为19%）。面对物价管理部门，企业明显地抬高了成本。1966年受南斯拉夫启发，捷克斯洛伐克实行三种不同类型的价格：固定价、限定价和自由价。后两种价格将逐步扩大实施的范围。但是价格高速上涨扰乱了其他方面（工资、投资的资金投入）的改革：价格的自由化很快受到制止。

## 阻碍科学技术革命的行政管理

在一本国内外具有很大反响的著作中，以哲学家 R. 利赫塔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一个跨学科群体认为科学与技术革命是当今世界普遍的和根本的需要。这本著作批评当今的管理体制缺乏生气和反馈能力，并对“人的要素”有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革命内部的主要阻力，根据它们自己的材料，是经济结构以及社会主义类型的经济管理手段和激励措施的落后状态。……这表明，能够实际并全面地促进企业的社会主义精神、增进各层次人们的经济创造力、合理地降低技术革新带来的风险、惩罚惰性和保守思想的社会主义经济蓝图还没有制定出来。

“捷克斯洛伐克的具体经验证明，来自中央的行政管理已经本能地与工业化进程相联系，而在这进程中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和全面发展人类生产力都被放到次要地位。因此，这种管理形式只是通过社会劳动总基金将社会的激励机制与生产的数量增长联系在一起，

它不具备能够普遍合理地使用社会劳动并通过这种方式进而实行优化经济、促进有效发展的手段。它只将社会主义激励机制用于最大限度完成中央下达的生产任务；相反地，在实际中，通过维持现状（对现代技术、消除无效劳动及有效使用资金等极其反感），这种管理方式会引起和刺激企业及个人的胃口大增并带给它们一些非社会的局部小利。而这种小利将社会引入到与科技革命背道而驰的自发的和广泛的运动之中。工业生产的广泛发展只是扩展了现有的手段，它并没有充分借助于科学和研究、借助于新的组织方式和档次的提高。结果是建立在运用市场手段之上的经济改革和新管理体制如果不全面彻底地采用激进的解决办法，就不能在一个工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质量方面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

资料来源：R. 利赫塔：《十字路口的文明》，第 96～97 页，瑟伊出版社，1974。

至于工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希望仅仅通过税收措施控制工资基金增长的做法始于 1966 年，它们对超出计划限度的增加额征收渐进税。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在工资增长的压力下以及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日益高涨的呼声中，这一完全间接的管理措施很快就寿终正寝了。

在投资方面，通过借鉴 1964 年以前在南斯拉夫占主导地位的制度，1967 年捷克斯洛伐克开始采取一种新的制度。改革者认为，来自利润留成的自供资金和银行信贷今后应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分别为 25% 和 60%；只有 15% 来自国家财政）。企业由于价格因素和再分配的减少而增加了收入，并带来了企业扩张的冲动，其结果使得投资过度增长且过于分散。这种情况促使当局重新回到行政控制的做法上面。

1967 ~ 1968 年起，捷克斯洛伐克的激进改革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工资和投资领域直接控制的削弱使得这两方面的膨胀失去控制；而税收和货币（信贷、利息）的间接控制措施显得非常脆弱而不能发挥作用，加之保守派领导人和广大社会阶层长期以来担心通货膨胀，因此，促使当局又回到集中化的控制和决策上面。

#### 四 间接的计划管理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与 1968 年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共同的根本点，也就是使它们成为激进改革的根本因素，是两者均取消了强制性的计划以及资源的集中调配。1967 年，中央除了有限的“特殊的指令性目标”和进出口目标（1969 年正式取消）之外，原则上停止了向中间环节和微观经济单位下达指标。改革规定，中央只能通过长期的（税

## 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苏联入侵后于1968年8月在维索康尼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秘密大会上，通过了一整套社会组织计划。

“根据工人自治的原则，重新恢复工会的独立地位。在企业中，三种力量将一起共处：工人委员会、企业领导与工会。工会代表职工利益，工人委员会代表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企业领导代表管理者的利益。

工人自治的体制应与代表制结合在一起，议会应考虑其附属的专门委员会的意见。

“因此，议会的工业委员会应从工业、商业、交通、物资服务等行业的企业和车间中选拔；农业委员会应从集体或

国营农场选出；最后社会服务委员会应从卫生、教育、文化和科学机构选出。这些委员会拥有专门的权利：有权将本领域的法律送回二读，有权在与其有关的问题方面监督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等等。从生产出发的选举原则保证，为某一特定经营活动而要决定管理和协调问题的国家机构成员应从有经验的人员中选拔；他们应对专门委员会负责，专门委员会则负责对其监督、任命或免职。在普遍意义上的民主就这样与职业意义上的民主相结合，国家机构（及传统代表制）将与工人自治结合在一起。”

资料来源：R. 塞卢茨基：《东欧的经济改革》，第100~101页。

收)和短期的(货币、价格等)间接经济调节手段来管理经济。同时,除了个别产品外,物资和技术供应也被取消了;企业被允许跟供应商与客户建立直接的联系。纵向的联系削弱了,横向的联系扩大了:这种(指导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

改革者赋予企业在自主权方面的两个特别之处值得一提。1968年,所有企业可以从事自己原先专业领域之外的其他经营活动、甚至建立新的企业(这项权力也被赋予了政府机关),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自由地加入或脱离更大的生产性组合。在这个资金流动的做法之外,还有一个使各企业处于平等的起跑线的计划:过去,政府给企业的财政拨款千差万别,而现在企业必须在17年内将它们的资产逐步地“退还”给国家。

## 五 工人自治的范围

所有制与国家分离的改革观念是与工人自治的原则相联系的。1968年春天,奥塔·锡克开始支持这一原则,目的是要争取工人大众支持经济改革。在有关这一主题的争论当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与南斯拉夫提法接近,第二种对干部和专家比较重视,第三种则是综合前两者。1968年夏和苏联入侵以后,一些工人委员会在企业中自发地组织起来,一些劳动者(甚至工会)当时都将工人自治看作是反对占领的基本手段。

1969年1月的社会主义企业法草案是“正常化”之前最后一些改革性文件中的一个,它规定了企业的三种类型。国有企业仍由政府各

## 改革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虽然有种种缺陷，但是捷克斯洛伐克1967年1月采用的制度是可行的。尽管1966年经济紧张状态加剧了（部分由于企业改革的提前，如同1967年的匈牙利），1967年政府实行的紧缩政策却与1968年的匈牙利一样取得了同样的成效。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国内和国际平衡得到巩固。两国改革的成果也相似：供应比从前更好地满足了需求。1968~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空前的需求大爆炸，由于消费品供应的增长而很好地得到解决。

紧张关系确实在这些年加剧了，但不应忘记：捷克斯洛伐克在1967年改革中和匈牙利在1968年改革中实行的新的经济体制取消了绝大部分传统的强制性计划，但并没有允许竞争的市场出现。市场并不真正对企业起约束作

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正式和非正式权威，下级服从上级的意识，这些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从长远看它们能造成企业瘫痪，但从近期看则起着稳定的作用。1967年及1968年第一季度，像1968年及以后的匈牙利那样，这一因素在捷克斯洛伐克起着作用。但是1968年3~4月以后，随着党的政治权力的增强，政府对经济的领导权就逐渐丧失了，工资和投资增长加剧，政府不再能抵御这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脆弱性显得特别明显。”

资料来源：T. 鲍尔：《成功与失败：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经济改革的出现》；收入K. 多普费尔和K.F. 赖布勒编辑的纪念奥塔·锡克文集《经济体制的变化》，第255页，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0。

部控制。在这些国有企业当中，政府各部任命大部分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在非国有企业中，创建者（一般为单位）任命大多数成员。但是那些法律上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公共所有制”企业占绝大多数，其委员会行使管理者的职能，其成员主要由职工选举产生，只有少数成员由外部机构（部委、银行……）指定。委员会拥有监督管理的职能，它通过竞争来选拔企业负责人。

## 六 正常化

改革的命运在 1968 年之后曾一度不明朗，但在诸如工人自治、企业自由联合（自 12 月以来进行了一些企业重组）、减少行政机构（1969 年 1 月取消了矿业、能源、重工业、化工、消费品等几个部）等领域，改革仍在向前推进。一项有关向全面指标体系过渡的计划管理法律直至 1969 年夏仍在制定之中。1969 年 4 月杜布切克被解职并由胡萨克取而代之以后，那种取消改革、回复到传统体制的做法开始分步骤地进行：这一进程在 1971 年和 1972 年完成。改革者当时被看作是“右倾修正主义者”，认为他们是要将经济带入自由市场，也即“完全的无政府”状态。

## 经济体制的概念

匈牙利学派的一个贡献在于明确区分了经济中形式上的“管理体制”与体制在实际运行中产生的现实的经济关系。拉斯洛·安托尔是这样阐述经济体制的：

“除了计划管理、激励与财政调节体制、企业与经济管理机构（它们共同构成经济管理体制）的组织体制之外，它还包括上层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机构、社会机构和企业间不明确的关系以及各决策层之间决策权力的实际分配（不一定要跟现在的法律规定相符），还有内部管理和企业的动机。在所有这些的背后，可以发现有关利益与权力关系的清晰的脉络。规律性、行为和反应的标准以及受这些因素广泛影响的适应标准也同样包括在里面。在一定时期内，经济体制的实际运转总是具有所有相对稳定的基本要素的特点。”

“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要素，经济

管理体制就包括那些直接受中央影响的因素”。通过改变这种管理体制，中央进而能够影响到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或者在（反应的）规律性方面造成了与原来期望不相符的进程，中央采取的变革措施就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或者说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实际上，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主要由企业与各机构间的关系、上层影响与决策的实际体制、企业间的具体分工、经济主体的机遇及各层次的动机等因素决定的。正是这些因素使得直接调节不再可行。”

资料来源：L. 安托尔：《70年代匈牙利经济体制：偏离主题的发展》，1979年，收入J. 科尔内和X. 里歇编辑的《匈牙利的道路：经济分析与实验》，第99~100页，卡尔曼-勒维出版社，1986。

## 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 (1968 ~ 1979)

1968年匈牙利的改革是经好几个经济委员会多年酝酿而来的，这些委员会从1963年起就在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R.涅尔什领导下工作，他是这一新经济体制的真正设计师。这次改革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经济学家之间以及经济学家与政治领导人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而R.涅尔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60年代的“卡达尔主义”即东方开明的专制主义，有时亦称作“土豆烧牛肉的社会主义”，为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将限于经济方面，它不会延伸到政治或国际关系领域。新经济体制的制定带来一些妥协，例如保留政府部的结构或采用了行政管理这一“篱笆墙”。这些妥协从某些方面说是新经济体制的前提，但它们同样也是实施新经济体制的阻力：这就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普遍矛盾……

正如同时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那样，新的经济体制与W.布鲁斯理论中的“分权模式”有关。它是一种宏观经济计划与“有管理的

## 计划、市场与调节手段

“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点在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将中央计划管理与商品关系、市场的积极作用结合在一起。”

“近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就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关系和金融关系的作用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参加这一讨论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将商品关系看作是与社会主​​义相排斥的论点，不赞成将它看作是‘无奈的阵痛’，因而要继续限制并消除它。人们终于认识到商品关系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然存在并起作用，而且为发展的目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好地利用它。因此，必须努力使商品关系及其派生的各种范畴如市场、价格、生产成本、利润和信贷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

“我们的改革所面对的市场的使​​用，与资本主义市场中现存的关系区别很大。我们希望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市场而不是自发的市场。不仅如此，在我们的体制中，另一个根本的区别是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以及在扩大再生产方面投资不取决于市场的状况，而是国家自

觉的计划方针从中起着决定的作用。”

“如果企业不再接受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国家计划与企业计划之间的所有联系不就停止了、所有的关系不就消失了吗？这种情况当然是不会发生的。即使是将来也一样，国家计划仍将起决定作用。相反地，在国家与企业间起联系作用的将不是任意规定的计划数量指标，而是经济调节手段。经济调节手段即使不是更加有效，至少与计划指标一样有效，它同样能够在较长时期内解决总产量、就业率、个人收入的预期增长等方面的问题，而且不需要对企业分别量体裁衣，所以，就不会像计划数量指标那样每年一月一日要‘从天而降’。它们的主要好处在于，在促使企业按国家经济政策工作的同时，这些经济调节手段并不会束缚企业经理们更好地使用生产资料，并迫使企业经理们和他们的合作者从长远角度思考问题。”

资料来源：《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R. 涅尔什的访谈，布达佩斯，潘诺尼亚出版社，1969 年版，第 9、10 和 13 页。

市场”通过调节手段相结合的体制。这些调节手段是政府指导企业经营方向的“经济手段”，它与传统的行政手段正好相反。市场应该根据总目标以间接的方式由统一的或参数的手段如价格、工资、税收、信贷等来指导。实际上，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型的“计划经济”，即介于传统指令性计划与法国式的指标化计划之间的一种经济。尽管集中化的管理和调拨已经废除，但中央仍保留总体计划的制定。从某些方面看，今后国家所有制中出现的经济政策主要将是有关政府对经济活动整体形势的把握。

## 一 废除指令性计划

1968年1月1日实行的新的游戏规则主要是废除了集中化的生产计划（逐级分配生产目标）和供应的行政定量配给。各企业制定的年度计划不再是上级计划的一部分，企业也不再需要将计划上报主管机关。此外，企业直接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商务联系。国家计划不再逐级分解为企业计划：国家计划通过一般的调节手段来影响企业计划，而不再通过具体的和个体化的指令来影响企业计划。

虽然企业的自主权后来在行政上受到了限制，但是新经济体制则将企业的自主权从数量和质量上扩大到所有体制调整的实践都从未曾达到过的水平。新经济体制有两个特点值得重视。首先，新经济体制的实施相对地和几乎出人意料地容易，这大概是因为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初级阶段的变革，而且在实施这种改革时对宏观经济的压力比较小。其次，1968年同时采取的改革措施起到了互相促进的效果，以致于尽管70年代权力重新集中，大家也决不会返回到指令性计划和集中化的调配做法上面去了。

## 对等级管理体制的否定

T. 鲍尔认为,取消各部与企业之间中间环节上的管理机构是1968年“一揽子”改革计划中的基本内容,而这正是196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82年的波兰所缺乏的。

“我认为取消全面的等级管理、取消强制性的计划管理和资源的集中调拨,此三者是改革的三个根本点。在完善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普遍的等级管理体制总是在不断重组而且被保留下来。50年代末从部门原则到地域原则的过渡(苏联、保加利亚)、财务自主的大型单位的建立(东德的企业联合会,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生产单位,70年代波兰的大型经济组织)或比较小型的、技术上比较封闭的单位的建

立(70~80年代东德或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企业),这些均没有动摇这样一个原则,即所有的经济单位都构成惟一的全面等级制度的要素,并且行政上仍然服从中央领导。在匈牙利新经济体制中,中间环节的管理机构除了已转变成“国有大型企业”管理中心那类机构以外,其余均已经取消。其他企业(不管是否为国有企业)都正式从隶属于政府机关的状况下解放出来(虽然经理等至今仍由各部任命),这对许多中小型企业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解放。”

资料来源:T. 鲍尔:《改革或完善经济体制》,《欧洲经济评论》,第31卷,1987年第1~2期,第136页。

## 二 价格形成中的灵活做法

价格在新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反映了当时改革已相对成熟。总的方针是减少中央对定价的控制权，将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接轨，使市场的力量介入到价格的形成当中。实行的第一个变革措施显得很平庸：即1968年为了缩小收益差距，确定了新的更合理的批发价。但是，这种新的管理结构的建立，主要是考虑到国外的市场价格（新的价格通常是过去的国内价格和进口产品的价格的加权平均数）。此外，这次批发价的调整当时宣称是最后一次，而调整也仅涉及一部分价格。实际上，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相似，1968年匈牙利实行了四种价格：固定价、最高限价、剪刀差价、自由价，同时，提出了逐步减少固定价数量的目标。前三种价格实际上区别很小，对最高限价或剪刀差价都普遍规定了上限，所以，自由价格的实施是根本，它原则上涉及四分之三制成品的批发价和差不多四分之一消费品的零售价。由于当初开始阶段通货膨胀率很低（头三年里零售价的上漲率小于2%），使得人们有进一步扩大自由价的愿望，但是70年代的内外压力使得对价格的控制更加严格，因此使大家很失望。向全面紧缩和定期修正的回归并没有因此而取消当初的灵活做法，也没有掩盖在相关的价格上的差距相对缩小。所以，在70年代，匈牙利每年都在行政上进行消费品价格的调整，同时通常还给予一些工资补贴。

## 三 对企业收入的管理

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减少再分配并使之更加合理化。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要在企业中实行更加统一的税率，使企业能够留存一部

## 减轻外贸的垄断

“改革也曾预见到，对外经济关系体制的变化会带来竞争力的提高。改革试图减少分隔国内和国外两个活动范围的障碍，这种障碍在过去曾是一种制度的产物，在那种基本上自给自足体制中，对外贸易被看作一种残留因素，特别是当贸易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国家时更是如此。这方面的改革可以总结为五个措施。

1. 在对外贸易的计划中以方针和总额度代替实际的目标，尽管在与其他经互会国家的贸易中在这点上显得困难重重。

2. 有资格从事外贸的国内经济单

位明显增加……

3. 借助于官方汇率，考虑到最高的理论限度，建立进出口贸易价格与国内价格的联系。

4. 更多地运用根据物品和产地不同而来的差别关税以便抑制进口倾向。

5. 扩大各种形式的与西方公司的工业合作，1970年甚至允许西方公司少量向匈牙利企业参股。”

资料来源：W. 布鲁斯：《1945~1985年东欧经济史》，第234页。

## 投资的常见问题

“在这方面，运用企业资金和银行信贷进行投资的决策权力的下放，并不能治愈传统投资活动的痼疾。虽然企业的自主权增加，资本生产率并没有改善。银行审查投资计划（包括按国际价格计算预期的收益，也多少成为一种形式）显得并不有效，长期信贷扩大到政府希望的投资项目。投资的增长超出了经济发展能够承受的限度。考虑到改革

的不良运转，而且企业所拥有的投资基金比预期的多，最终造成了投资的巨大波动。缺乏条理的改革并不是惟一原因：罪魁祸首是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旧的经济增长战略。”

资料来源：J. 亚当：《60年代以来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改革》，第83页，麦克米伦出版社，1989。

分实际利润,以此来促使企业增加利润,改善企业的效率、更好地满足需求。1968年实行的新税率包括5%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税。这种统一税率对企业来说意味着原则上停止随意征税的做法;然而,为了避免过高的利润、调整留存的利润在奖金和投资中的分配,实行了增值税和利润税。这表明还远没有达到“参数”管理的水平。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显著地降低了营业税、统一了税率(税目急剧减少,从专门税改为从价税),从而使批发价与零售价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一旦付清各种税之后,企业将保留利润的节余部分(和60%的折旧费)。这些利润节余将按规定的比例分别注入到“投资基金”和用于发放奖金的“共享基金”之中。

#### 四 投资方面的局部放权

根据当时激进的改革思想,国家应该保留对“扩大积累”的领导地位。因此,中央继续控制大型投资项目并通过国家财政提供资金。尽管如此,资金的无偿拨给还是逐渐地被有息贷款所取代(这一转变在1976年完成)。对于小型投资项目,新经济体制允许企业通过自供资金(留存的利润)和借助于银行信贷,自主地作出投资决定。在匈牙利,银行信贷在投资中的作用跟捷克斯洛伐克相比更加有限;只占总投资的20%。

改革后的第五年,在总投资中国家财政的投入占47%,自供资金占43%,银行贷款占10%。实际上,“自主的”投资方面非正式的集中化仍然很高;真正权力下放的投资只占15~20%。

## 奖金和分配冲突

“改革者认为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企业的经理，因此，他们实行了一种等级分明的奖金规定。为了使这种奖金制度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还建立了保障收入的反向的等级制度作为配套措施。将共享基金用于奖金分配时，有三种类型。第一类为企业最高领导，其奖金数量可以达到收入的80%（收入保障为75%）；第二类为部门负责人即中层领导、工程师等，他们这一组人的奖金可达到收入的50%（收入保障为85%）；第三类为普通劳动者，奖金不超过工资收入的15%，但是收入保障为100%。

“这种奖金分配制度远没有受到基层工人的欢迎，这不仅有物质上的原因，而且还因为这项制度本身对工人有

歧视。此外，在共享基金的使用当中这种分配制度还引起了利益冲突。企业的领导者希望将共享基金最大限度地用于发放奖金，奖金数的增加达到工资基金的1%，企业领导者的收入将增加4~5%，而普通劳动者收入只能增加0.7~0.8%。出现政治上的紧张状况之后，政府取消了这种奖金的分配制度。为了稳定企业领导者的收入水平，实行了一种新的奖金制度。这种新的奖金制度被认为不会再与工薪者的利益发生冲突。”

资料来源：J. 亚当：《60年代以来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改革》，第80~81页。

## 五 工资与就业

在确定工资方面，新经济体制所作的变革是渐进的和复杂的。正式取消由产业部确定企业工资基金的传统体制（尤其是确定工资提高的上线）并决定今后企业将自己挣得所需的工资基金，这就触及到集中化的计划管理的一个根本点。然而事实上，工资方面的行政干预还是很频繁的，其形式为经常变更规则和税率。尽管这样，还必须指出，工资领域的行政管理同其他许多领域一样，都变成更加间接的管理。首先实行了平均工资的规定。这项措施的意义在于避免改革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在1968年以前的论战当中，人们就已经提出这个观点，同时大力强调了充分就业的原则。中央通过确定平均工资的做法，促使企业用减少一些工人工资的方法来补偿另外一些工人工资的提高，以避免解雇工人。

从1971年起，人均毛收入（利润加工资基金）成为衡量企业业绩的指标。毛收入每增加1%，基本工资就能增加0.3%。对于增加之后的平均工资要征收50%的税（对附加工资），当平均工资超过允许的限度时则须从工资基金中支付累进的附加税（新增工资的150~400%）。

这些原则的宗旨是要为政府提供防止工资过度增长的新对策。同时，新经济体制为企业负责人在确定就业及其结构方面规定了更大的灵活性。此外，原先将劳动者禁锢在工作岗位上的规定被取消了，劳动力允许流动。

## 各经济部门的冲突及互补

“匈牙利经济包括多种经济部门：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并存和相互竞争。但是竞争并不是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的。简单地说，在当局眼里它们先后的优先次序为：1. 国有大型企业；2. 国有小型企业；3. 农业合作社；4. 非农业合作社；5. 正规的私有部门；6. 非正规的私有部门。”在发放信贷方面也存在这种次序：对于微观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价格和工资的确定方面，干预的次数也同样适用这种情形，只是次序相反。

“各部门之间存在既互补又竞争的

倾向；它们间有冲突。在国家的排行榜上位次较低的部门痛苦不堪，因为在当局负责的许多调拨中，这些部门往往受位次比较优先的部门的排斥。与此同时，这些位次较低的部门通过市场竞争能够将受国家偏爱的部门排挤出去。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劳动力短缺。简言之，匈牙利经济是受政府间接控制的国有部门与面向市场的、行动上受到当局种种限制的非国有部门的一种紧密的结合。社会各部门中的共存和冲突以不同方式长期存在着。”

百分比	第一经济 (国有企业与合作社)	第二经济 (正规的和非正规的私有部门)
1. 1984年全部工作时间的分配 (除去家务和交通时间)	67	33
2. 1984年建房的投入 (按新建住房数量计算)	44.5	55.5
3. 1983年维修业的投入	13	87

资料来源：J. 科尔内：《匈牙利的改革进程：观点、希望与现实》，《经济文献杂志》，1986年12月，第1714~1715页和第1707页。

## 六 农业与私有部门

在匈牙利，在体制的根本要素之外的那些变革，开始于新经济体制实行之前，同时也伴随着新经济体制实施的整个过程，这种变革的根本点在于对集中化的计划管理的挑战。

1959~1961年实行集体化之后，农业的组织在60年代中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合作社从义务粮（1957年起）和从指令性计划（1966年）中解放出来后，逐步接近贸易企业的地位——虽然始终受到各种行政干预的压力。1967年，农产品收购价上涨了17%。集体经营的合作化特色已变得不如从前明显，国家在农业方面的家长制表现明显减少。1967年，自留地的重要性和自主性增加了。政府宣布，集体生产和家庭生产并不相互对立，而是构成一个整体。特别是，鼓励合作社从事非农业性的副业生产的做法取得了惊人的效果；1968~1971年间，合作社在工业和食品加工业方面的经营翻了一番，而建筑业方面则增加了2.5倍。这种经营的多样性对匈牙利发展模式的转变起着重要的作用。农业的成就更普遍地改善了供应状况。

无论是正规的或是非正规的私有部门在持久的改革过程中均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尤其是在70年代。尽管私有部门受到种种限制，主要是经营规模的限制（60年代在家庭成员之外可雇用3~5人，80年代为7人），但是它们所享有的最大限度的宽容解释了其所以朝气蓬勃的原因：匈牙利的私有部门在服务、餐饮、建筑、小买卖、汽车修理等方面所占的比例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高。私有部门对整个经济的贡献仍然占少数，但它促进了消费模式和发展模式的演变。私有部门对货币的激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 正规的私有部门(千人)

	1953	1955	1966	1975	1980	1984
1. 私人手工业者	51.5	97.6	71.3	57.4	63.7	76.1
2. 私人手工业者的雇员和学徒	4.0	16.0	26.7	19.7	20.1	26.9
3. 个体商人	3.0	9.0	8.5	10.8	12.0	22.4
4. 个体商人的雇员	-	1.0	1.5	3.4	8.2	28.5
5. “工商协会”①中的全日制员工	-	-	-	-	-	11.0
6. 正规私有部门中全日制员工总数	58.5	123.6	108.0	91.3	104.0	164.9

①为合伙人出资组成的私有小企业,出现在80年代初期。这是一种小合作社和资本主义小企业的混合形式,由所有者管理。

资料来源:J. 科尔内:《匈牙利的改革进程:观点、希望与现实》,第1705页。

## 七 新经济体制的成效

匈牙利经济增长的变化似乎显示出了新经济体制的积极影响。国民收入（实物净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从1961~1965年的4.5%增加到1966~1970年的6.8%和1971~1975年的6.3%，随后1976~1980年下降到3.2%，1981~1985年下降到1.3%。但是匈牙利的这一总的变化情况与其他东欧国家没有什么区别，而这些国家并没有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匈牙利改革所取得的进步主要是质的变化。改善供应及丰富产品花色品种的成绩非常突出。短缺的强烈程度普遍有所减弱，特别是消费品方面；食品的短缺情况实际上已经消失。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对匈牙利的经济增长做出了主要的贡献。

开始于60年代初的传统发展模式的变革加快了。工业增长放慢，而农业和服务业的增长却加快了。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增长高于生产资料部门。对东方国家、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开放速度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了与旧的消费方式的决裂：住房、别墅、旅游、汽车等方面的大量消费、更好地拥有这些财产与服务，这些都刺激了人们去提高收入，无疑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匈牙利福特主义的轮廓开始形成了。

然而变革并没有完成其使命，短缺经济所特有的一些重大倾向和行为只是有所缓解而已。

## 八 70年代的急刹车

1972年底到1979年间，重新出现了摇摆，其原因多种多样。保守

## 改革与社会和解

“如果说1968年以来改革的社会反响总的来说不是比较和缓的话，那么，匈牙利改革也许就不能经受住考验。在这方面，与南斯拉夫进行的比较意义深远。在匈牙利，充分就业始终能得到保证；而在南斯拉夫，1971年失业人数高达29万人，1975年达54万人（尽管有向国外移民这一解决办法）。匈牙利1976年零售商品价格的年增长率达到最高点的5%（而南斯拉夫1975年为24%），到1977~1978年开始有轻微下降。匈牙利对日常大量消费的某些产品（奶、肉）实行有计划的提价，像1970年、1976年、1980年波兰的情况一样并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其原

因是实行了一种保障低收入者购买力的货币补偿措施。……国家保存有足够筹码来决定收入的变化，以便提高“非生产性”部门的工资、推行一种家庭政策（建立一种产妇产工资、提高家庭津贴）、消除退休制度中的最严重的缺陷：1968年改革之前，一些重大的社会目标被忽略了，然而在新经济体制中，从理论上确立的市场的影 响并没有妨碍那些重大社会目标的继续实施。”

资料来源：J.C. 阿斯拉：《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利润》，第287~288页，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1981。

## 1972年的转折

从1972年秋开始，一些保守派别和观念重新抬头，实际上冻结了改革的进程。“原先设计并要在70年代实施的第二步改革方案被抛到了脑后。1968年改革中为了保证平稳和逐步的过渡而临时制定的种种限制最终并没有取消。这种有意识建立的改革体制的双重性就这样固定下来，当初倡导者设计的过渡性的措施都变成僵化的东西，并强化了矛盾。结果，权力重新集中的倾向自然而然地加剧了。由于缺乏一个规范的结构严密的调节体制，现行的规章制

度又带有众多的例外，因而产生了新形式的指导体制。调节手段的改变，特别是在5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直接干预的加强、企业利润集中化的加剧以及使合作社形式接近传统的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努力，这些均使得妥协后变得脆弱的改革体制更加瘫痪。”

资料来源：I. 贝伦德：《1953-1988年匈牙利经济改革》，第231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

势力的反攻得到了大企业压力集团、部机关、党的地方干部和工会的支持。工会利用了工人对收入不均的不满。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在1969年之后有所加强，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兄弟党也一起批评匈牙利的变革。1973~1975年，国际危机的影响促使匈牙利重新集中化，以限制危机对东欧最开放的经济带来不稳定的影响。

1972年11月，中央委员会采取了“特别措施”，决定50家最大的企业（占工业总产量的50%，出口的60%）今后将受政府部的直接领导。在工会的压力下，由政府财政提供主要资金的一项大幅度提高工资的方案通过了，但是这是与新经济体制的总方针之一相违背的。中央对价格的控制加强了，1973年之后这种控制愈来愈严，实际上取消了始于1968年的渐进的自由主义做法。在这一时期，政府对农业合作社的自主权作出了限制。一场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消费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富裕化的斗争使平均主义传统和反对投机的传统死灰复燃。R. 涅尔什于1973年11月被清除出党的书记处并于1974年被清除出政治局。

自1976年起，权力重新集中化的进程继续进行。企业的活动余地 在许多方面都减少了。再分配的比例提高，政府部直接和间接的干预得到加强。

然而归根结蒂，就像T. 鲍尔所说的那样，改革进程的冻结并没有将匈牙利经济体制带回到1968年以前的状况。这一点值得重视，它对1979年开始的向改革之路的第一次回归有重大的意义。

## 新经济体制的优势与不足

1968年之后15年，L. 绍穆埃利发现，在苏联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之外，新经济体制在匈牙利产生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第三种模式。1966年的革新计划以及1968年实施当中所取得的成果有以下几点：

1. 一种在产品的产量和品种方面没有具体的规定及没有中央下达的计划目标的计划经济建立起来了。

2. 生产资料过渡到贸易方式，以取代集中化的调拨。

3. 经济多元化(承认各种形式的企业和所有制)。这是1960年构想和1968年成就的新颖之处，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绝无仅有的。

4. 国内国外市场的联系。

在1966年改革方案中已经存在的新经济体制的局限和不足主要有：

1. 投资的决策和资金提供仍保持

由中央控制。这一指导思想在1956~1957年时就已经出现，W. 布鲁斯在其著作中阐述了其理论基础。

2. 保留经济管理机构的现存体制。其目的就是要避免管理机构反对改革。

3. 对经济政策或对追求产量的和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粗放发展战略缺乏及时的修改。

4. 专家政治的方法。“改革的概念并没有为可预见的社会压力和社会冲突找到答案，以致于一旦出现这些问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领导人以及一般的舆论都有些措手不及。”

资料来源：L. 绍穆埃利：《经济体制论战的第二次浪潮和1968年匈牙利改革》，《经济学报》，第33卷，1984年第1~2期，第58~63页。

## 匈牙利经济中的体制变化

与匈牙利其他经济学家不同(像 J. 科尔内主要强调新经济体制实行前后的行为和调节形式的延续性), T. 鲍尔提出了对体制进行质的变革。东欧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体制都或多或少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例如在保加利亚、东德或苏联,可以观察到围绕“一个平衡点”的摆动,这个平衡点即为传统的集中化的计划模式的一种温和的形式。“匈牙利新经济体制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改革周期’的历史。实施新经济体制之后及向‘市场社会主义’(但是实际情况与之还差得很远)缓缓前进之后,在 70 年代初期和中期,出现一个时期的倒退。80 年代初开始了有关改革计划的新运动,但是这一运动目前已经放慢。同时,它也形成某种摇摆,但平衡点不

再是传统的集中化的计划体制,而是 1983 年我所描述的那种‘既非计划又非市场’的混合物。对于匈牙利来说,从这个平衡点出发向‘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是有限的,每前进一步的努力总是以退缩到这一混合的状态而告终,但不是退缩到匈牙利在 1968 年就放弃了传统的集中化的计划体制上面”。在实行新经济体制之前,匈牙利曾经做了一些“完善”经济体制的工作,而这种完善反而成为一次真正的改革,因为它使得“一个平衡点”过渡到“另一个平衡点”。

资料来源:T. 鲍尔:《改革或完善经济体制》,第 135 页。

## 部的权力过度集中化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

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资料来源：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316页。

## 1958年行政放权的社会主义

1958年改革的主要措施如下：

1. 大部分部属企业转归地方管理。

2. 在生产计划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统一的均衡”体制被另一种以地区计划和自下而上的平衡机制为基础的体制所代替。国家计委控制的产品数目急剧减少，地方政府被赋予了计划与分配方面的重大权力。

3. 在投资计划方面，建立了一种委托制：中央政府将资金分配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投入一部分自有资金，然后自主地选择投资项目。

4. 改革减少了由国家计委和政府各部分分配的物资的数量和种类，使地方政府能够分配剩余部分的物资。地方政府还可以将中央定量供应的物资再分配到本地区的企业，包括中央部属的企

业。地方政府还能获得当地企业一部分超额的产品。

5. 财政体制方面权力大幅度下放：税收由省政府征收，省政府还享有各种比率的留存，而且五年固定不变。同时，中央政府还赋予地方政府减少或提高某项税收的权力或者给予免税的权力。

6. 高度集中的信贷体制被“基层的信贷管理委托制及将中央的控制局限于惟一的借贷差额的体制”所取代。

资料来源：吴敬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及中国改革的战略抉择》转引自K. 多普费尔和K.-F. 赖布尔编辑的纪念奥塔·锡克论文集《经济体制的演变》，第267页，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0。

##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 (1979 ~ 1989)

80年代中国的激进改革应该结合1949年革命成功以来这个国家历史的特殊性来认识。当然农村和农业问题始终占主导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这个国家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幅员看,其规模都是一个决定因素: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中心问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经历了这种结构上的尖锐的紧张关系。从体制方面看,50年代中期中国有两个特点。首先,在工业方面系统地推行了苏联模式,但实施的方式比较和缓(比如有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低得多。其次,主要在1955年和1956年进行的农业集体化由于种种原因也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冲突少。除了大跃进灾难及气候波动与政治动荡之外,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水平的国家,集体农业的增长速度还是令人敬佩的。

## 毛泽东反对传统体制与反对市场

60年代初，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倾向，它们以各种方式相互联系或相互对立。“从苏联那里继承来的行政计划的集中手段或‘指令性经济’处于守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它被看作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有关。这些制度的捍卫者是这种观念下成长起来的行政与政工干部。另一方面则是能言善辩的孙冶方所捍卫的市场社会主义。毛泽东对这两条道路均反对。他认为第一种道路缺乏经济效率，会滋生领导层的官僚作风，在政治上脱离群众。第二种道路接近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追逐利润的价值观，与团结合作的社会主义标准相违背。毛泽东的目标则是建立一种集中管理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经济，控制被他认为是经济‘支柱’的大型工业。其他的

经营活动属于地区和地方管理，它们采用符合其规模和资源配置的技术、实行自力更生的政策。”经济决策的政治化（根据意识形态的标准，采用口号来发出指示）是与毛泽东反精英、反官僚、反商品的立场分不开的。“毛泽东解决问题的方法带有救世主式的非理性特点，它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并最终削弱了他自己的威信。回头看，他的缺点和失败一方面可以归因于观念本身的‘逻辑’问题，另一方面还因为在观念的实施中社会条件并不具备——如果这样一种区别有意义的话。”

资料来源：C. 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第82、84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

## 一 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浪花

自 1956 年起毛泽东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激烈地——批评苏联式的组织与发展模式。毛泽东拥有众多支持者，连续不断的冲突是毛泽东时代（1956 ~ 1976 年）特有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毛泽东赞同斯大林传统，对市场有强烈的反感。实际上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独特的改革，即始终在体制调整与非市场导向的激进改革之间摇摆，并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历史。这种主观主义模式不触及制度的基石；它的主要特点是，高度的权力下放（地区和地方）与经济管理的政治化或更一般地说与运用意识形态标准或政治标准相结合，以便达到一种“以动员促协调”的目的。

这方面的第一次改革是 1958 年的“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从某些方面说是一种超级的集体化，它受到了农民的强烈抵制。接着这些新单位担当起地方行政领导职能（受地方党干部领导）。这种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了 1959 ~ 1961 年的经济灾难：工农业生产崩溃、大范围的饥荒。60 年代初“调整”改正之时，虽然人民公社在形式上没有发生变化，但是集体化的程度大幅度降低；同时还采取了权力再度集中化的措施。然而这种权力集中还没有完成，一些新的权力下放的浪潮又将来临，从而形成“集中—僵化和停滞—放权—无秩序和混乱—再集中”这一著名的周期循环。

毛泽东在暗中探索一种既区别于斯大林模式又区别于 60 年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调整或激进的改革（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三条道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摸索得到了新的发展。尽管在企业管理方面曾尝试了某种变革（使用不太有效的“政治挂帅”的口

## 大跃进之后的集中与分裂

“60年代初国家致力于在农业方面恢复大跃进之前的许多制度，但同时对于制度也作了重大的改革。尽管以投入与产出目标为基础的计划管理和国家控制的供应体制得到恢复，然而计划与供应从整体来说却不再由北京决定了。这些方面的许多决策权开始时下放到省级，随后又下放到地区级。中国的省份平均人口有3000~4000万，一些省接近1亿人口，甚至更多。在许多情况下，企业在本省范围内获得主要的供

应，并将大多数产品在省内销售。所以没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协调这些投入与产出。到70年代，很大比例的中国企业从属于省而不是隶属于北京。但是中央通常对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的大型企业保留有效控制，即使这些企业的计划形式上是由省里制定的。”

资料来源：D.H. 珀金斯：《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文献杂志》，第26卷，第2期，第607页，1988年6月。

## 事实上的私有化与土地租种

除了将公社的农业资产（牲畜，机械车辆：拖拉机、手扶机动犁）出售给家庭以外，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虽然原则上仍然保留着，但是其涵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非集体化之后，出现了一种与当局仍在谈论的“合作经济”完全不同的实际情况。这种实际情况可以看作是两个层次的所有权下面的一种普遍的土地租种。生产队（或当生产队消亡时则称作村）是集体土地的合法所有者，它收取从承包家庭的收入中扣除来的地租。实际上，生产队在经济中的作用减小、集体财产的变卖或委托管理都使得这些提留基本上都用于维持村行政的

开支，而村行政则代表着耕地的集体所有制。此外，承包土地的家庭享受的承包期非常长，一般为15年或更长，他们就像“所有者”一样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当这种使用权转让给第三者时，承包家庭将向其收取费用。就这样，几乎所有的承包合同的转让都意味着获得转让使用权的家庭要向出让这些权益的家庭支付“补偿费用”，虽然转让只是临时的，出让期限一般为一年或两年……

资料来源：C. 奥贝尔：《农业改革或中国开始一条前途未卜的新道路》，《第三世界杂志》，1986年10~12月，第27卷，第108期，第733页。

号)，但激进改革者并没有制定出相应的体制和组织方面的改革方案，因此，最终还是失败了。在发展战略（例如扩大农村工业）和“自力更生”的口号方面显示出一些革新。它反映了全国、还有地区甚至微观经济方面的自给自足的态度。一种“细胞经济”的发展好像是与反对商品的意识形态方针、行政权力下放以及不发达的中国交通网相一致的。这种经济的发展也缓和了集中供应方面传统的紧张状况。

## 二 农村改革与非集体化

邓小平时期的中国领导人的改革指导思想表现出经济实用主义的特点（从1978年起），它来自人民对多年派系斗争的厌倦；改革的指导思想还表现为一种限制政治变革和反对否定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坚定战略。改革的主要动力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愿望，从而使国家在经济上能够迅速崛起，但是改革并没有触动制度的基石，仍保留一种“社会主义”称号，但这种社会主义的形象将变得日益朦胧。

农业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首先展开的领域。在农业方面，人民公社体制逐渐受到批判。毛泽东主义者强调广大的集体组织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人口的健康和寿命、扩大初等教育及扩大文化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另外还有管理机构对社会强大的作用），而改革者则对农业集体所有制方面存在的政治、行政和经济管理之间的混乱状态表示异议，特别是对脆弱的农民激励机制表示不满。改革者指出，60~70年代农业的增长没有超过人口的（急速）增长，从而使人均消费停滞不前。

自1979年特别是1981年起，“责任制”的实施进一步扩大。“责任

## 1977 ~ 1988 年中国农业生产与 农民收入(百万吨)

	谷 物	棉 花	油 料	肉 类(牛、 马、羊)	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 指数**
1977	283	1.98	4.0	7.8	125	
1978	316	2.17	5.2	8.6	134	100
1979	332	2.21	6.4	10.6	160	117
1980	321	2.71	7.7	12.1	191	123
1981	325	2.97	10.2	12.6	223	150
1982	355	3.60	11.8	13.5	270	179
1983	387	4.64	10.6	14.0	310	202
1984	407	6.26	11.9	15.4	355	225
1985	379	4.15	15.8	17.6	398	232
1986	392	3.54	14.7	19.2	424	233
1987	405	4.25	15.3	19.9	463	237
1988	394	4.20	13.2	21.9	545	235

\* 以人民币元计算

\*\* 按实际收入计算

本表反映了，直至1984年农作物和人均实际收入的急剧增长以及自1985年起发展出现明显地后劲不足的情况。

资料来源：C. 奥贝尔：《中国的农业危机》，《东方国家通讯》，1989年11月第344期，第52页。

制”根据不同方式将公社的土地重新分配到农民群体或家庭，通过与生产队签定一个交粮合同从而获得了真正的管理和组织的自主权。尽管这种做法在开始时受到农村干部的抵制，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也受到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的刺激）而使得新的组织方式实际上合法化，农民的压力加速了农业非集体化和取消人民公社的进程，公社在 1983 ~ 1984 年前后解体（1984 年是农业收成创记录的年份）。这种新体制概括地说是一种家庭农业的体制（分配的土地的租约为 15 年，有时更长），并且通过承包合同规定了上交国家的地租。超过合同规定以外的产量归农民家庭所有。农民可以将之用于自我消费或拿到自由市场上销售。1985 年，国家取消了义务粮（同时取消了收购定量以外粮食的更高的价格）。

直至 80 年代中期，“农业改革”看来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一些消极的影响，如农业基础设施和卫生基础设施遭受破坏、出现社会分化、控制人口政策的效率不高，所有这些都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相比较是次要的。非集体化带来的剩余劳动力大部分被地方政府控制的私人部门和集体部门吸收了，这些部门的迅速发展也部分地说明了 80 年代整个经济的增长（甚至出现不稳定的情况）。1988 年，农村工业为 6700 万人提供了就业。

### 三 城市改革与工业改革

在农业发展的鼓舞下，改革派领导人在 1984 年发动了“城市改革”，即国有工业的改革，当时国有工业仍是一种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体制占主导，但已不再是那样刻板：集中化减轻、计划的“压力”减少。

## 由三个部门组成的经济

1984年10月的计划文件设想了三种协调类型的发展的共存：指令性计划、运用经济杠杆的指标性计划和市场调节。

“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

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按照以上要点改革现行的计划体制，就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北京周报》，1984年10月29日，第44期，第6~7页。

1978年以来,通过大小规模的各种实践,精简了行政机构、限制了指令性指标、准许多种形式的利润留存或者在计划目标之外允许进行自主的生产(最后一项与农业的“承包制”相似)。自1984年起,改革的战略开始立足于一种双重的模式,即向计划(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逐步过渡的机制。在新体制中,所有企业的产品都包含以传统方式生产的计划内部分和以自主方式生产的计划外部分(如有必要,则以“指导性”计划作为补充)。这种双重体制的目的在于逐步扩大市场范围并缩小集中化的计划。必须指出,(有保证的或自主的)供应程序和(固定的或自由的)价格形成程序也按照这两种的管理范围而区别开来。

在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生产和价格的双重体制产生了模棱两可的效果。一方面,它事实上使中国经济中自主的商品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发展,在看似良好的循环中,国有企业计划外生产的增长、农业的发展和城乡私人与集体部门的发展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它刺激了一种投机及腐败经济的出现,那种不同供应渠道与(同种商品)不同价格的做法不仅对企业领导,而且对或多或少迷恋金钱的各级行政机构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致富源泉。

同样,工资制度的变革也是城市改革的一个目标。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从50年代起一直通过行政手段将劳动力分配给国有部门,这种做法缺乏自主的流动性,是一种终生就业(通常可以子承父业)的体制。改革就是要取消工资方面的严重的平均主义并打碎那种没有风险的就业即“铁饭碗”。改革的成果平平。通过利润提留而来的奖金不断增加,但并没有造成工人收入的巨大差距,因为工人与领导层对平均分配有一种默契。至于1986年后发展起来的定期合同招

## 一种虚假的指导性计划

通过对80年代沿海省份浙江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些普遍的经验教训。

“第一,指导性目标总是与向生产者提供一些特定的原料联系在一起。第二,指导性计划缺乏稳定的含义是由于一些指导性计划中的产品又回到指令性计划或完全受市场影响。第三,地方当局在制定指导性计划当中起很大的作用;而中央政府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在投资决策方面,为地方当局制定一些激励措施。这些地方当局则同样运用各种指令性或指导性杠杆影响企业。中国的指导性计划显然不属于

那种通过传播信息来影响生产单位行为的那一类计划。它也没有通过完全改变相对价格而更多地为生产单位建立激励体制。相反地,指导性计划是一种泛泛的名称,它是计划制定者运用物资供应这些常见手段在市场起作用的各个新领域中所采取的各种特定行为的总和。中国式的指导性计划只能是整个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个过渡形式。”

资料来源: B. 诺顿:《中国指导性计划的经验》,《比较经济杂志》,1990年12月,第14卷,第4期,第759页。

## “价格双轨制”的反常效果

“市场的扩大导致国有商业企业数目的膨胀,即从1978年的10.3万个增加到1988年的32.7万个,而国有工业企业的数目仅仅从8.4万个增加到9.9万个。但是这些商业企业的地位是模糊不清的;它们通常是一些准国有企业;甚至是一些皮包公司,利用官方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进行投机……

至于官方的分配网,它们拥有实际上的垄断权,对计划外的交易收取高额

费用,并且将越来越多的计划内的产品以昂贵的市场价销售。官方对市场流通的控制使寻求平衡价格的努力无法取得成效,同时使经济活动受投机的制约。”

资料来源: G. 法布尔:《受权力部门重商主义毒害的中国》,《外交世界》,1990年12月,第23页。

聘体制——即原先工人的就业方式将予以废除——这种新体制实际上在国有工业这个硬核当中作用很有限，只是对于临时工和次要岗位的劳动者是例外，他们成为 80 年代新生的城市下层阶级的一部分。

## 四 对外开放

70 年代中国开始放弃从前的自给自足的做法，并在城市改革的同时，实行了一条鼓励出口的政策，使外贸体制发生重大的变化。对外贸的垄断逐渐减弱，各省、一些新外贸公司或企业获准与国外伙伴建立直接联系，同时也允许将出口创汇的一部分留存。中国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利用其贷款。整个 80 年代颁布了大量有关合资企业或外国独资企业的法律。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特区”在东南诸省建立，随后 1984 年开放了 14 个沿海城市——通常是旧中国的租界——接着 1985 年又开放了三个沿海地区，最后是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开放。这些地区工业化程度最高、基础设施齐全，同时也最为开放地面向亚太地区及其华人社会、面向世界。

受城市改革的影响，新出现的竞争压力使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成效，而腐败和投机的现象也随之增加。在十几年中出口翻了三番（1988 年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13%），而且基本上是制成品；进口则翻了四番。在 1981 ~ 1989 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4% 上升到近 28%。

## 五 经济的区域化倾向

80 年代先后进行的各种改革带来了制度方面的渐进式变化，并在

## 主要产品中国家调拨所占的比例（百分比）

	1979	1984	1988
钢	77	66	46.8
建筑木材	85	40	25.9
煤	58.9	50	43.5
水泥	35.7	25	13.6

注：国家计委数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华盛顿特区，1990年，第61页。

### “地方割据的经济”

“在改革者的计划中，当局的作用应该是一种‘间接控制’（通过市场）和‘宏观调节’，然而事实表明，在地方上，当局越来越多涉足经济管理。改革增加了它们的财力，它们向中央施压以获取新的权力，同时还将一些已经转移给企业的权力重新据为己有。具体讲，地方当局开办新企业，还经常对老企业的革新起决定作用。一般认为地方当局是坚决反对固定资产投资，而它们在实际

上却在推动投资的扩大。它们调动预算、供应及内贸、外贸部门；既然银行处于它们控制之下，它们就命令银行的负责人给企业提供贷款，扩大投资面，而根本不考虑对经济所造成的持续干扰作用。”

资料来源：《地方保护主义》，《中国时事分析》，香港，1990年9月15日第1418期，第5页。

社会、地区、行业方面频繁地出现了权力和收入的重新分配过程。这使得地区和地方机构的权力得到加强,而中央的权力被削减。

地方保护主义延缓了在经济方面消除阻隔的工作,放慢了全国性竞争市场的形成。每个省份都设立各种壁垒来限制邻省的竞争,特别是对有收益的消费品,或者用来保存当地生产的原材料等稀有资源。

## 六 宏观经济控制的衰微

各地区在税收及预算方面的权力加强是 80 年代后 5 年出现过度投资及经济过热现象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央政府为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以取代以前的行政控制方法而面临困难的主要原因。宏观经济压力的增长表现为通货膨胀的爆发以及国家原本已经很高的积累率的上升。在地方的政治压力下,同时在中央银行对信贷缺乏“微调”手段的情况下,分权的和多样化的新银行体制对放款和还款的条件宽松,往往轻易地和大量地提供贷款,因而也助长了经济的失控现象。由于没有一个真正的货币政策,中央就得不加区别地定期做出反应,来给经济急速降温,可能的话还重新实行集中税收的做法,这些都造成了一种改革的发展周期。这种改革的周期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特有的投资周期的新背景下表现出一种持久性。

经历了 1985 ~ 1987 年的通货急剧膨胀之后,政府在 1988 年底采取了一种严厉的紧缩政策作为回应,而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改革被冻结了。但是 10 年的剧变已经给中国经济体制带来了许多不可逆转的变化。



圆桌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1989年): T. 马佐威茨基, L. 瓦莱萨和B. 盖雷梅克。(《新抉择》, 第14期, 1989年6月)。

## 第四部分

# 走向体制的解体

- |    |                                |     |
|----|--------------------------------|-----|
| 12 | 80年代改革观念的演变 .....              | 131 |
| 13 | 南斯拉夫的新经验(1965~1991) .....      | 145 |
| 14 | 波兰从团结工会到“大爆炸”(1980~1991) ..... | 159 |
| 15 | 匈牙利激进改革的实验室(1980~1991) .....   | 177 |
| 16 | 从民主德国到五个新州(1990~1991) .....    | 193 |

当质的变化不仅在计划管理或其他要素中而且还在制度的基石中出现的时候，传统的或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就发生了。这种解体的最终标准是取消一党制，因为正是这种一党制与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制的结合构成了制度的基石。因此1989年东欧革命或者1991年8月苏联未遂政变后苏共的暂停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掀开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拱顶石。即使保留一党制，在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进行明显有利于私有部门的所有制变革，也能促使体制开始走向解体。可是在本书中，我们关注历史的经验，而对那些抽象的解体方式不感兴趣。

近10年中，改革者的战略已从激进的改革演变到体制的解体。我们首先将谈到这种渐进的演变，然后将列举几个意味深长的体制解体方面的尝试（我们没有讲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的情况，因为不可能面面俱到）。虽然我的论点会引起争论或者别人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还是将从60年代中期以来的南斯拉夫归入这种体制间变革的范围内。我们随后接着讨论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最明显的例子以及两德统一期间的民主德国。

## 80年代改革观念的演变

尽管赞同激进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自60年代改革浪潮开始以来至今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在80年代，特别是在末期，一种新的趋势开始走向成熟。从改革的战略到社会主义体制解体的战略的转变及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标志着一种方向性的根本变化。对这种变化不理解，对1989年中东欧连续出现的动荡就会觉得出人意外。

### 一 从体制的乐观主义到体制的悲观主义

这种转变比较隐蔽，因而通常不易觉察到，在这关键的10年中出现的一系列因素正好说明了这种变化。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经历的持久的结构性经济危机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自60年代以来增长出现长期的衰退趋势，因此才产生这种危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比其对立面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至少具有潜在的优越性的信仰，最终失去作用。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乐观

## 对市场经济态度的总体变化

1988年夏在一次对团结工会众多的活动分子和干部的调查当中，W. 阿尔库斯泽斯基发现：

“最近几年来，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和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团结工会的影响，而是危机造成的结果。我想到几乎全世界都很流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时尚，它统治着街垒的两边并贯穿对立的政治阵营。这种时尚使权力精英分裂，并在国家机器中遇到强烈的抵抗，因为它否定意识形态并意味着国家机器将放弃对经济的控制。同时，它使团结工会瘫痪，因为如果工会活动分子认为应该进行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提高对人的要求，接受失业，这样就会与工会的作用背道而驰。因此，团结工会作了模棱两可的声明，事实上非常吃力地捍卫着社会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日益增长的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迷恋之中，我看不到有团结工会的立锥之地。”

至于利奥波里塔（一位记者的笔名），他宣称：“团结工会从根本上说是波兰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修正主义运

动。实际上，它接受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要素，因为它相信只要不再有共产党人，人们就可以使社会主义正确地运转。但是因为不可能摆脱他们，所以应该限制他们的权力。这确实不是一项改革计划或一项体制激进变革的计划。这正好是1981年12月13日以后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东西。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他们看待事物的方法中，市场经济已经恢复了地位，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不久前，“个人创业”或‘种菜人’的概念还带有贬义和鄙视的内涵。这些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我认为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军管法实施之后取得的最大和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因为它使人们看到这已是放弃社会主义模式的时候了。所有对私有部门和市场经济的肯定都使得团结工会成为处境尴尬的工会组织。”

资料来源：《波兰调查：团结工会留下了什么？》，《新抉择》，1988年12月第12期，第30~31页。

主义不仅曾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特点（它仅仅是一种说教），而且也反映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态度的改革者们高明的思想的特点，但是那种乐观主义到这时则永远地烟消云散了。在这个时期，许多人表现出失望的情绪，思想发生了独特的变化，那种乐观主义就变成对体制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走进历史的死胡同。社会传统或国家信条曾赋予社会主义的美德，至少是潜在的，比如经济充满活力、满足社会需求等，人们从今往后将把它们赋予社会主义的对手资本主义。

这种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一旦得到阳光雨露的滋润，就会使西方大吃一惊，并使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欣喜若狂；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东欧80年代的改革尝试最终失去信心，因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在波兰，人们不仅不再需要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他们还抛弃所有主张改革社会主义的观点。随着社会变革进一步深入，众多经济学家和反对派也渐趋激进。

## 二 理论的影响

匈牙利人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1980）一书在许多方面反映了80年代的经济思想。他通过分析传统的、未改革的社会主义体制，得出那种将机构、行为和短缺联结在一起的严密的体制结构，在这种关系中，短缺不论在消费领域还是在中间产品和劳动力方面都是一种持久的和普遍的现象。科尔内认为，这种类型的经济在某些方面会经历与资本主义相反的情形。资本主义受“硬性预算约束”（企业的行为取决于它们的资金状况），经济受（货币）需求的限制并表现为就业不足。相反地，社会主义受“软性预算约束”，经济受（自然）资源的限

## 关于激进改革失败的论述

1988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莱舍克·巴尔采罗维奇对80年代波兰的改革是这样做出研究结论的:“波兰的情况(如同匈牙利的情况)表明不实行市场机制也可以从全面的指令性计划中走出来。类似的中间制度的经验并不十分令人鼓舞。不应该下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旨在增进效率的经济改革应该在一种计划的基础上通过

完善体制来实现。我认为,这种尝试是毫无价值的。波兰经验揭示的更多是走出这样一种体制应该更加彻底。”

资料来源:L.巴尔采罗维奇:《1981~1988年波兰经济改革:综述》,收入《欧洲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中的经济改革》,第48页,纽约,(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89。

## 国有部门中的机构所有者

马顿·陶尔多什关心为国家资本建立一个“所有者的动机”以及在部门之间更好地调拨国家资本,他于1982年提出了如下建议:

“在国家所有制的范围内,企业的管理应该由4~10个独立的组织来实施。这些追求利润的资本持有者,可以无约束地经营。面对等级结构中复辟,它们可以有效地保护竞争中的企业。它们可以以长期收益标准为基础对企业经营实行评估和监督。这一形式提供了根据利润标准重新调拨资本的手段。作为‘持有资本的’机构,如果有必要,将协同银行、工会、保险公司一起,

有权关闭企业、建立新企业、根据预期利润的情况为现存企业的发展重新分配资本。用于再调拨的资本的来源,例如可以由企业支付给所有者组织的红利来组成。这些掌握资本的机构能够因此完成——重新调拨资金的——任务,特别是如果它们获得建立分支机构的权力的话,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至今还没有这种情况。”

资料来源:M.陶尔多什:《匈牙利经济管理和组织的发展计划》,《经济学报》,第28卷,1982年第3~4期,第307页。

制并经受短缺之苦。

短缺经济理论获得了匈牙利学派其他理论的支持，如 T. 鲍尔的投资周期理论，它揭示了持久紧张状态的结构本质及“机构与行为”复合体在调节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作用。因此，对计划失误或过分主观主义的增长政策方面所看到的种种机能失调经常进行的解释已经失去了很多的说服力。但是，激进改革的老问题及现存的体制乐观主义（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定能像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缺陷那样克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也同样削弱了。

### 三 自我批评式的总结

众多改革的经济学家在 70 年代末仍然认为，激进的改革之所以已经基本上失败，是因为这种改革没有能真正得到实施，或者因为这种改革（如匈牙利）受到首先是社会政治原因的阻碍。80 年代初，出现了一种有关改革模式本身的局限性的新思考。在这场讨论当中，有关对 1968 年以来匈牙利经验的批判性评价（以下还将进一步阐述这一点）起着中心的作用。

布鲁斯模式直至当时一直激励着激进的改革，该模式将“日常决策”与投资决策区分开来；日常决策是指应该留给企业决定的简单再生产，投资决策是指大部分情况下由中央决定的扩大再生产。隐含的论点是，在长期的方针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是虚弱的。只有理性的、英明的中央能够在这方面采取恰当的决策。正是这种对市场与计划的假设性区分在 80 年代的讨论中受到质疑。实际上，经济管理部门并不满足于管理投资，它很自然地希望将活动范围扩大到本该自主的决策范

## 新自由主义

“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门徒、布达佩斯卡尔·马克思大学经济学教授T.利斯卡到克拉科夫极端自由派头目M.杰尔斯基,在自由主义新浪潮中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市场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甚至在西方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以及理论上对维也纳学派(哈耶克、米泽斯等)及其延伸芝加哥学派的推崇。如果人们在克拉科夫、布达佩斯或者在布拉格引用维也纳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也完全不是偶然的。维也纳学派曾将国家干涉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当作批评的对象,认为它们是对奥地利帝国的威胁,因为该学派与奥地利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并不是怀旧,而是要实现中欧经济空间的分裂。比起其他地方来,国家干涉主义的胜利对中欧——借用哈耶克说法——更是‘奴役之路’。换句话说,这不仅是一个经济类型的问题,而是选择什么样社会的问题:‘开放的’经济是走向‘开放的社会’的

第一步。”

“如果认为支持与反对市场的双方能够根据其所属的国家机构或社会的情况就理所当然地区别开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正如匈牙利社会学家E.洪基斯所指出的那样,分界线是穿过两个阵营的。实行市场模式自然会首先威胁特权阶层,但是它直接将特权阶层与工人之间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推上了审判台(‘你们假装付我们钱,我们假装工作’):实施市场机制所带来的自由度是与它带给劳动力市场及收入的不稳定程度成比例的。从中可以看到一种保守的倾向,特别是在获得更多国家津贴的部门的工人当中。”

资料来源:J.鲁普尼克和P.肯德:《自由主义与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的危机》,《另一个欧洲》,1988年第15~16期,第9~10页。

围之中,甚至在没有任何生产计划的情况下。就像我们看到的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情况那样。另一方面,如果增长和技术变革与企业的收益不挂钩,企业的独立性及其对利润的追求就会受到阻碍,因为企业的收益首先取决于再分配以及与行政部门的讨价还价。这进一步指出原先将有关投资划分成企业和中央两个决策范围的假定是不符合现实的。

## 四 资本市场

一个补充的论点将加强对以市场为调节的计划模式的批评。这个论点主要由匈牙利人M. 陶尔多什提出,他认为,将市场局限于产品领域而排除劳动力和资本领域的做法构成这种模式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造成了产品市场的衰弱以及新经济体制的“参数调节”计划的失败。

保留下来的对大部分投资的集中管理为强大的行政部门的再生生产创造了一个基础;除了这个明显的结果以外,部门和地区间的资本调拨只能通过中央的再分配来进行的情形则产生了反常的效果。企业由于无法进行多样化经营,因此希望推动内部投资;相反地,中央在有效分配投资方面有自己的目标,它素来倾向于减少企业决策的自主权。资本在僵硬的结构中被固定住了,只有当中央决定增加新的行业或者通过各部门集团的较量,资本才能发生变化,内部或外部需求的改变并不能相应地带来现有企业或新建企业供应的迅速变化。竞争对产品质量或对技术进步方面的有益作用,由于高度的工业集中和在各生产部门间缺乏资本的调拨机制的双重原因而不能发挥出来。

陶尔多什的分析导致了一种类似于总体平衡理论的解释: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来自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相互作用,而在激进改革的模式(如新经济体制)中缺少这种相互作用。这种西方自由

## 从马克思到弗里德曼：俄国道路？

1989年，苏联著名的学术刊物《经济问题》发表了一篇颂扬并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文章。文章的作者G.波波夫是该刊物的负责人，他在任莫斯科市市长的时候一举成名。他写道，芝加哥学派使人们关注“人类社会集中化管理的明确限度以及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中集权主义的矛盾、危险和走头无路的困境。”

“经济稳定的构想及著名的‘里根经济学’使美国克服了严重的困难、降低了通货膨胀并加强了美元的地位，这些都是弗里德曼理论的胜利。继凯恩斯主义之后，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为经济理论直接和有效地打入真正的美国经济提供了第二个榜样。毫无疑问，多年来

在凯恩斯主义和芝加哥学派之间的讨论对于我们社会经济的重建以及今天提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针对其以英国为依据的理论结论对德国读者写道：‘这不就是在说阁下的事情吗？’他补充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的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资料来源：G.波波夫：《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叛：米尔顿·弗里德曼》（译自《经济问题》1989年第12期），《经济学问题》，1990年7月第33卷，第5期，第100、102、103页。

## 自由主义的摇摆

1990年，亚诺什·科尔内出版了《自由经济之路》，其书名是仿照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奴役之路》一书。他写道：

“这本书并不代表一种哲学和所有东欧人都赞同的一种道德观点。美国版的书名指出了该书的中心思想即自由的思想。这是关于尊重自治、自决权以及有关个人权利方面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观点。相反地，它提倡要限制国家的作用。或许在将来应该重新考虑国家的

角色，但是目前在变革过程的初期，人们对国家过分干预及行政部门的集权做法已经厌烦。可能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的，而是一种摆动的运动。经过几十年最大程度的国家干涉主义，现在是大踏步走向最小程度的国家干涉主义的时候了。未来的几代人也许可以设想一个中期计划。”

资料来源：J.科尔内：《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第22页，加利马出版社，1990。

主义学派传统论点的再发现伴随着改革的观念方面直至当时仍未进入人讨论话题的所有权观念的逐渐回归。

## 五 所有权和资本的控制

所有权的主题在 80 年代再次出现,甚至在当时政府进行的各种改革中也再次出现(如波兰、匈牙利)。第一种仍有些畏畏缩缩的,方法是指通过指定具体的或法律上的代表,使国家所有制的概念转变为公共部门所有制的概念,以避免(国家或社会)所有权的模糊不清。这种更激进的方法实际上是重视资本市场而产生的结果:如果资本市场得到发展,那么国家所有制本身将被“分割”,以使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流动。但是这就会出现另一个被许多改革者提及的论点:从前的改革在国有部门之外比在国有部门本身具有更加实际的和更加有益的效果(匈牙利、中国……)。如果说在 80 年代初期,常见的改革主题是,应该接受所有制的多元化,即意味着允许发展新的私有部门,那么到 80 年代末,可以听到一种更激进的呼声,即目前应该做的是改变所有者。国有部门应该私有化。

## 六 西风吹

经济学家这种重要的激进化思潮在西方新古典主义有关“所有权”理论面前并不新鲜。它认为经理们的权力损害着所有者(股东)的利益,所以是资本主义缺乏效率的根源;而社会主义不合理性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明确的所有者。

## 管理的幻想

“管理的幻想是指相信企业的行为通过计划者运用某些调节手段（价格、税收、贷款等）从而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控制。改革者借助于一些精心设计的工具来控制工资、价格或企业的净收入，希望使企业走上社会合理化之路。经验表明，这是一件更加难以实现的事情，并不像许多经济学家长期来所认为的那样。实际上，这一传统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想。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 企业对整个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作出反应。仅仅改变一种经济调节手段可能不足以产生预期的效果。

● 不可能制定一整套完全协调的规章制度。企业一般地都学习如何钻规定的空子（这里有个类似的情况就是，在西方，个人与企业学习如何巧妙地蒙骗税务部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

不是当局的目的）。

● 企业的反应会与制定规章者预期的不一样，因为企业的目标与计划制定者的期望不同。例如，计划制定者可能设想企业会最大程度地追求利润，因此制定了它们的调节手段，但是实际中，企业可能更多地受到增长而不是利润的驱动。

● 对管理幻想的批评首先是由匈牙利经济学家从本国的经验反思出发而开展起来的。这种批评与合理预测学说的支持者批评凯恩斯派所认为的经济具有轻易的可控性特点的做法相似。”

资料来源：M. 埃尔曼：《社会主义计划》（第2版）第81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

80年代随着撒切尔和里根上台，西方出现了一股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随后开始迷恋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并重新回到奥地利的传统（米泽斯，哈耶克）。这一浪潮后来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出乎意料的巨大反响，然而如果大家设身处地地看一看上面提及的背景，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又是可以理解的。

货币主义的影响也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是这个时期负债国波兰、匈牙利政府的对话人。与该组织的接触和谈判使得众多的经济学家熟悉了它的调节方法。世界银行有关这些国家（同样也对中国）经济方面文献性极强的报告在当地也有一定反响。1989年之后，波兰采取的（以L. 巴尔采罗维奇的名字命名的）激进稳定计划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一同制定的。世界银行著名的经济学家拉美问题专家J. 萨克斯（哈佛）也一同参与了计划的拟定。此外，这个计划对苏联沙塔林和亚夫林斯基1990年提出并夭折的著名的“500天计划”也有启发的作用。

## 七 市场社会主义的黄昏

60年代激进的改革者希望将国家所有制与（有管理的）市场的运行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个观念和奥斯卡·兰格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泽斯和哈耶克在30年代著名的论战中所提出的观念并不一样。兰格当时捍卫他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被等同于国家所有制）可以比资本主义更好地实现总体平衡的自由主义思想，因为中央的计划工作者能够通过瓦尔拉所设想的“摸索”过程找到平衡的价格结构。相反地，奥地利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市场并不是实现平衡的机制，而是处理信息的过程，它必须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一学术

## “幼稚的改革”所付出的代价

1986年，J. 科尔内回顾并批评了改革先驱们及他们的观点，这些人包括他自己（在他1959年出版的《过度的集中化》一书中）及W. 布鲁斯、E. 利别尔曼和O. 锡克。他写道，这些论点激励了1968年匈牙利的改革，而且在80年代中国的出版物上又重新出现。这些作者所开的“药方”都比较近似：企业自主、正确的价格信号、利润激励、运用市场力量、向买方市场的过渡等。

“幼稚的改革者不承认间接行政控制与市场之间存在冲突。他认为只要抛弃集中化的体制并从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就有足够的条件保证市场的积极运转。对于这样的改革者来说，市场是中央领导手中的一种‘工具’。”

“那种认为计划与市场（或在我的词汇中为“行政”与“市场”）存在互补、和谐的双重性的信仰构成先驱者幼稚病的根本点。”

“改革的先驱者希望使行政部门的所有成员放心：他们的活动仍将保持很大的空间。这种意图是可以理解的。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是管理者

自愿改变行为，而不是那些被管理者‘自下而上’的造反。因此，在改革的整个进程中存在一个内在主要矛盾：如果改革进程取得成功，如何使将要失去一部分权力的人积极投身其中呢？”

“幼稚的改革者关心国有部门，而对非国有部门的作用漠不关心。然而，直到现在，正是后者使经济生活发生了最显著的变化。”

J. 科尔内在表达对80年代匈牙利激进改革者（像R. 涅尔什、M. 陶尔多斯、T. 鲍尔和L. 安托尔）的好感之时补充道，他认为这些作者对产权问题论述得不够。他总结道：“国家所有制的传统形式与（激进改革者）所提出的变革是否能相容？这些变革措施包括强有力的利润驱动、公司自由上马、严格的预算约束、灵活确定工资、运行中的资本市场。”

资料来源：J. 科尔内：《匈牙利的改革进程：观点、希望与现实》，《经济文献杂志》，1986年12月第24卷，第1728~1730页。

争论只是很间接地影响到改革者（通过 50 年代波兰经济学家这一渠道）。然而有一个共同点将兰格的战前模式与激进改革的模式联系在一起：那就是都认为，如果有适当的体制和激励机制，国有企业的领导将做得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企业的老板一样好。

这个论点在 80 年代受到激烈的批评，特别是当 L. 安托尔批评“管理的幻想”或者 J. 科尔内指出“幼稚的改革论”的时候，在匈牙利论战中这种情况尤为突出。80 年代后 5 年，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数量越来越少——重新处于守势，并随着人们对工人自治观念的日益不满而情况有所加剧。

1989 年东欧革命前的两个出版物表明了这一转变。在匈牙利刊物《经济学报》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一次调查中，市场社会主义观念的拥护者大多数都是西方经济学家，他们的论据仍相当空泛；“东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则很少赞同他们的看法。在《从马克思到市场》、副标题为《探索一种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一书中，W. 布鲁斯和 K. 拉斯基认为计划与有管理的市场相结合的模式是错误的。他们接受那种批评将市场作为工具的观点，同时赞同匈牙利作者们的观点，认为拒绝资本市场是维持官僚主义协调的原因之一。作者们因此捍卫了“一种全面的市场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依靠充分就业的政策，而且还包含一个资本市场。为此，就十分需要改变所有制的形式，以便激发企业的熊彼特精神。市场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目标，但是它的定义变得更加模糊：它是一种“开放的经济体制”……

W. 布鲁斯甚至在 1970 年迁居国外后仍然一直是东方改革思想的权威。而他捍卫革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态度的变化和相对的孤立——而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表明各国一大批改革的经济学家已经处于更加激进的转折点。

## 1965年模式中计划的消失

W. 布鲁斯认为,在与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相一致的运行模式中,“所有我们认为与计划经济中的市场不能分离的限制”均被取消了。“如果社会化的过程应该包含合伙生产者的直接社会所有制的发展,那么国家直接调拨资源的范围就应该缩小,而我们称之为中央政府决定的根本的宏观经济决策就应该最多是一种纪念品,而不是一项原则,以确定企业的非集中化决策和市场机制运行的范围。同样,自上而下对企

业强加一些‘行为规则’的做法也是与工人自治模式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这样的规则应该自然而然地来自集体自治的最高原则……”

“南斯拉夫的理论文章在将社会主义经济简单地定义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往往讲得非常清楚。”

资料来源:W. 布鲁斯:《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政治体制》,第75~76页,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社,1975。

## 地方分权和地方利益

在1965年改革前的辩论当中,“有关速度问题即次发达地区以何种速度去赶超其他地区的问题,人们存在着分歧。真正认为地区迅速发展的政策同时也是南斯拉夫最大限度发展的政策的人不多;而相信如果直接给予次发达地区同等数量的投资,那么次发达地区的迅速发展将极大地有益于发达地区的人则更少;因而次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落后地区不相信资金会仅仅按照市场的标

准流入,因此,它们的利益是要继续捍卫投资的计划管理,因为它们这样得到的投资比较多。同样理由,发达地区理所当然会提倡减少这种计划管理并运用市场标准来进行资源的配置;同时作为补充,会采取一种政治决策来向次发达地区提供数额明确的‘资助’。”

资料来源:D. 米伦科维奇:《南斯拉夫经济思想中的计划与市场》,第185~186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71。

## 南斯拉夫的新经验 (1965 ~ 1991)

60年代,经济制度继续发生变化,使得南斯拉夫制度的变化跨越了一个新的阶段。制度的基石已经发生变化,即使这种变化并不彻底。一党制继续存在,但它在地方上已经开始出现分裂,已经不能在形式上依靠特权阶层来控制企业。所有权和资本管理的制度不再是国有形式,而是通过“社会所有制”和企业工人自治来进行。如果说南斯拉夫的经济和社会远不是像南共联盟思想家所描述的那样是工人自治的民主,那么,1965年进行的减少国家在调节和再分配方面的作用的做法则使得它的经济制度与作为其源头的苏联模式大大地疏远了。体制的变化可以表现为调节方式和发展风格方面的明显改变。

## 70年代的工人自治社会学

“权力结构事实上是寡头政治的，即经理的地位高于工人委员会，而劳动者大众相对于领导、专家和工人委员会则处于次要的地位。有半数的人参加工人代表大会，他们主要对收入管理的结论感兴趣。”

“在委员会中，大部分成员为工人，而干部、有文凭者和职员所占的比例小（经理、领导干部现在不能再当成员了）。通常由工人中高素质的精英组成的工人委员会，其成员有时会将他们的参与看作是社会地位的提升。决策的过程是以经理、专家为一方和以委员会为一方谈判的结果，前者由于掌握技术、信息及与企业外部的关系而拥有更有利的力量关系——市场竞争和联盟的政治影响，而联盟则试图加强联合劳动组织中的等级制度和在比较低的程度上加强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的等级制度。1965~1973年这段时间是南斯拉

夫自由主义最激进的时期，工人自治表现为一种主要有利于技术专家体制的制度，现在的形势则更多的是一种经理们依靠干部并利用联盟机构而处于支配地位的形势。但经理不是专制君主。他处于一种复杂的形势之中，即他既是一个面对竞争与市场的‘自治资本的’管理者，又是一个由工人委员指定的管理者，也是一个不想脱离选民的地方政客。最后是党的影响，虽然比苏联模式的那些体制表现得更加灵活和间接，但并不是起的作用更小了，它的影响不仅在市镇和各共和国中，而且在劳动组织中都能感受到。”

资料来源：B. 夏旺斯：《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苏联、南斯拉夫、中国比较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1982年4~6月第19期，第51~52页。

## 一 工人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

1965年自由主义改革的特点主要是再分配的范围缩小以及赋予企业在投资方面完全的自主权。通过减免上交国家投资基金的所有税款以及减免支付给国家拨款的利息,企业的纳税减轻了。剩余的税(有关工资及企业收入留成部分的税收)今后归入预算外特别帐户。这种帐户分地方、共和国、联邦政府几个不同层次,用于专项开支,不用归入到作为以前再分配工具的社会投资基金之中。除了“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基金”这一项外,其他基金均被取消了。

1965年改革的一个基本内容涉及银行制度,即制定了银行与信贷法。单一银行制度实际上取消了,银行成为商业机构;它有权提供信贷,而且不受地域限制。由于银行从今往后都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成立的,而不再仅仅由地方政府来设立,因而创办者通过理事会的一种投票制度就能够监督银行(所有创办者的投票权最多可达10%)。从1971年起,联邦国家银行及八家国家银行(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逐步接近传统的中央银行的地位。

银行体制的改革使得银行扩大了投资的份额,并在1971年达到总投资的一半。1965年以后,银行的权力出现了上升趋势,这种趋势随着该部门的集中化而得到加强(1963年有220家银行,1970年为64家)。人们可以看到,作为银行创办者的企业,由于既是管理者又是借款人的这种双重身份,所以很容易得到优惠的信贷,这样就损害了非创办者企业的利益。上述因素加上中央银行的宽松政策以及1965年价格形成的极端自由主义,这些就是60年代末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原因。实际上年通货膨胀率从1960~1964年的7%上升到1969~

## 南斯拉夫的计划体制

	中央计划 1946 ~ 1950	大比例计划 1954 ~ 1961	指标性计划 1965 ~ 1974	工人自治计划 1975 年起
计划的期限	短期	中期	中期	中期
计划的范围	整个经济	宏观经济总量	宏观经济总量	整个经济
计划中包含的投资	全部	全部	少量	大量
产品调拨的数量	全部	无	无	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
计划的精细程度	对各部门都很详细	总量	总量	对重点部门很详细
企业的参与	弱	弱	弱	强
企业参与的方式	服从信息	服从信息	无	企业以社会协议确定的宏观经济大参数来决策
计划的实施	对社会政治团体和企业是强制性的	对社会政治团体和企业是强制性的	对社会政治团体是强制性的	对社会政治团体和企业是强制性的
实施方式	指令	指令	运用参数	社会协议、自治公约
企业内部计划	强	强	弱	强
企业间关系计划	弱	弱	弱	强

\*本表收入 1979 年世界银行的一篇重要报告中,它从原则上描述工人自治计划,但与实际差距比较大……

资料来源: M. 施伦克、C.E. 塔塔维:《南斯拉夫:自治的社会主义和发展的挑战》,第 73 页,约翰·截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9。

1974年的17%。另一个原因大概需从深受工人自治制度影响的工资上去寻找。1966年和1967年两年间，个人的名义收入增加了近60%。

## 二 70年代的新一轮改革

70年代初，有关1965年以后建立的自由主义经济的优缺点方面的宏观经济与社会的压力以及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对立的加剧，都使铁托担心出现分离主义的倾向。一种新的体制逐渐建立起来：从1971年宪法修正案到1974年的新宪法及1976年的联合劳动法。这种体制进一步加强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经济史中的独特性，实际上它代表了集权论者与分权论者之间的一种妥协。前者主张重新实行全面的计划（特别是有关收入分配方面）、限制市场的作用、加强南共联盟统一的职能以面对地区主义和地方主义。后者认为将制订计划的权力下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给予微观经济主体自愿协议、协商一致及否决权等权利是积极的。此外，这两种意见都赞同在企业及工人自治原则已经普及的社会机构层面实行工人自治的承诺。1971年工人自治组织进行了分化重组，建立了“联合劳动的基层组织”，主要目的是通过减少组织规模使之更加有效率：这是与现有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最小的商业单位。因此企业（今后称为联合劳动组织）通常分成数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而每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都组织一个自己的委员会。组织的形式主义以及制度的乡土观念很快造成了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经济无效率状况（南斯拉夫人表现出创造众多专业术语和缩略词的倾向，他们创造的那些词汇与苏联传统中的术语和缩略词一样晦涩和缺乏美感）。

## 制度不错,执行有误

在谈及1978年的工会大会时,铁托提到了近年来南斯拉夫发展的一些不足之处:生产率增长低、消费增长过快、投资分散、外贸赤字、负债和通货膨胀。“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同样的问题总是年复一年地在我们的经济中出现?我们清楚和明确地制定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而过后我们不得不宣布我们只能完成部分计划,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到底什么东西行不通?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履行工人自治协议和协定规定的失败。我们在制度建设、法律与计划的通过以及协议与协定的谈判方面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因此,错误不是体制存在不足之处,因为体制还能够不断完善,错误更主要的是在于随意曲

解,不贯彻已经协商一致的政策和体制原则,各级领导缺乏责任心以及公然践踏已经通过的政策。人们经常在实践中不给政策留出时间让它经受考验,却千方百计地回避它的实施或者虽正式通过了政策但却继续延用老方法。就这样,这些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的因素就悄悄地溜进体制运行这个最敏感的领域。人们远离已经协商一致的东西,为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开启了方便之门,从而阻碍了计划任务的实现。”

资料来源:《铁托在南斯拉夫第八届工会联盟大会上的讲话》,收入《1950~1980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自治》,第438页,文献,贝尔格莱德,1980。

## 地方的自给自足与工业的重复建设

“工人自治体制的一个主要缺陷是资本的流动性比较差,由于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及付诸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和国和省政府进行的,因此就加重了这种状况。在地方自给自足背景下,制度的框架有利于纵向的结合以及卖方市场行为。一些共和国和省拥有相同的工业,造成全国生产能力的过剩。民族主义的倾向加剧了南斯拉夫市场的分裂,事实表明,八个共和国和省的

贸易在70年代急剧下降,到1980年降至其贸易总额的22%左右。自那时起形势好像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以致相对来说,共和国之间的贸易,比大部分欧共体国家之间的贸易都要少。”

资料来源:《南斯拉夫,1989~1990年经合组织经济研究》,第43页,1990。

### 三 契约计划的尝试

根据联盟的理论家、特别是联盟的鼓动家 E. 卡德尔的观点,新的体制将工人自治纳入社会计划之中;它是取代苏联国家干涉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的惟一办法。

计划过程开始之时,所有基层经济单位与它们未来的供应商和客户签定“自治协议”,一旦各方自由地签定协议之后,协议就对它们具有强制性,也就是成为它们的计划基础。其目标是要从工人自治单位的这种契约计划出发逐步将各种社会利益联合起来以便达成一个总体的计划,即由基层自由协商签定的协议组成的,并通过地方、地区和国家各层次的众多协议达到与政治当局开始时提出的宏观经济大目标的和谐一致。

理论家们从这一计划中看到,由于一种真正民主的和非“国家干预主义”的计划管理将基层的自主决定(通过工人自治委员会)与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和联盟的政治干部所捍卫的并联合各层次协议组成的总体方针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调和成为可能。

然而,体制的真正运转状况与这种理想中的形象差距很大。首先,企业的工人自治在部分情况下仍然是一种形式:实际的权力掌握在经理、上层干部及管理工会的党的机构手中。一种极度的破坏性正显现出来,企业或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利己主义日益盛行。当然,没有什么能够确保企业之间以及与各种经济或社会政治组织签定的协议符合整体的利益,或者至少能够协调地统一在一起。事实上,各种计划并

## “阿格魯果美克”丑闻

1987年，大企业“阿格魯果美克”（拥有34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 and 13000名职工）是农业食品加工企业，地处波斯尼亚。它是被揭露出的金融丑闻的发源地。这个联合企业与当地银行即萨拉热窝商业银行的分行共谋发行了至少2500亿第纳尔“无担保商业票据”。这个分行完全受经理F.阿布迪克控制，它马上就走向破产。它的汇票曾出售给各地区的63家银行，特别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波黑共产党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联邦会议议员F.阿布迪克被逮捕了。来自波斯尼亚同一地区时任南斯拉夫副主席的H.波兹德拉茨似乎与F.阿布迪克和“阿格魯果美克”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家庭成员中有好几位在“阿格魯果美克”

任职），他被怀疑对金融诈骗案提供了政策支持并辞了职。毫无疑问许多机构是知情的：市镇当局、联盟干部（许多人被逮捕）、萨拉热窝的各协作银行、国家银行以及波黑社会会计服务部门。这类诈骗在其他地区也同样盛行，但是阿布迪克已经走得太远了。

“‘阿格魯果美克’事件破坏了大众对南斯拉夫几乎所有政治和金融机构的信任。它将地方政府负责人、主要企业经理与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了曝光。它也表明，这些集团和机构已经极其严重地践踏了法律。”

资料来源：H.莱达尔：《危机中的南斯拉夫》，第168~170页，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9。

不能和谐一致；或者他们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和谐一致；它更多是以妥协和非正式的讨价还价为基础而不是考虑明确规定的经济（或政治）的合理性标准。由于必须签定一系列的协议，这就导致了一种特别漫长的、令人厌烦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而且由于错综复杂的工人自治法律和制度以及联邦体制的权力下放，又使这项工作变得非常复杂。协议一旦签定，面对迅速变化的形势（特别是国际形势），协议就成为僵化做法的根源。1976~1980年的联邦计划和1981~1985年的计划实际上未能根据已提出的规划制定出来，人们发现在“工人自治计划”（微观经济）与地区或联邦的宏观经济计划之间明显缺乏一种协调关系。

计划的“契约主义”经验，由于它用极其复杂的、不灵活的、极其难懂的、详细的和最终无法实施的法律规则来代替中央计划和市场，因而被认为是完全的失败。如果说南斯拉夫的环境以及它内部的压力造成了这种失败，而对规划的设计及隐含的假设则肯定是其主要的因素。

#### 四 体制的危机与不稳定

70年代实行的新的组织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地是负面的。60年代开始的发展模式的细微变化以及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增加（尽管向国外大量移民），从7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加剧。经济增长放慢，债务向上攀升，直至1982年发生债务危机（200亿美元）。如果1980年铁托去世是一个导致国家在10年中瘫痪和解体的政治危机的因素的话，铁托之死也与南斯拉夫进入经济大动荡时期相一致。生产

## 增长的大幅回升(百分比)

	年平均			总数
	1960 - 1970	1970 - 1979	1979 - 1985	1979 - 1985
社会产品,1972年价格(调整后)	6.0	5.6	-0.9	-5.5
个人消费,1972年价格	6.3	5.6	-0.5	-3.1
人均个人消费,1972年价格	5.7	4.5	-1.3	-7.7
固定资本总投资,1972年价格	6.7	7.1	-7.5	-37.2
社会部门产值,1972年价格	7.1	6.1	-1.1	-6.6
在生产性社会部门的劳动者	2.6	4.3	2.5	16.1
社会部门人均实际产值	4.3	1.8	-3.6	-19.5
社会部门人均个人实际净收入	6.8	2.1	-4.7	-24.9
每个时期最后一年的情况:				
- 登记求职的月平均人数	320000	762000	1040000	
- 净外债(10亿美元)	4	13.75	18.75	

资料来源: H. 莱达尔:《危机中的南斯拉夫》,第41页。

停滞加通货膨胀是当时大危机的表现形式。

整个 80 年代，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各种制度的因素仍居高不退。从许多企业的情况看，工人自治使得名义工资的增长过快。同时在放宽银行信贷及扩大企业间信贷之后，“柔性预算约束”成为企业的长期问题。企业间的信贷在债务人遇到困难时成为一种强制信贷。破产非常罕见，面临困难的企业由地方当局负责摆脱其困境。实际上，中央银行在各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影响下加上由于协调一致的决策（总）体制，因而在实行限制性货币政策当中表现得尤为脆弱，而这种限制性货币政策通常是必需的。在各共和国的压力下，80 年代货币发行数量巨大（联邦垄断发行权）。更全面地说，人们观察到，税收或货币手段，即联邦经济政策工具的效率是特别有限的。原因之一是联邦预算所占的比重比较小：80 年代后 5 年，联邦收入占社会总产值的 6%，这个数字低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

## 五 关键的 10 年：80 年代

许多稳定计划和紧缩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下在 80 年代被一个接一个地制定出来，但没有太大的成效。特别是在 80 年代后 5 年，公开的论战越演越烈。自从 B. 沃德在 1958 年发表了那篇开创性的文章之后，大量有关自治企业的文献得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自治企业的目的大概是要最大限度提高工人的人均收入，而不是提高企业的利润，自治企业的生产和就业情况都比竞争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差，而资本的密集程度则更高。在南斯拉夫新一轮的讨论中，对这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的评论受到强烈的质疑。许多措施出台，开始限制或削弱

## 1989年的超级通货膨胀

“1989年允许自由确定工资的决定掀起了通货膨胀的进程，工资—价格及价格—价格的驱动效应为超级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到1989年9月为止，在8个月中实际工资提高了20%，这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对管理价的无规律的调整导致在提价和通货膨胀预期之间产生一种持久的互相激励的效果。通货膨胀已经像脱僵的野马开始奔驰无法控制；生产者在除帐发货的时候往往将价格定得比日常价格明显地高一些，因为他们预见到

了结帐之时货币实际价值的销蚀可能带来的损失。消费价格的年上涨率在1989年第四季度达到13000%，而第一季度只有500%。这样，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第纳尔已经失去了它的两个主要职能：作为储蓄工具的使用价值和作为计算单位的作用。实际上，南斯拉夫国家货币在企业 and 家庭交易中越来越多地被马克所取代。”

资料来源：《南斯拉夫，1989~1990年经合组织经济研究》，第16页，1990。

## 社会所有制的私有化计划

“联邦政府刚刚向议会提出一系列法律建议，以便为社会所有制指定所有者。这个阶段拟采取的解决办法是鼓励工人入股。所有社会所有制企业有两年的时间来转变成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这些企业的工人和退休人员对即将发行的（非流通的）‘内部股’有优先购买权，他们还享受低于实际面值的减价。然而最多购买量不能超过3年工资总额，款项可以分10年支付。另一方面，在所有‘混合型’的企业中将取消工人委员会，因此，在转变成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机构中也一样。于是，

它们的领导机关就是在这类企业方面人们所熟知的机构（股东大会、理事会等）。此外，还有现存社会资产的代表。公共机构负责对企业的改制工作，特别是在确定发行价方面提供咨询。另一方面，在仍然是社会企业或混合型企业中，经理们的权力无论在招聘和解雇方面都得到了加强。”

资料来源：M. 德费利斯：《南斯拉夫的改革和骚动》，《经济与人文主义》1990年10~12月第315期，第73~74页。

企业的工人自治。1983年前后,协商的计划管理体制被取消了。

经济学家或政治家提出的新观点与中欧其他国家的主题汇合到一起:市场不能局限于产品领域,它应该扩展到资本和劳动力领域,私有化(在这里,涉及“社会所有制”)是合乎愿望的;必须限制公有部门并保持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与匈牙利、中国、甚至1987年以后的波兰不同,南斯拉夫在“社会”部门改革的相互作用当中以及在正式的私有部门(农业、旅游、餐饮)或非正式的私有部门扩大的过程中受益微乎其微。

1989年,由于价格自由化政策以及对货币贬值和放松对工资的控制的政策运用不当而使飞速上升的通货膨胀演变成超级通货膨胀:1987年为120%,1988年为184%,1989年价格上涨达1240%。1990年1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下,政府实行一种与波兰近似的“休克疗法”:开放极大数量的价格以及大部分商品进口,冻结工资,实行限制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德国马克的指数确定第纳尔的兑换率。这个计划将消灭超级通货膨胀,但是像波兰那样,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生产萎缩、失业增加。

1991年,经济体制的解体问题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问题,由于联盟的分裂和内战悲剧的发生而退居次要地位。作为一种长期以来被认为与苏联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不同的独特道路的经济体制,它的失败看来反而比东欧邻国的失败要更加惨重。

## 团结工会提倡的经济改革

“第一条：我们要求在各级领导部门实行一种民主的和工人自治的改革，以便使新的社会经济体制能够将计划、自治和市场结合在一起。团结工会要求一种改革，这种改革应废除官僚特权并使之不能死灰复燃。改革应该促使大家去工作、去创造，它不能仅仅是表面文章。改革要带来社会成本，因此，就应该保护某些人民团体的利益，团结工会将关注此事。

1. 应该取消以专断方式领导经济的体制。这种方式下不可能进行合理经营。在这个体制中，党的机构和官僚掌握着经济的生杀大权。为指令体制服务的经济组织结构应该予以解散，必须将经济管理部门与政治权力部门分开。必须废除企业经理对政府部的依存关系以及任命党的特权阶层人士担任重要职务的做法。……

2. 应该建立新的经济结构。在经济组织中，基层单位是社会企业，它由以工人委员会为代表的一组人管理，并由委员会通过竞选方式任命的经理负责，委员会有权撤换经理。

社会企业在符合社会及本身利益的基础上支配赋予它的国家财产。企业在管理中将实行经济核算。国家可以通

过法规和价格、税收、贷款利率、外汇汇率等经济手段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

3. 必须铲除妨碍市场运行的官僚主义障碍。中央经济管理机关不应该强行限制企业的活动范围，也不应该给企业指定供应商和销售商。企业在国内市场除了一些必须许可证的领域之外可以自由地行动。国际贸易应该让所有企业参加。团结工会重视出口的重要性，认为它能给国家和劳动者带来利益。消费者协会和反垄断法务必注意使企业不能在市场上获得一种特权地位。应该有一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律。供求关系应该决定价格。改革应该使计划社会化。中央计划应该反映社会的呼声并被自由地接受。因此公开的辩论是必不可少的。应该有可能介绍各种性质的计划以及社会组织或公民组织制定的计划。接近完整的经济信息因而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还要求国家统计局实行社会化管理。”

资料来源：《团结工会纲领》，1981年10月大会通过，《抉择》，1982年1~2月第14期，第15~16页。

## 波兰从团结工会到“大爆炸” (1980 ~ 1991)

### 一 自律的革命

1980年团结工会的产生是共产主义制度历史上以及共产主义制度走向最终解体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事件。只有从战后波兰纷乱的历史背景以及从工人运动的尝试过程和知识分子的对立思潮中才能理解团结工会的出现。上述两者在70年代的结合、执行自律革命的策略及运动领导人卓越的韬略，所有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左右了1980年夏的请愿活动以及通过格但斯克协议而赢得的胜利。政府受史无前例的社会爆炸的震撼，承认了独立的工会组织（大约1000万成员），因而具有历史意义。继续保持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是它的交换条件，然而这种承认表明第一次对一党制提出了异议，因为一党制意味着要控制所有的“社会”组织。这样就第一次在体制的基石上出现了裂缝。此外，党和

## 国会中的工人自治议会？

在团结工会内部争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在议会中设立负责经济的第二议会的观点（这使人想起奥斯卡·兰格1956年提出的一个类似建议）。这个建议具有策略意义，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中的地位并未因此受到直接的影响。

1981年5月一篇题为《网络》的计划中这样写道：“在国会中应该组成一个第二议会，它将民主选举出的工人自治机构、消费者联合会、科技协会、生态和自然保护运动、全国委员会和工会等方面的代表汇集在一起。在这个议会之上是众议院，它代表着国家的政治利益。这个工人自治机构的议会应该起到中央调解人的作用。众议院只有在其决定与国家最高利益相违背时才能去干涉它的抉择。工人自治议会因此是整个国家生产资料的真正社会所有者。于是在国会内，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就被分离开来了。管理社会化的要求将得到实现并将取消压力集团强加个人经济观念的做法。工人自治机构议会将在全国范围内充当协调工人委员会活动的角

色。它将以多年计划的形式为国民经济制定基本方针、描绘战略蓝图。它将成为最高的社会管理者。”

在1981年10月的团结工会纲领中，再次出现这样一种陈述，但是以一种更加笼统的方式出现：

“第22条：工人自治的机构和结构应该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有一席之地。

1. 应该给予工会提出法律建议的权利。

2. 我们将为恢复国会中的最高权力而斗争。新的选举制度应该使这种权力具有真正的代表性。

3. 我们认为需要考虑在最高国家权力中建立一个工人自治机构的必要性。它的任务将是监督经济改革计划的实施和管理地区工人自治机构的活动。”

资料来源：《工人自治的复兴》，《抉择》，1981年9~10月第12期，第40~41页。  
《团结工会纲领》，《抉择》，1982年1~2月第14期，第25页。

制度作为工人阶级权力的化身，其合法性再次受到激烈的挑战，这不仅在实际中有表现，而且还表现在表面的妥协方面。这种妥协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国家与平民社会之间的冲突。后来在 1981 年 12 月军队为挽救体制而进行的干预（大概也是为了避免苏联的干预）结束了有关共产党合法性的危机。

1980 年的社会危机是在 70 年代末登峰造极的经济紧张状态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爆发的，这促使政府在 10 年里第三次宣布大幅度提高零售价格。就像 1970 年和 1976 年那样，情况达到爆炸的程度。团结工会在开始阶段的活动中，主要集中在争取当局尊重它的存在并捍卫生活水平的斗争。但是经济困难的加剧以及政府的无能使得工会的领导人在 1981 年春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使得他们从今往后关心起有关经济改革和管理方面的积极建议。

这种程式般的思考特别受到“大企业网”的推动，这个网包括波兰 17 个最大单位的工会代表，它将使工会中的大多数转向要求工人自治的请愿——虽然开始时因有前车之鉴而行动有所保留。

## 二 重返工人自治

1980 年底，政府提出一项有关工人自治的法律草案，目的是使产生于 1958 年但信誉扫地的“委员会”恢复活力。经理们运用策略建议团结工会参加现存的“委员会”从而将团结工会的各部分和企业的管理结合在一起。作为回应，在这种独立工会的大潮中，一种真正的工人自治观念再度出现。

## 工会与工人自治:两种不同职能

在计划的讨论过程中, K. 莫泽莱夫斯基坚持认为工会与工人委员会应该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工人委员会实际上有可能抵挡不住企业的利己主义, 而工会一般是为反对不平等而斗争的。“甚至团结工会也应该独立于工人自治。如果有这样一种工人自治制度的话, 如果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获得这种制度的话, 这样做也是为了使这种自治制度能够避免南斯拉夫所未能幸免的危险。此外, 这些社会危险是官方在反对网络计划的宣传中提出的惟一合理的论据。这个论据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

实基础上的, 即这些建议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摊派, 而且具备最好的投资条件并配备着最现代化的机器的企业将拥有强大的阵地, 在市场上几乎占据垄断地位。这些企业可以运用手中的这些王牌去满足它们本行业的特殊利益, 而不惜牺牲那些经济上相对较弱的企业和地区。”

资料来源: J.Y. 波泰尔:《团结工会时期波兰的工人自治要求》,《劳动社会学》, 1982年第3期, 第273页。

## 企业行为的变化:缓慢的结构性破坏

70年代和80年代通过对波兰企业的调查, J. 贝克斯雅克在1988年对这些企业进行了分类, 指出它们的特点, 并将它们划分为两个时期: 1980~1982年之前和1980~1982年之后:

### 改革前的企业

● “不加掩饰”的企业是那些集中模式的企业;

● “直至新秩序”企业即后斯大林时期的企业, 它们实行了权力下放和某些非指令性的做法; 这些缓和的做法可以很容易被取消, 因此存在一种组织方面的不稳定的因素, 对经理们也有一

种不确定的因素;

● 私有企业(农业、手工业、小买卖): 它们的经营符合一个实际的市场, 但是这一市场受到地方的限制和社会主义环境的极大制约。这类企业有四种“应答结构”或行为特点:

——“服从”: 常规的管理及对主管部门意图的揣测;

——“追求舒适、安逸”: 追求企业的利益和满足当局的要求;

(转 164 页)

在这个草案中，确实存在着与南斯拉夫相象的地方：委员会由全体员工选举产生，它在有关企业战略、收入分配及经理的任命方面拥有真正的决定权。“社会化”的主题作为“国家化”的对立面伴随着“社会企业”而出现，即通过自治机构来管理手中的国家财产。

波兰请愿活动的独特之处表现在几个方面：对特权体制的直接挑战，工会与自治机构的明显区别，地方、地区及全国循序行动以便能够组成一个负责协调“社会化”计划（即计划是以民主方式制定的）与企业自主经营的国会新经济议会的想法。这一观念以及将“计划、自治和市场”结合起来的观念仍然很不成熟。工人自治与集中化的计划管理的不可调和性明确地被再次重申。关于经济制度方面，团结工会描绘的计划属于激进的改革，目标是走向体制的解体（对一党制提出部分质疑、改变所有制使之“社会化”）。设想中的经济体制使人联想到具有强烈自治成分的布鲁斯模式或匈牙利新经济体制。至于在团结工会纲领中提到的“工人自治共和国”则表明了这种社会概念在要求建立民主体制和法制国家中的作用。

### 三 军管状态下的改革

1981年共产党政府在社会压力下制定并准备从1982年起逐步实施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一次激进的改革。1981年12月实施的戒严令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情况（禁止团结工会的活动、逮捕工会领导人、民众积极和消极的反抗）说明了改革的局部性以及改革在起初所包含的妥协因素的加强。外部制约（债务、西方制裁）也同样发挥了作用。尽管改革没有达到确定的目标——建立市场平衡及提高效率——但它对体

(承 162 页)

——“追求安逸并具战斗性”：追求企业利益，对当局频繁活动（讨价还价、施压、对决策唱反调）；

——“商业化、战斗性”：在保护企业利益的同时主要面向消费者（这类企业通常受地方领导而不是受中央领导，以非指令性方式进行管理），对当局和契约伙伴频繁活动。

#### 改革后的企业

● 经理制的企业：根据改革计划，这类企业是自主的，但是所赋予的权力可以收回，此外，行政管理部门并没有改革；实际上，这类企业与“直至新秩序”企业类似；

● 工人自治企业：改革中它被当作解决问题的一个通常方法，但在实际上很受限制（在一些情况下，最多只能说工人参与）。

#### 其他企业(改革后)

● 新成立的私人企业或合作企业：这是真正自主的企业；尽管受环境的制约，但是它们仍发展很快；

● 混合型企业：这类企业有多种形式，例如，一个企业既有官方股东又有私人股东或既有国内股东又有国外股东。从 1982 年起，可以看到这类

企业的“战斗性”行为更加普遍（包括运用新的组织形式，或钻法律的空子）。行政管理部被分割后，其地位不如以前那样强大。地方当局和银行从产业部手中争得权力。企业间的市场关系更加发展，但是由于不确定的因素（危机、通货膨胀），企业的眼光很短浅，交易常常是投机性的。

副业已经扩展得非常广泛，它与官方经济交织在一起。货币的分裂状态（美元化、商品货币）阻止了市场现象变成真正的市场机制。这里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

“如今经理们更加直截了当地为他们的企业和他们的利益（主要指收入）而努力，对消费者的需求关心得更少了，但是他们会更多地满足职工的要求。在与当局的关系中，他们表现得更加主动，盲目服从的做法减少。他们与其他经济主体，特别是与其他经理们在商业和非正式的关系中联系更加密切。”

资料来源：J. 贝克西雅克：《波兰企业的角色与运行》，收入《欧洲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中的经济改革》，第 117～122 页，纽约，（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89。

制并非没有影响。经过几次(受控制的)消费品价格上涨,波兰进入到通货膨胀阶段(1982年零售价格上涨100%,1983~1987年间每年上涨15~25%)。

企业实行的“三自”原则是改革的支柱:自主(取消集中化的计划管理)、自治和自供资金(结束随意分配、允许破产)。分级的目标管理以及物资调拨应该取消。然而在有关国防和对外承诺(经互会)的实施计划方面规定了例外,而且1982年以后事实上范围还有所扩大。1983年开始实行“政府定货”办法,原则上有所限制,但是在实践中很广泛。这种定货或许对1987年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国家定货”有所推动,这种定货单是企业追寻的目标——就像以后的苏联。实际上,得到订货单的同时物资供应也得到了保障,然而短缺仍然很严重。

所有权的问题羞羞答答地出现了。改革引入了新的法律主体即国有企业或市镇企业的“创立者”;政府产业部或地方当局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应该充当公司的代表。同时,对国有、合作和私有各个部门还宣布了相同的待遇。

在与外国的经济关系中,尽管80年代存在强大的外部制约,改革还是削弱了国家垄断,特别在与西方交流方面。允许直接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单位在增加(1982年245个,1988年905个),对出口挣得的外汇实行提留,甚至将外汇进行拍卖,兹罗提多次贬值(并没有达到消除对它的过高估价),在合资公司中放宽外国投资。

#### 四 “第二阶段”的重新推进

经过1985年和1986年两年明显的停顿之后,一个新的转折开始

## 1982年以后的价格

改革引入了3种类型的价格：固定价（官方价）、管理价及合同价（自由价）。

“计划者曾设想，随着市场平衡的改善，合同价将逐渐扩大。相反地，他们却指望用合同价来实现这样一种平衡。这些愿望均没有达成。合同价按照一种悲观主义的剧情而发生变化，而计划者根据以前的经验是理应可以预见这种情形的。合同价促使物价上涨。严重的短缺和缺乏竞争使生产者能够强加他们的价格。所以，生产者也没有

压力要迫使其节约成本。为了恢复市场平衡、改善相对价格，1982年官方价作了重大调整，这些价格就跟着上涨。管理价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按照计划者的愿望运转的。这里也有一种抬高成本和价格的倾向。一些人认为，旨在吸收高额利润的利润渐进税同时助长了价格的上涨。毫无疑问，工资的增长超过年度计划预定的增长幅度，也同样助长了物价的攀升。”

资料来源：J. 亚当：《60年代以来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改革》，第156页。

## 社会主义改革还是向资本主义过渡？

从1986年起，再次出现一场公开的讨论，它显示，舆论已发生重大的变化。

“资本市场的问题，亦即经济发展与结构变革服从市场规则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以前，人们支持将这些领域留给权力机构的做法，认为市场作用应该局限于日常的调节。另外一种观点也开始盛行起来，即认为为了重建经济，应该改变所有制的形式。在60年代初仍未触及的所有制这个禁忌（盖莱克的大型经济组织改革），从团结工会时代起出现松动并且到现在最终消失。因此，与1980~1981年相比，结果是讨论的主题发生了转移。今后要弄清楚的是应该在加强市场的作用同时保存社

会主义或者还是干脆将社会主义抛弃。可以说有关改革的讨论已经转移到有关摧毁经济体制以及向资本主义回归的方式上面。人们可以观察到在各自阵营中分界线逐渐发生变化，而且不再与当权派—反对派这条分界线相一致。赞成重新资本主义化的人（他们并不用这个措辞）出现在当权者内部，而在反对派内部也有一些人希望保留改革后的社会主义。”

资料来源：W. 库辛斯基：《回归之路：1956~1982年波兰有关市场与所有制观念的发展》，《东西方比较研究杂志》，1990年第21卷第2期，第30页。

酝酿。1986年大赦并释放政治犯，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与昂纳克不同，雅鲁泽尔斯基不反对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起上台执政）。1987年初，始终处于秘密状态的团结工会要求进行真正的改革以确保公民从事经济和创业活动的权利以及向一种真正的混合经济过渡（工人自治的国有企业、市镇企业和私人企业）。4月政府宣布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革，其目标与1982年“第一阶段”一样：效率更高、恢复市场平衡。第二阶段的天平更加偏向市场而不是计划，这个时期重新采取了1981年就已经提出但没有（或很少）实施的许多措施；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这说明甚至官方的改革思想也在发生意味深长的变化。政府的“174条”规定国有企业、合作企业和私人企业在法律面前将一视同仁。30年代的波兰经济立法在国有企业转变成（股份或有限责任）公司的过程中重新恢复活力；各经济主体（包括个人）创办企业的做法应该得到鼓励；1982年的破产法应该得到实施；国有企业允许发行债券，个人可以购买这些债券。银行改革将中央银行与竞争的商业银行（原地区、地方支行）在层次上区别开来，商业银行可以成为股份公司。1981年开始酝酿，1987年10月正式决定取消各产业部；用惟一的工业部取而代之，像匈牙利曾出现过的情况那样。

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影响和支持的政府，它的逻辑是，应该首先建立市场平衡，然后逐渐进行这些改革。换言之，先稳定，后改革。政府始终在寻求失去的合法性，它在11月组织了一次全民公决让人民对紧缩和改革计划发表看法。团结工会呼吁抵制投票。只有44%的登记选民投了赞成票；当局承认了它的失败，促使物价上涨并放慢了预定的行政调拨的缩减速度。潜在的政治危机加剧。摆在面前的是死胡同。

## 1989年4月“圆桌会议”的妥协

工会多元化：

团结工会、农村团结工会、N.Z.S. 大学生联合会重新取得合法地位；重新招募1981年12月被遣散的团结工会活动分子（涉及5万人）。

政治改革：

两院制议会。在议会，65%的席位留给执政党及其追随者；在参议院，自由选举。共和国总统拥有广泛的权力（第一次由议会选举，以后由普选选出）。结社自由。司法独立。允许反对派的出版物。

经济改革：

同意工资按指数(80%)计算。军管时期取代团结工会的亲共产党工会O.P.Z.Z. 反对这项措施而要求按100%计算。

签字者支持政府捍卫的“新经济体制”：自由竞争，行业和非垄断，发展私有部门，加强工人自治，清理亏损企业同时让被解雇的人员转岗。

资料来源：G. 明克：《波兰》，收入《苏联与东欧》，《文献摘要与研究》，法国文献出版社，第4891-4892期，第149页。

## 1989年的超级通货膨胀

有三件事在通货膨胀向超级通货膨胀过渡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1989年3月，允许家庭从黑市上合法地获取外汇。黑市变成公开的市场。这使得人们能够逃避本国货币。第二，作为团结工会与政府之间圆桌会议的结果，1989年4月通过一项工资按指数计算的正式方案。它的目的是确保工资的增长不超过年零售价格增长的80%。实际上，以指数方式保障的调整常常被合并到其他已经取得的工资提高中去。结果：1989年8月社会

主义部门计算出的实际工资比上一年的水平增长45%。第三，共产党政府实行的最后一项重要改革是放开大部分食品的零售价格和一些农用产品的价格，并大幅度减少食品补贴的水平。这些措施导致食品价格的暴涨（根据官方统计8月份上涨180%）并促使工资—物价—汇率呈螺旋形加速上升。”

资料来源：D. 利普顿，J. 萨克斯：《在东欧建立市场经济：波兰的情况》，《布鲁金斯经济论文》，1990年第1期，第109~110页。

## 五 走向大转折

波兰共产党政权的最后一年，政府失去了对预算、银行体制和国际收支的控制。紧缩政策受到罢工和工资方面请愿的阻碍，通货膨胀1988年上升到60%。工资大幅度增长，兹罗提多次贬值。1989年春天，“圆桌会议”的历史协议开创一种进程，使得波兰在9月组成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即得到民众大力支持的马佐维耶茨基政府。但是国家正面临超级通货膨胀而摇摇欲坠；这年秋天，物价每月上涨35~50%。经济学家G.科洛德科在分析中所说的80年代危机的典型特征“短缺-通货膨胀”转变成短缺-超级通货膨胀。在这种背景下，财政部长L.巴尔采罗维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专家一道制定了1990年的“休克疗法”。波兰的形势是独特的；在邻国进行政治革命的时候，实行自由经济并拥有强大的民众支持的波兰政府正致力于两个相关的任务：迅速稳定经济及大力变革体制。

## 六 休克疗法

巴尔采罗维奇计划使这两方面紧密结合在一起。人们逐渐看到，199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稳定计划非常符合休克疗法；而向一种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则需要更长时间的转变过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通常做法，稳定的基本目标是要减少过剩的需求以制止通货膨胀。5项相关的政策于元旦之日同时颁布执行。大力减少补贴及投资支出，其目的是要恢复预算平衡。极其严格的信贷政策，主要通过大幅度提高利率来完成。工资的增长应该保持在通货膨胀率之下，通过一种大大低于100%的指标机制及税收措施使得国有企业不敢提高工资基

##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法的批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国际收支差额的货币方法”忽略了信贷在经济中的作用。此外，这个理论框架并没有考虑到短期目标（通货膨胀和收支差额）与中期目标（增长）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这两个因素部分地说明了大部分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国家反而使自身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原因。首先，这些国家采纳了一些稳定措施以便到达一些短期目标（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制订了希望达到的通货膨胀和国际储备水平）。然而，这些政策限制了信贷，它们不仅对总需求，而且——偏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式——对生产的水平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种生产水平的下降一方面与经济生长的目标（中期目标）不相容，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使经济离开其短期目标（通货膨胀和收支差额）。在通货膨胀和储备方面成果不如预期的那样好以及生产下降而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成本的提高，最终导致了逐步放弃最初的措施。在这种描述中，人们不仅可以辨认

出最近 10 年中的一些拉美国家（阿根廷、巴西等），而且还可以看出 1988 年南斯拉夫所经历的以及目前正在波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另一方面，即使一种稳定政策能够谋求解决宏观经济失衡的局势根源，但它——几乎从定义上就——将结构方面和制度方面的调整都放在一边。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拉美和东欧——经济困难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形势方面。因此，稳定政策是否有坚实的基础的问题就非常重要。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是将稳定局势的政策置于所有结构措施之前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种做法往往与那种使国家持久地摆脱经济困难的方法是背道而驰的。阿根廷和波兰的例子进一步肯定，制度框架和结构方面的措施是所有成功的稳定局势的尝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资料来源：P. 登宾斯基和 J. 莫里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政策：对拉美和东欧的评价》，《东西方比较研究杂志》，第 21 卷，1990 年第 4 期，第 91 页。

金。零售价和批发价 90% 都放开了,一些仍受控制的价格则大大上涨(能源的价格上涨 3~6 倍)。最后,外贸垄断被取消了,兹罗提变成可兑换货币(同时兹罗提贬值近一半并稳定在新汇率上面),海关关税降低。

1990 年休克疗法的效果是对比鲜明的,因此,在解释方面引起了国内和国际上的争论。从积极的一面看,人们恢复对超级通货膨胀的禁令;通货膨胀率的降低(然而它仍然非常高)、短缺现象的消失、对本国货币信心的恢复、新汇率的稳定及出口的大幅度增长都改善了对外收支。这些货币方面的成就被 1990 年实际经济状况所受的出乎意料的严重影响所抵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12%,工业产值下降 25%、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与极度的短缺时期进行对比,则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出现 113 万失业者,而预测是 40 万人。

在这场论战中,经济学家认为,计划过于严厉,它忽略了结构性的方法;另一些人则认为消极影响被扩大了(例如忽略了快速增长的私有部门),并认为现行的政策可以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下去。经济学家与这一类人在观点上互相对立。瓦文萨于 12 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后,在由 J. 别莱茨基组建的新政府中,后一种观点占上风,在该政府中有始终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 L. 巴尔采罗维奇。然而,瓦文萨的竞选运动有很强的民粹主义成分,害怕企业关闭、失业上升。

## 七 向资本主义过渡:大跃进还是转轨?

波兰传统体制的解体过程已经走过好几个阶段,并且还将跨越新

## 社会“保障网”

“在波兰，在实行稳定计划的前夜，一种失业补偿制度开始实施，它由单位的分摊和政府的拨款提供资金。可以预见，就业办公室的数量仍然不够，而且可以感觉到缺乏高素质的人才。总的规定是只有那些失业前在本年度至少工作6个月的人才能获得补助，而且，这种补助一般不超过最低工资的95%。与社会保障体系其他方面有关的支出和收入由一些分别设立的基金进行管理，这些基金基本上是由单位分摊来提供资金的。……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培训

的措施以及企业的重组不仅受阻于紧缩的预算带来的财政制约；而且由于失业率大大超出预计的增长幅度（1990年），这些措施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劳动力的流动由于住房的严重短缺而受到阻碍，尤其是在波兰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资料来源：《1990~1991年欧洲经济概览》，第149页，纽约，（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91。

## 对私有化的意见

“公众舆论研究中心进行了几次民意测验。根据民意测验的结果，私有化并没有被看作是最重要的问题。然而，大多数波兰人承认，私有化即使会使某些企业破产，但对整个国家经济是有利的。根据被提问人的意见，私有化不仅对工人而且对于干部而言都使他们提高了工资并改善了技能。然而，仅仅是四分之一的被提问者声明愿意积极投身于此项进程之中。提出保留意见是由于缺乏资金和完全不了解新体制的运行情况。……另一个与私有化相联系的社

会问题是原共产党特权阶层的地位问题。他们是私有部门发展的参与者，他们在波兰人中造成了强烈的反响。特权阶层掌握着实现私有化所需的巨大的资本。另一方面，他们的成员占据着良好的位置，如外贸机构，他们有经验并了解外国的情况。”

资料来源：A. 博尔兹达：《波兰的私有化》，《东方国家通讯》，1991年4月第359期，第19页。

的阶段。这种解体不是（是非颠倒的）“大革命前夜”的那种现象，或者按照 1990 年自由经济学家最喜欢的比喻，是一次越过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割裂开的悬崖的大飞跃。如果这种说法有意义的话，主要表现在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统一的情形方面，这里也许甚至应该对这种说法有些不同的看法。

甚至在 T. 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组成之前或者不久以前，传统体制的一些重要要素被取消或者削弱了：单一的等级控制、分级的目标管理、单一银行制、对外贸易的垄断、对私有部门的限制。所有这些确实都属于激进的改革。但是确切地说，它也是紧随巴尔采罗维奇稳定计划之后的体制的重大变革：取消所有集中化的调拨、取消固定价格、结束对外贸易垄断的遗留做法、减少再分配。大家之所以毫不含糊地说到体制的解体，这大概是因为今后政府——及波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的明确模式正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而且特别是因为体制基石的两根支柱之一“一党制”已经被摧毁了。然而，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氛围——即包括一个高效的公共管理部门——则还有许多事要做。如果说各种进度都可以设想的话，那么甚至“渐进主义”的反对者们也不得不逐步地承认时间因素的重要性。

某些变革可以很快加以实施。因此，税制改革就应该在 1992 年进行：过渡到增值税和统一渐进的所得税。另一些变革例如银行体制的革新需要若干年的尝试和人员培训，而新兴的私人企业则需要若干年的组织发展。

但是体制解体及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形成的最后一方面工作仍在进行——对这个方面，波兰政府和国际组织及西方国家均极为关注。这涉及到建立资本市场和私有化的问题。

# 波兰私有部门的活力

## ——非农业私有部门的就业和生产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sup>①</sup>
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5.3	5.6	6.2	7.0	10.1	16.0
占工业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3.2	3.4	3.6	3.9	4.8	11.0

①估计值

## ——总体的增长与私有部分的增长

	1989(上一年为 100)	1990(上一年为 100)
工业生产	99.9	77.0
- 私有部门	122.0	108.0
零售业	97.3	84
- 私有部门	161.8	(4.5 倍)
投资	97.6	92.0
- 私有部门	102.6	97.0
就业	99.0	97.0
- 私有部门(非农业)	127.0	127.0

资料来源：P. 黑尔和 L. 格罗斯费尔德：《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私有化》，收入《中东欧改革之路》一文，《欧洲经济》特刊，1991年第2期，第136~137页。

## 波兰和匈牙利的不正规私有化

“在今年(1990年)发生重大政治变革之前，匈牙利像波兰一样出现了自发的私有化浪潮。在这个浪潮中，经理们运用想象力利用有关将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方面的法律规定的缺陷钻空子，将大部分股票据为己有或以低廉的租金租用企业的资产。波兰新政府很快制止了这种做法。虽然匈牙利私有化开

始时的‘丑闻’使国家私有化管理局的监控力度有所加强，但它对经理们的此类做法则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

资料来源：F. 丹吉：《匈牙利与波兰的变革计划：内容与排序》，《美国经济评论》，1991年5月第81卷第2期，第325页。

## 八 私有化

从1989年起，将国有制转变为私有制成为后共产党政府的一个中心目标。考虑到财政及制度的限制，所希望采取的方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论。1990年7月的私有化法令规定了各种私有化措施及各种所有制的形式：出售股票、凭证或凭票配给、个人所有制、市镇所有制及职工所有制。机构所有制也是可能的。

“小私有化”主要涉及商业和餐饮业。它交由地方当局来进行。国有企业（大约有8000家）的“大私有化”首先是对它们进行“商业化”：这些企业转变成股份制公司，开始时由国家持股（在这个阶段，职工可以以半价购买20%的企业股票）。在1991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开始向所有公民发行债券，每一个人又将自己的债券放进一种私有化基金；私有化基金是一些新机构，私有化之后，它们将成为企业的真正股东。政府依靠外国金融家来形成这些基金，并希望他们作为其所持股的企业的活跃的所有者来行事。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个人可以根据所持的债券数量在证券市场上换取股票。

这种将一部分国有财产“自由分配”的做法，其明确的目的是要发展大众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使私有化能够迅速地进行。由于波兰家庭储蓄不足却面对大量需要转变的资产，传统的方式显然不可能做到。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极端自由化计划当中也能够看到这种方法，而捷克斯洛伐克在开始阶段并没有私有化基金这个中介。甚至在立陶宛，也有一个类似的计划。

未来将告诉我们这种票证的方法是否可行，是否有些成效。在波兰及其他地方，私有化——对传统体制最后一个遗产的肢解——将持续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假定它能达到目标的话。

## 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化”

当波兰知识分子将社会变化从理论上归纳为（平民）社会反对国家的斗争的时候，匈牙利的异端分子在国家社会主义范围内发明了“资产阶级化”的概念。这种方法上的区别反映了70年代末与整个80年代期间两种社会现实与两种解放（生产力）战略之间的差异。社会学家I.塞莱尼以农业为例对匈牙利这个时期在国有部门之外扩大企业家领域的做法进行了研究。

塞莱尼改变了G.康拉德在1974年所写的著名的《走向权力的知识分子》（瑟伊出版社，1979年）一书中的结论，他写道：

“尽管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方面，行政部门所作的让步比我们预期的要少，但它对私有部门、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却显得更加宽松。看来匈牙利行政部

门已经意识到，通过准许副业的活动和允许新的小资产阶级的形成从而可以补偿它本身缺乏效率的运转。正是这一政策带来了匈牙利政治经济的奇迹。80年代初，随着国有部门中实际工资停止增长或下降，副业开始带来收入从而维持了生活水平、维护了漂浮中的经济、促进了政治的稳定并将战斗的工人阶级引导到了‘生产场所’中去。匈牙利小资产阶级之梦表明，只要在副业中努力工作就能获得一种惬意的生活。担心工会、或者在国有部门和工作中所发生的是是非非是毫无用处的。真正的生活开始于下班之后！”

资料来源：I.塞莱尼：《社会主义企业家：匈牙利农村的资产阶级化》，第217页，剑桥，波利蒂出版社，1988。

## 匈牙利激进改革的实验室 (1980 ~ 1991)

70年代末,在外部形势压力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匈牙利开始了第三次改革浪潮。80年代的前5年,它仍显得羞羞答答,主要表现为有关改变经济体制的公开争论。它随后经历了激进化的过程,特别是在1987~1990年匈牙利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后阶段。在债务的压力下,这一整个时期经历了形形色色的紧缩政策,而强制实施和保持这种政策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变化。

### 一 对新经济体制的评判

80年代初,匈牙利经济学家的许多著作对1968年以来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变化做了对比鲜明的总结。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改革”的有影响的思潮,即一种有利于超越新经济体制缺陷的举措形成了——社

## 企业中的经济合同协会

1982年开始的经济合同协会是一些劳动者小组，这些劳动者为了完成一些特定的、与正常的活动不同的任务跟他们自己的企业签订合同，使用企业的设备和原材料。1985年，已经有这种组合13000个，有近170000人参加。

“经济合同协会是一种合法的手段，从政治上看也是合情合理的。领导者通过这种形式避开了由劳动力短缺、工资规章和法律保护的工人权力等方面原因所造成的阻力以便进行更有效的劳动分工。既然劳动者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应该坚守岗位，因此就有可能通过‘合同’给他们分配一些更加有效益的工作。再者，如果优秀的劳动者不能在官方的工资体制中得到回报，那么通过经济合同协会的合同，这种回报就成为可能。由于工人在合同方式下能比加班挣得更多，所以他们愿意合作，而他们到社会主义部门之外去寻找工作，则机会会更少。”

尽管党和工会的官员们传统上反对私有经营，特别是反对新经济体制，

担心他们的成员会转到非社会主义部门；但他们赞成经济合同协会，因为经济合同协会能提高大家的工资。“经济合同协会最终为劳动者提供了一个自治组织。当然是合法的方式，它们的职能是纯经济性的，但是它们组成了一种结构以便用它去直接与今天的领导者讨价还价以及在将来去抵御对它们的指责或那种取消它们的企图。就像70年代农民可以取消应交的税收那样，现在工人也有一种合法的工具以便在工业中提出他们的要求。因此，这就具有双重讽刺的意义，即在新经济体制的转变中曾经最活跃的力量看来在目前这个时期将推动经济合同协会的进一步扩大。”

资料来源：E. 科米索和 P. 马雷尔：《匈牙利改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收入 E. 科米索和 L. 泰森的《权力、目的和集体选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战略》，第 275~276 页，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

会政治的阻力及 70 年代反改革的冻结只是局部地表明了新体制混杂的和不足的特点。

匈牙利经济学家思考的中心议题是“参数调节”计划的失败。根据这种“参数调节”计划，中央应按照宏观经济的计划目标并运用间接的和统一的“经济手段”来指导企业的自主经营活动。事实上，尽管通过指令性计划对企业进行个性化的微观管理 1968 年后就已经取消，然而在实际中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形。改革之后，企业远没有独立于经济管理部门，从而服从（有管理的）市场的压力和原则，企业仍然首先取决于它们与上级机关的关系。根本的变化在于，金融和银行机构对企业的监督方面的作用增大，以及企业与管理部之间的讨价还价今后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物质目标方面，而且还涉及经营的货币条件方面（价格、税收、补贴、信贷……）。L. 安塔尔认为，“调节手段的支离破碎”导致了一种闻所未闻的“间接集中化”现象，它既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的集中化，也不同于非集中化的调节。亚诺什·科尔内认为，直接的政府协调并没有被市场的协调所取代，而是代之以“间接的政府协调”，表现为企业的“双重依赖关系”：既面对或许已被激活的市场，而且还面对在现实中仍占优势的行政部门，虽然它已经变得非常多元化。这种被 T. 鲍尔称之为“非计划非市场”的机制阻碍了在微观经济行为方面获得有管理的市场的预期效益，同时它也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宏观参数调节。

改革派经济学家在这场争论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对国家所有制进行变革的希望、各种利益团体的代表性以及寻找使它们调和的机制（这个问题显然是为了回应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 面对改革的失望

直至80年代中期，所有改革的尝试均起因于两种类型的不满：面对体制不合理运转的管理上的失望和在增长或外部形势方面的对结果的失望。

“经过近30年在经济体制方面几乎未曾中断的变化，对第三种类型失望的出现就不应该感到吃惊。经济学家同一般的公众舆论一样，对这样的一些改革也表示了他们的不满。深入研究显示，经济体制的变革往往都实施得比较仓促，而且随后就与起初改革的总体逻辑背道而驰。当微小的修正或无关的行动被当作改革进程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毫无疑问公众舆论往往被误导。90年代初，最普遍的感觉是所有为了市场社

会主义能够运转的设想都已经作了尝试，但是没有一项有成效。这就是促使执政党匈牙利社会党——它从1956年起统治匈牙利，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合法继承者——宣布赞成市场经济体制并将这个观点写进了匈牙利宪法的基本原因之一。”（1989年10月）修订后的宪法第9条规定，“匈牙利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它运用计划优势。在这种经济中，公有制和私有制具有同等的地位且享受同等的保护。”

资料来源：《1989~1990年欧洲经济概览》，第249页，纽约，（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90。

## 匈牙利式的工人自治

“百分之八十的国有企业均组织了工人委员会、全体大会或工人代表大会。虽然企业仍是国家财产，但却是这些机构在行使着所有权。然而，预期的效益并没有显示出来，这部分原因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工人所要求或承诺的，也没有促使他们朝这个方向努力。此外，在企业重组当中，党和工会操纵受益的工人，他们允许增加工人在收入方面的

利益，并允许将增加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以至于甚至一些有效的变革实施之后也并没有促进效率的提高。”

资料来源：M. 陶尔多什：《匈牙利经济改革的蓝皮书》，收入《欧洲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中的经济改革》，第38页，（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二 初次推进局部的改革

1979年和1980年两次价格改革实现了向1968年改革方向的回归，特别是将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联系起来以及在这方面采取更加灵活的做法。1981年，对福林实行单一的汇率取代了从前的三种汇率（官方、旅游、商务）；这样就为在1980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方便。1982年起，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私有部门的措施，使其得以加速增长：1988年，正式的私人经营活动在农业生产中占40%，在新住宅建设中占三分之二，在零售业中占12%，在餐饮业中占近30%，在卡车总数方面占10%。

80年代初，采取了许多组织措施。与70年代推行集中化的做法相反，实行了铲除托拉斯和分割大型企业的做法。然而，企业的强烈抵制使这一运动放慢。1981年，当时存在的三个产业部被撤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工业部，以便减少行业管理部门对企业日常经营的干扰。然而，企业对行政管理部门的依赖性仍然很强，因为（由于高度的集中化）企业的数量很少，使得单一部能够对它们保持一定的控制，还因为对企业来说在新的形势下，职能机构（财政部、国家银行、物价局）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1984年，中央委员会有关改革的决议一方面揭开了向1968年改革方向回归的序幕，而且还向前迈进了一步，例如制定了银行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表示要将政府与企业的职能明确地区分开来。为此，1984年大多数国有企业都采取了一些新的管理形式，以便在职工中培养一种“所有制意识”并减少行政管理部的影响。企业委员会由选举产生的（至少占50%）和领导部门指定的两部分成员组成，他们获得

## 银行领域变革的局限性

“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建立一种两级的银行体制对于提高金融体制的效率曾是大有希望的。然而，残留的限制、银行体制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并不允许这样做。建立和管理新银行的方式、商业银行的高度集中、储蓄银行没有进行改革并仍然与负有工业使命的银行机构相分离的情形、商业银行过分依赖中央银行的再投资、由商业银行接手的有价证券投资薄弱、单一货币和金融市场导致的竞争的缺乏、在储备方面谨慎的规定及高层的决定权、不利的宏

观经济环境以及国家发展研究所对企业提出的但不符合世界银行建议的几乎所有的投资计划的阻挠，所有这些造成了金融特别是银行体系明显地缺乏竞争性。新体制惟一不可争辩的成功之处是它的实施并没有严重地搅乱经济。”

资料来源：I. 塞凯利：《匈牙利金融体制的改革》，《欧洲经济》，1990年3月第43期，第121页。

## 改革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现存的经济管理体制与其说是组织了市场，不如说是取代了市场。由于缺少市场和有效的竞争（这就是说缺乏以赢利方式运转的巨大动力），经济表现出一种自给自足和浪费的征候，而且其自我调整既缓慢又困难。最初的想法是建立一种辅助计划的激励体制并运用一部分市场的力量。随后，我们确定了建立市场的目标，即一种以计划管理为主导的并由计划来组织的市场。今天，根本的问题是要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在竞争部门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能够实行一种以广泛市场调节为基础并与市场相

和谐的计划管理。为此目的，我们应该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环境：

——它把企业精神看作是一种基本价值；

——它的方向是走向成功，而不是去避免失败；

——它能够解决市场造成的冲突。”

资料来源：L. 安塔尔、L. 博克罗什、I. 奇洛格、L. 伦杰尔和 G. 毛托尔奇：《变化和改革》，《经济学报》，第38卷，1987年第3~4期，第196~197页。

了监督管理的权力和选举企业经理的权力。这种工人自治的形式很快在三分之二的企业中实施,但它在实际当中仍然流于形式。然而,它使经理们在与行政当局的讨价还价中增加了一些筹码。

### 三 银行和税收改革

正当匈牙利改革方针变得更加激进即向体制的解体迈进的时候,在激进改革未曾触及的领域即银行和税收方面开始了两个局部的改革。

1987年,单一银行制正式分成一种两级的体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1985年,国家银行在发放信贷方面的垄断就已取消:企业被允许相互间进行借贷或向个人借贷。根据1987年的决定,中央银行仍然是预算资金的提供者,它仍保留对金融过程的监督以及对外汇管理的垄断。因此,单一银行制只是削弱了,而不是被废除了。自1981年起,债券、股票、存款证书以及商业票据等各种金融工具出现了。因此,银行体制中那种家庭交易和企业交易之间的割裂状态已经受到质疑。

从1988年起,直到当时仍取决于行政部门或政府的税收法规,从今往后须提交议会批准。12%和20%这两种税率的增值税取代了对营业额征收的可变税。这种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大举措,它的目的是要对税收的作用给予准确的定位,间接地也是为了能够控制津贴。第二个革新:在同一年中出现了收入的渐进税(从对低于1987年平均收入64%的收入征收20%的税,到对超过1987年平均收入两倍者征收60%的税)。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增加预算收入以应付

## 企业数量的增加

1989年颁布的《转轨法》一方面允许国有企业转变成股份制公司以及部分或全部出售，另一方面，允许新公司的自发发展。这以后，在1989~1990年间，企业的数量实际上翻了一番。

经济生产单位的数量(以其末时间计算)

	1988	1989	1990
总数	10811	15169	29470
其中:股份公司数量	116	307	646
有限责任公司数量	451	4485	18317

## 可兑换性与浮动汇率

“在可兑换方面起初的一些尝试失败之后，匈牙利进口自由化问题（更准确地说：以可兑换外汇进行的进口）被搁置近20年之久。然而，到80年代末，问题重新出现，因为随着外国合资企业的扩大，利润返回投资国的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988年，同时决定逐步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减少对利润返回投资国的限制。1991年1月采取措

施之后，在有关进口和利润返回方面，现在福林已几乎完全可兑换了。匈牙利国家银行实行一项谨慎的浮动汇率政策，允许福林贬值以保持竞争力，但是它同时坚持保留汇率的惩戒职能。”

资料来源：《1990~1991年欧洲经济概览》，第162页。

不断增长的赤字，而且也是为了限制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在收入差距上的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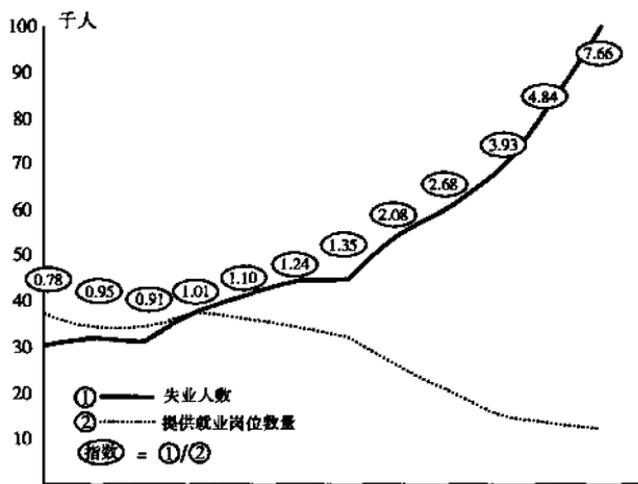
## 四 走向激进化

1987~1989年，即甚至在1990年春选举之后的体制改变之前，被认为是匈牙利历史转折的年代。这期间经济学家提出了体制解体的问题，同时执政的共产党经历了自我改革的过程。

1987年出现了一份由改革派经济学家集体(包括L.安塔尔)拟定的题为《转折与改革》的文件，它对思想和政治领域有深远的影响。这份文件从严厉批判当时的经济体制入手，为使经济向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过渡进行辩护，并认为这样做是走出滞胀和国家外贸失衡的唯一出路。文件的作者们坚持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包括在公共部门内部。他们提出了宏观经济的金融计划，其主要手法是调节货币的供应量作为全面管理的基本方法。人们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末体制过渡时期已认识到货币问题的重要性，同时还可以看到货币手段的影响不断加强。文件最后强调了经济改革的“政治方面的前提条件”：限制党的作用、加强民选机构和议会、集团及个人利益的代表制、有利于社会底层人员的社会政策。

同样在1987年，党和政府通过了一项更加明确地面向市场的“行动计划”。赞成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相当大的共识开始形成。特别是政治变革在内梅特政府时期(1988.11~1990.5)得到加速。从前镇压的受害者得到平反，通过了有关移民、侨民以及人权方面的一些新的

## 1990年就业的剪刀差



资料来源: G. 考尔多什:《匈牙利就业的阴云》,《东方国家通讯》,1991年4月第359期,第31页。

## 在工业部门中正式谈判的萌芽

“企业和上级部门(行业)的集体公约中的法律框架是存在的。它包括谈判和缔结协议的正式义务。但是谈判的基础条件和知识比较缺乏。这是一种分割的和非正式的讨价还价(运用罢工)、雇主的单方面决定、从前中央调节的残留内容以及那些规范工薪者与雇主关系的新规定等方面的自发结合。建立符合行业主义趋势的三方协商制度将政府、雇主和工薪者聚集在一起,这在目前来说是对全国情况的一种补充。所有职员

和雇主的职业组织在协商委员会中均有自己的代表。特别是,新老工会、工人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或多或少具有代表性并试图将请愿政策和战略目标结合起来组织代表了形形色色的不同利益。”

资料来源: J. 科尔塔伊:《令人心碎的史诗: 匈牙利结构调整与私有化的经济社会措施》,《经济与人文主义》,1991年4~6月第317期,第35页。

法律，与原先忌讳的国家（南朝鲜、南非、以色列、智利以及梵蒂冈）建立了外交关系。1989年夏，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这个时期也是东德人向西方大逃亡的开始（它很快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宪法方面进行了一些修改，并在1989年实行了多党制（1989年11月经匈牙利第一次全民公决批准，取消了前执政党在工作场所的活动）。

## 五 “转轨”与自发的私有化

1989年颁布的三个重要法律改变了企业的地位和所有制。1月1日生效的企业法允许公民成立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私人企业可以拥有多至500个员工。外国投资法保障外国企业的利益，允许它们部分或全部拥有匈牙利公司。1989年1月成立了一个社会保障基金来管理各种津贴（家庭津贴、退休金），就业基金开始发放失业救济金。3月份，新罢工法规定了解决劳资冲突的程序。

同年7月，《转轨法》允许企业委员会改变（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可以将它改变成公司，允许部分或全部出售给所有匈牙利或外国的购买者。在6个月时间内，由于这项规定（常常由于其变通作法），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国有部门成为受外国企业或本国个人（有时是被转轨企业的原经理）控制的企业；在旅游业和媒体方面这个转轨过程尤其迅速。为了使这次“自发的私有化”有条不紊地进行、保护国家利益、保持透明度、保护竞争和合理的价格，1990年2月成立了国有资产局。

## 匈牙利走向二元结构和行会主义？

“在实践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趋势是私有部门通过自身的力量迅速地扩大，即与私有化没有关系，以及国有企业向公司的转变（一般转变成股份公司），转变后公司的所有权都分散在众多国家机构当中。这两种趋势来自于经理们的创意。它们本身并不能为经济的根本调整、新市场的准入及有关企业的现代化提供手段。这样经济将逐渐向二元结构变化，即新建立的竞争性小企业

的私人部门与转变了的（越来越商业化的）国有部门相共存，而这种国有部门和国家结构关系密切并且将被逐步地私有化。这将成为行会经济结构形式的基础。”

资料来源：I. 格罗斯费尔德和，P. 黑尔：《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私有化》，收入《中东欧改革之路》，《欧洲经济》，特刊，1991年第2期，第141页。

## 成问题的国有企业管理重组

“当这两个国家（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希望加速摧毁国家所有制的时候，人们意识到，这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因此，问题是要知道在未来3年或4年以后如何去领导国有企业。将其与西方国有企业作类比，肯定是迷惑人的。在建立已久的市场环境中，在国家所有制仅占经济活动的一小部分的情况下去管理几个大企业与在发展中的市场环境中管理几十或几百个这类企业（占总产值的70~80%），两者情况完全不

同。这两个国家从前为了经济独立和财政纪律（或硬性预算约束）所进行的呼吁以及必须通过行政意志将它们强加给国有企业的做法并没有取得成效。毫无疑问，将企业转变成股份公司的法律活动也不足以改变这种形势。直至今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均没有对这个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

资料来源：《1990-1991年欧洲经济概览》，第160页。

## 六 安托尔政府

1990年3~4月选举之后，组成了由民主论坛负责人约瑟夫·安托尔领导的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该右翼政党与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那些更有社会民主倾向而且非常赞同经济自由化的自由民主党派的联盟成为反对派，它们批评经济变革的速度太慢。在第二轮立法选举、特别是在秋天的地方选举中的高弃权率表明了民众对政府支持的局限性。

在《国家复兴计划》中，政府规定的目标是要建立以私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穷人及社会底层人员建立社会保障。1990年，形形色色的计划次第登场，但今年经济不景气，国民生产总值降低了5%，物价上涨35%。与苏联和前经互会国家贸易的急剧下降幸亏得到向西方出口的急速增长的补偿。私有部门发展非常快，至于外国在匈牙利的投资，是这部分欧洲地区中最多的。

在调节方式方面的变化也显现出来了。根据1987年以来推行的季度调查，从1989年下半年起，工业企业的经理们从今开始更多的是担心找不到订货而不是担心原材料供应不足：这标志着从一种受资源约束的经济过渡到一种受需求约束的经济。同样在1989年，劳动力市场也从短缺走向失业，1990年失业人数增加了3倍（1991年，失业从占就业人口的2%增加到7%）。

## 七 私有化的问题

虽然自由主义的反对派批评政府优柔寡断，但是安托尔政府仍非

## 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长期共存

“我认为，在今后的20年中，我们应该依靠二元经济，这种经济10年前或20年前就已经在匈牙利出现，并且它拥有两个组成部分：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首先，我们只能逐渐地减少国有部门，因此我们应该努力使其更加有效率，但是不要抱幻想。不存在神奇的疗法能将它转变成一种真正的企业体制。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国有企业将保留许多消极的特点。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实行严格的财政纪律及通过议会的适当监督以便为减少这些消极特点而斗争。我们应该避免国有部门汲取过度的资源从而损害私有部门的利益。”

“私有部门的运行条件应该以协调

的方式自由化，强加在它身上的官僚主义限制应该废除。我们需要用适当的货币和税收手段来推动私有经济迅速和蓬勃地发展。但是我们不应该幻想，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渐进的和漫长的发展过程。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关系将继续向着有利于私有部门的方向发展（会尽可能快地，让我们期待着吧），但是两个部门仍将长期共存。虽然充满冲突和摩擦，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共存是不可能避免的。”

资料来源：J. 科尔内：《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匈牙利典型》，第98页，加利马出版社，1990。

常重视私有化的问题，它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采用配股的办法进行私有化的计划是不现实的。它把希望寄托于企业原经理、上升的资产阶级或外国投资者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购买企业。预定的目标是要在3~5年内将50~60%的国有部门私有化。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1991年4月通过了一项归还原先被共产主义制度没收的财产的法律。有两部分人能够直接收回自己的财产：教会，如果收回的建筑能用于宗教目的；农民，如果他们承诺5年中能够自己种植所涉及的土地（50公顷为限）。对于其他情况，国家将发给补偿债券，这种债券以后可以出售或者换成私有化企业的股票。

对于这种“大私有化”，政府决定运用各种方法。国家通过分批挑选公司的方式，逐渐将大企业推向证券市场出售。1990年底进行了第一批20家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的私有化。其他企业的私有化已在计划之中，但是当进行到收益欠佳的公司的时候，出现困难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企业可以自己与国内和国外的购买者制定它们自己的私有化计划：这是自主的私有化或“自发的私有化”的继续，但它必须获得国有资产局的同意。最后，个人或集体以及企业也可以购买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局审查并批准每个建议，如果得到肯定的答复，购买者能够获得一笔优惠贷款。

1990年6月布达佩斯交易所的重新开张被认为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进入新时期的标志。在华沙，新的交易所（按照里昂交易所的模式组建）座落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原址上，其象征意义更加强烈。……然而，不论波兰还是匈牙利（它自1982年起开办债券市场），其成交的证券种类及交易量都非常有限。一个真正的资本市场只能循序渐进地发展。

## 1989年两德的比较

	西 德	东 德	占西德的百分比
人口(百万)	61.7	16.6	26.9
就业人口(百万)	29.7	9	30.3
国内生产总值(10亿马克)	2237	280	12.5
劳动生产率(千马克/人)	81.0	36.1	44.5
生产资本(10亿马克)	4314	1100	25.5
资本密集度(千马克/人)	156	122	78.3
年度工资总数(千马克/人)	40.8	13.2	32.0

资料来源: H. 哈拉斯蒂和 J. 勒德莫:《德国统一的宏观经济后果》,《国际未来经济》,1990年第三季度第43期,第93页。

## 联盟条约

“1990年5月18日两德的财政部长签署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条约规定了自7月1日起东德经济将进行根本的和几乎瞬间的结构转变。最惊人的变化是西德马克将根据工资、退休金、存款或企业债务等情况以不同兑换率替代东德马克。联邦德国中央银行成为惟一负责信贷政策的银行,因此它获得所有的货币权力。私有制和企业自由成为经济的主要动力。价格形成已经自

由,工业品和农业食品的补贴将在短期内取消。最后,民主德国应该使其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全部法律适应西德整套的立法和欧共体的规定,为加入这一组织作准备。”

资料来源: V. 莱内:《民主德国年表》,收入《1989~1990年东部的动荡》,《文献摘要与研究》,1990年第4920~4921期,第201页。

## 从民主德国到五个新州 (1990 ~ 1991)

1990年德国的统一对于前民主德国无论从背景还是从时间来说,都是一次绝无仅有的体制解体。但是,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两种体制之间的过渡的基本内容都可以在这段特别的历史中看到:体制的变革、宏观经济问题、社会经济转变及心理和行为适应。德国的演变过程受到邻国密切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强大的新德国在地区中的巨大影响力,而且因为体制变革中所遇到的问题的相似性,仅有的细微差别是其他国家不能得到那些决定性的优势,比如从前联邦德国获得预算拨款、“现成的”体制框架以及长期磨合而来的行政管理等等。

### 一 迈向统一

从1989年11月9日推倒柏林墙,到1990年7月1日联邦德国和

## 1990年的五个冲击

“东德企业承受多方面的冲击：

——首先是与新的竞争条件相联系的供给冲击：西德和其他地方的产品涌入市场并与当地产品进行竞争；

——随后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的需求冲击：消费者和企业有步骤地放弃前民德产品转向西方产品，所以造成了国内市场的真正崩溃；

——第三是心理冲击：工人和干部中的大多数迷失方向，不知道应采用什么对策，他们缺乏动力，劳动生产率也受影响；失业和不稳定则具有雪上加霜

的作用；

——第四是财政冲击：7月2日货币联盟之后，企业遇到许多重大的财政问题，因为今后向供应商付款和支付工资都要用西德马克；

——第五是外部冲击：东部市场部分地崩溃了，1991年危险将更加严重。”

资料来源：I. 萨姆松《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货币的暴力》，《经济与人文主义》，1991年4~6月第317期，第56页。

### 统一初期有限的通货膨胀影响

“与波兰和南斯拉夫相比，原东德通货膨胀直至1990年春均得到抑制。持久的需求过剩反映在强迫储蓄上。为了保持低廉和稳定的物价而采取的大量补贴掩盖了通货膨胀。作为物价指数组成部分的众多产品在商店里却买不到。对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有一种长期积累的巨大需求。根据官方统计，当局至少是直至1988年仍在总体上保持了国有部门的预算平衡。”

“1990年7月1日实行的经济货币联盟完全改变了经济的根本参数……”

“原则上，它与波兰和南斯拉夫采取的措施比较相象。采用西德马克等于

用储备货币来替代本国货币，但是东德的情况是兑换率一经确定后就无法变更了。一些人担心，东德马克以高兑换率换取西德马克会引起德国通货膨胀上升，但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货币‘超值’并不明显地非常高。长久积累的对西方产品的需求由于西德生产的增加以及通过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而得到了满足。”

资料来源：《1990~1991年欧洲经济概览》，第141页。

民主德国完成经济、社会和货币联盟，这一连串出奇的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内部因素：80年代经济困难的加剧和上升、反对派的加强、西德模式的强大压力，这些内部因素又与外部因素结合在一起：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导致体制不断受到孤立、波兰与匈牙利的迅猛变化……。移民潮及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出现导致了昂纳克辞职并象征性地打开了柏林墙。

在德国统一问题的争论中，民主德国的各政治派别以及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均对迅速的统一过程持强烈的保留态度。社会民主党害怕会给东部经济带来非常消极的后果。德意志联邦银行采取更加保留的态度。但是科尔宣扬的加速统一的政策以及在民主德国1990年3月18日选举中保守派的获胜（德国联盟得票占48%），加上苏联等捍卫柏林地位的四强国的最终同意，都使得统一的进程不可逆转。东德一些民主派别提倡的“第三条道路”或渐进式过渡的计划很快就被遗忘了。

历史在1990年加快了步伐。7月1日两德间实现了经济和货币联盟；西德马克取代了东德马克，对工资以及4000马克以下的储蓄以1:1比率兑换，对于其余储蓄及企业债务则以1:2比率兑换。德意志联邦银行成为全德的货币管理机构。政治联盟紧随其后：10月3日东部的州承认波恩的宪法；在12月2日全德国的选举中，大多数东部的德国人投票支持科尔领导的联合政府。

在体制方面，德国统一的首要结果是在前民主德国几乎迅速地扩展了前西德有关制度、行政、预算和法律方面的框架，即经受考验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形式。

## 对货币联盟的苛刻评价

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 K. 珀尔不赞成两德在 1990 年进行迅速的货币统一,而是倾向于东德货币逐渐地向可兑换货币过渡。但是德意志银行不得不屈从于科尔强加的迅速统一的政治逻辑。“大爆炸”之后不到 8 个月,珀尔先生在欧洲议会经济委员会提及两德间货币联盟时表示:“货币联盟为我们在欧洲应该有所不为提供了一个例子。”

他指责德国政府“实际上未作任何准备、未能作目标的修正而且以一种不恰当的兑换率一夜之间在东德采用了西德马克。后果是灾难性的。这我并不吃惊,因为这种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资料来源: L. 罗森茨魏希:《珀尔先生的讲话及其后果》,《世界报》,1991 年 3 月 21 日。

## 社会联盟的原则

“民主德国采纳了西德劳动法的一些大原则:结社自由、工资谈判的自主权、罢工权、共同管理及保护劳动者免受解雇。与西德相似的、首先以分摊额为基础的社会救济体制建立起来了。

——7 月 1 日生效的就业政策法建立了失业补偿制,失业者可获得失业前净工资 63% 的津贴(有小孩负担的为 68%),每月收入的保障金为 495 马克。300 万份退休金将调整到最后工作收入的 70% 水平。他们未来的购买力也得到了保证。

——对培训的特别努力达成共识。像联邦德国一样,轮换培训的二元体制在民主德国经受了考验。尽管总的技术水平是令人满意的,但在许多部门还需要再培训。此外,应该建立一种新的体制,以便代替目前与(私有化过程中的)国有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种

培训体制。工作的重点是放在专业资格方面而不是解雇方面。进一步扩大运用部分失业的激励作用,同时实施一项广泛的培训计划。分配的条件直到 1991 年 7 月为止均与联邦德国的规定相抵触。

——为了保证合适的补助金水平、使新生的失业保险体制能够运转,有必要进行一些资金的转移。关于社会保险体制,规定按照联邦德国的比率并根据工资收入来征收分摊额。然而,鉴于新收入与支出的差距以及体制初期的不平衡情况,联邦德国帮助民主德国负担失业及养老保险的支出。”

资料来源: O. 帕塞:《东德》,收入 J. - P. 菲图西编辑的《在欧洲的东部》,第 88 页,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1990。

## 二 宏观经济的冲击

前民主德国的人口大约为前联邦德国的四分之一，其产值为前联邦德国的十分之一。前民主德国的生产率则是前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在它的对外贸易中有一半是与经互会进行的。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当中，其货币的兑换率为4个东德马克兑换1个西德马克。

科尔总理决定以1比1的比率实行货币统一，这等于东德马克大幅度的升值。科尔的基本目的是要扼制住从东德向西德的移民潮（没有忘记对东部民众给予现金方面的选举支持）。1990年7月，东德与西德的物价趋向一致（房租与服务业除外，这两方面的开放被推迟到1991和1992年）。企业今后得用西德马克支付工资及供应商。东部的工资名义上大致相当于西部工资水平的三分之一，但是在下半年就迅速攀升到50%左右。这种开放对企业的打击是巨大的，实行这种兑换率对企业来说就等于竞争力和收益的极度滑坡。衰退是突然的，而且由于消费者转而购买西德产品而造成国内市场的收缩以及由于经互会的取消（前经互会成员间的贸易转入到用外汇结算）而造成与东方邻国贸易的减少都加剧了经济的衰退。专家们对这次强烈的但历时短暂的危机早有预见，但是衰退的强烈程度及持续的长度则出乎许多专家的意料之外。在东部衰退的同时，西部则出现初始阶段的飞跃发展。

## 三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从失业的数字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7月起就业状况开始急剧恶化：对于某一限定的时期来说，“技术失业”是与企业困难的财政

## 1990 的年失业爆炸

	失 业	技术失业	就业岗位
2 月	15000	-	156000
3 月	38000	-	98000
4 月	65000	-	74000
5 月	100000	-	54000
6 月	152000	-	38000
7 月	272017	656277	27700
8 月	361286	1499872	20426
9 月	444846	1728749	18700
10 月	537799	1767034	23900
11 月	589200	1830000	23781
12 月	642200	1795300	22600

资料来源: F. 巴富瓦尔:《东德的失业》,《柏林目瞭望台通讯》,1991年5月第5期,第23~24页。

## 收入: 反常的逻辑

“根据东柏林 I.A.W. 研究所对企业的调查,在 5 个“新州”中,1991 年初的工资水平均达到原西德各州的 51%,其中领导干部及受过高等教育者仅达到三分之一,而工人和职员则达到 60~65%。提高工资并没有使东德与西德之间达到平衡,因为这个现象更多是长期积累而来的,所以远没有达到稳定。在西部,事实上,实际工资仍乘势在继续增长(1990 年增长 7.5%),因为,由于每小时生产率的提高(增长 2.9%)和单位工资成本的增长(2.6%)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3.5%)要慢,这使得利润继续增长(总量增加 9.7%)并增加了就

业。”

“相反地,在前民主德国,工资的增长进一步损害了企业的竞争力,加剧了就业不足。就像消费行为一样,收入的这种变化明显地属于一种经济的集体自杀行为。但是,人们无法指责东部德国人的举止荒唐,他们只是适应了统一的逻辑:在单一的马克区内,东部的收入应向高处调整,因为否则的话,劳动力就会向西部流动。”

资料来源:《德国经济观察》,收入《经济问题》,1991年5月29日,第18页。

状况或暂时的结构调整相一致的：进入这一层次的大部分劳动者实际上是真正的失业者或者至少是推迟的失业者。1990年，前民主德国的失业人数从无到有达到200万人。1991年8月，有100万人失业，140万人技术失业，36万人提前退休，26万人在公共部门从事临时工作。前联邦德国的救济措施开始实施。

东德原先的官方工会被解散，西部的工会被移植到东部。这些工会希望放慢移民速度以避免东部德国最年轻、最优秀的劳动力走失殆尽并给西部工资带来重负，因此它们的目标就是要使东部赶上西部的工资水平，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一些人预计在90年代中期能够达到。然而，在与东部生产率的变化不发生关联的情况下逐渐消除德国两部分的工资差距，显然将在短期内加重这个地区工业的困难。由于东部基础设施状况比较差致使西部德国的投资在初期行动迟缓，因而不能补偿东德大量的——比预料还要多的——废弃资本。

#### 四 返还与私有化

将被共产党体制收归国有的财产返还给原来的所有者的原则，首先是出于政治原因的一种决策，它在前东德造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有超过100万个以上的返还请求提交上来，包括1972年被国有化的12000个中小企业的原所有者的请求。此外，地方当局提出了16000项有关面包店、电影院、住房和土地等方面变更所有权的请求。司法部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及不熟悉西德法律，因此被这些申请弄得焦头烂额。由于所有权造成的不稳定状况，特别是有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使西部潜在的投资放慢了脚步。

国有部门的私有化是统一进程的基本方面。1990年，成立托管局，并宣布它为东德所有国有部门（企业、土地和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其任务就是将这些部门卖给国内或国外的买主。该机构控制的8000家工业企业（联合企业分裂后则达10000多家）均被改造成股份公司。

托管局处于体制转变的中心，其有争议的历史（一位负责人被谋杀）包括好几个阶段。它的控制权从东德特权阶层的原成员（由于英特饭店私有化丑闻而很快信誉扫地）转移到西德雇主代表的手中。赋予托管局的任务是对企业进行私有化并进行结构调整。对于私有化之前是否要进行结构调整的问题争论比较激烈。实际上，从1991年起托管局就开始只从事私有化的工作而放弃了对企业的整顿。起初托管局在私有化方面进展缓慢，受到了批评，因而它加快了私有化进度：1991年8月，3000多家企业被出售。商店和饭馆的“小私有化”进展尤其迅速，而与此同时，在手工业和商业领域许多新的（中小型）私人企业建立起来。

与中欧邻国不同，在东德私有化运动之前，由于德国的统一而在东德建立了资本市场，从而就方便了私有化的进程。统一的德国也并未受缺乏私人储蓄之苦。

德国领导人不断推迟对东部经济复苏的预期时间，到1991年夏他们似乎又变得对1992年充满乐观情绪。在南方和新兴的工业国家这两个极端之间，东部德国未来将定位在何处？

## 结 论

从50年代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浪接一浪。面对体制发展过程中的内外部压力,改革不断重复着,甚至带有周期的特点,它表明了对源于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进行调整的种种尝试。从定义上看,它不触及由国家所有制和一党制两方面组成的体制基石,而是探索在集中计划管理方面及体制复合体外围要素方面(农业、对外关系、私有部门及企业的组织)的各种变革。改革的摸索实践根据国家以及非主流的经济思想的自主程度而表现出强度的不同,它逐步反映出传统模式刻板的情况以及相应的行为和发展风格的惰性。阻碍经济增长的体制特征被越来越明确地指出来了。然而,甚至激进的改革者们直至80年代大危机之时,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有能力改善其运行和业绩,而且更多的人则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具有最大的优越性。体制的悲观主义情绪以及转而向资本主义制度寻找出路,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得比较晚。

## 一 变化的三个时期

50~60年代,经济增长比较快,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看法仍然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呈现出强烈的两极分化的特点,第一次体制调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这种调整包括传统结构内部的“完善”和重组,有时还允许进行明显的变革,比如像东德那样。根本的问题是通过扩大作为管理等级制度中的下级单位的企业的决策自主权,从而改善集中化的管理。在探索计划管理更好的成功指标的同时,人们也在思考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问题。但是,即使在改革的努力能够持续数年的情况下,由于经常存在周期性的短缺压力,体制调整也未能从本质上改变经济行为和调节方式。

至于激进的改革,它的目的不是要使可使其软化的体制的基石而首先是要使计划管理领域发生重大的变化。分析体制的相关性以便进行修改在这里更加深刻,但是乐观主义仍然占上风。对比明显的模式已经削弱,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协调的方式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的观点出现了。人们观察到一种从理论上将资本主义与市场区别开来的努力,以便使市场在社会主义中具有某种合法性,即让市场作为微观经济调节的机制,但仍然受宏观经济计划方针的规范。

未被突然中断的激进改革,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带来了体制方面的深刻变化,走出了传统体制并出现了一种“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轨迹:首先是匈牙利,70年代修改过的体制并没有回到老路上,但仍然受到零星的再度集中化的局限,最终未能实现迅速的调整以便能够面对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冲突。因此

80年代过渡到体制解体,这种解体甚至在1990年前就已经开始。南斯拉夫或中国说明了第二种轨迹。在这两个国家中,激进的改革产生过累积起来的体制不稳定的影响,在前者造成了向某种形式的解体过渡,在后者则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激进改革之后的经济体制在行为和发展方式方面仍然带有传统模式的一些特点。然而,某些方面还是有些变化的。广泛的积累和短缺的调节有所减轻。自给自足的方针有所改变。一些传统调节中没有的现象更多地出现了:公开的通货膨胀,甚至失业(比如在南斯拉夫,随后在中国)。一种混合的调节制度看来已经产生,但是在此过程中宏观经济不稳定的趋势或早或晚也会跟着出现。

激进改革的成效果表明,与固有的观念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改革的。然而,在东欧和苏联,不管改革与否,面对80年代那种苏联模式的体制本身固有的特殊形式的短缺滞胀的大危机,社会主义经济就显得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体制和结构调整。

于是改革的思想便开始了大转弯:社会主义失败的论调开始抬头,向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转变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这是一种向对比模式的回归和向区别两大体制的所有制标准至上的回归。但是它们的作用已完全不同:对社会主义是体制悲观主义占上风,对资本主义是乐观主义占上风。资本主义被等同于“市场经济”,认为它是一种合理的、正常的模式,是新型的后社会主义经济在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同时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社会主义解体将通向一种“市场的民主”,它是获得繁荣和现代化的保证。

## 二 思想平衡器

当前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与开始时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有着令人痛心的对称性。作为其基础的简单化和幼稚病通常来自对发达的西方经济本质和历史的不正确观念。西方经济不是由自我调节运转得很好的市场机制产生的。它更不是由一只神圣的看不见的手操纵的。西方各种资本主义体制均拥有错综复杂的协调机制，而在这些机制中，机构、组织或各种各样的——变动的——协议支撑和规范着各种市场。从广义上讲，国家在其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当然各国情形不尽相同，但国家在公共管理、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方面则起着根本的作用。即使不算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部门，所有制的组织方式——特别是资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关系——也比较复杂，而且一国跟另一国的情况或者不同时期的情况差别也很大。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看，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批评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与历史的思想平衡器所产生的虚假对称不同，这种批评并没有为极端的经济自由化摇旗呐喊，而这种极端的经济自由化却往往会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中开花结果。

## 三 转轨的赌注

现实地去选择一种先进的和复杂的经济，无疑应现存的或潜在的各种资本主义模式之间进行，而不应该在资本主义和其他一种或几种体制之间进行。至于自由主义的方法，它是百分之二百不现实的。由于它持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单一自我调节机制之上的片面观点，因而

低估了资本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它往往看不到制度转轨所特有的那些替代方法、选择以及困境。由于所追求的理想模式的不现实，它还常常忽视了历史的作用以及在后社会主义背景下“建设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特殊问题。最后这一点特别在国有财产的私有化问题上反映出来，这种私有化被设计成是取代所有者家长制和缺乏效率管理的灵丹妙药，所有者将积极地监督经理们以便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而也是效率的最大化。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迅速地和有效地将占工业四分之三以上的国有部门私有化，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一致的（缺乏所有者的动机、开始时存款不足、许多部门中利润期望值低，……）。因此，根本的和更加现实的做法是在长时间内仍将起重要作用的国有部门的内部集中精力进行管理方式及投资方式的变革，而不是首先去关心那些能够尽快放宽国家控制的私有化方法。

在后社会主义时期，新自由主义的危险表现在许多方面：不仅任保护主义、力求迅速实现货币的可兑换性、拒绝实施调整那些被认为国家干预太强的工业结构的政策。但是最令人担忧的无疑是对社会的忽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几十年中特别是在近 10 年中经受了巨大的困难。过渡的社会成本将会十分沉重，而且在这方面仅仅信赖市场是容易产生错觉的。再者，稳定和合法的过渡进程也可能受到中期无法容忍的社会紧张压力的威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建设在匈牙利或波兰等国家已经取得进展，因为在 80 年代末之前曾受到挫折，这就要求要更加积极地去探寻社会妥协以便使体制的转轨走上积极的道路。

#### 四 失败的本质

经济改革过程中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呢？社会主义体制在历史上

曾显示出它的活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它的可改革性。它的历史性失败归根结蒂在于不能克服大危机，不像“传统的”资本主义那样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许多次危机，虽说真的并非不存在动荡。这种调整的失败，根本原因之一是由政治体制和所有制结构而造成的体制僵化及“自下而上的”体制或组织革新的冻结。这种迭瓦状的体制基石表明，政治变革日趋激进以至于对一党制提出质疑，对体制的解体具有强烈的影响。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未曾触及现存的政治组织，体制调整和激进改革一样，实际上对变革并因此对真正积极的变化保持了一种根本的限制。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即苏联模式）的对立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左右着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今天的历史已经偏离这个中心，有关经济体制的思考缩小到对各种形式的“传统”资本主义。然而思考的范围仍相当广阔，在传统体制、改革后的体制或者正在变化的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中通过比较所吸取的教训，必然会对欧洲和世界所面临的新时代的社会经济思考产生持久的影响。

## 后 记

这本书的写作是1991年完成的，那个时候中欧的后社会主义转变刚刚进行了两年时间；苏联帝国的转变则刚刚开始，它的分裂始于1991年12月。7年以后，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变化是巨大的，而且前后对比极其明显。本书是以1992年原文为底本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写这篇后记的目的就是要简明扼要地介绍在90年代这个关键性的10年当中所发生的变化并提出有关走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经验的一些思考。

在本书中，我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即认为可以将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体制的一个家族来分析（这种论证方式对资本主义也同样适用），这个家族中的各种体制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巨大的历史多样性。后社会主义的转变一般地可以被理解为从社会主义家族过渡到资本主义家族。

在这里，需要分别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最抽象或最普遍的是促

使社会主义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同道路或宽阔大道这一层次。当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突然破裂或逐渐碎裂的时候，一种经济就进入这样一条共同的宽阔大道。政治支柱（一党制）的断裂是我们在1989年的中欧或1991年的苏联看到的体制解体的第一条道路。今天我要补充一种假设，由于非国有的所有制形式的扩大而使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这一支柱逐步缩小，这就是中国、越南采取的比较渐进的体制解体的第二条道路。

对第二层次即中间层次的分析将区别体制转变的各种不同轨迹，即在后社会主义演变的宽阔大道的一般轮廓中，以分类的方式将所有具备相似变化特点的国家集中在一起。从90年代的历史中可以清楚地归纳出三种轨迹：中欧道路、后苏联道路和亚洲道路（如果我们假设将亚洲道路纳入到后社会主义这个发展方向的话）。终于到最后一个层次的分析，它是更加具体的、符合后社会主义转变中各国特定情形的分析，在这里，各国的情况由于经济、制度、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原因而表现得千差万别。

## 中欧道路和后苏联道路

这两条各具风格的道路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采取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出乎意料的严重的经济萧条。这两点使它们与亚洲道路区别开来。

当中欧共产党体制崩溃的时候，新自由主义观点，虽然有争论，但从几年前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支配地位。通过批评凯恩斯的

涉主义、拒绝混合经济以及相信市场的合理性，这种自由主义观点还反映在“华盛顿谅解”当中，即主张发展中国家中的债务国必须以自由化、私有化和非干预手段作为结构调整和紧缩计划的措施，以便制止通货膨胀和恢复预算平衡。

在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政府的压力下并出于对学术的信心及政治策略的原因，大多数后共产党政府都采取和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战略，这种战略具体表现为一些“稳定”和“自由主义”的类似措施。稳定措施表现为波兰(或稍后的俄国)的“休克疗法”或者表现为一种比较渐进的方式，它的内容包括一些传统的措施如开放价格、本国货币贬值、对外开放(货币的可兑换性)、控制工资、严格限制信贷、取消国家对企业和对基本消费品的补贴；其优先的目标是恢复预算平衡并控制可怕的通货膨胀。

制度变革是要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变革的形式是多样的，而那时占支配地位的方针是优先注意速度：迅速改变法律框架，迅速改变经济、财政和财务标准以及劳动力的调节。但是对于开始时国有部门占据几乎所有工业和银行部门的经济来说，重点的领域仍然是私有化。

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的信心，至少是对中欧国家来说，在开始时由于重返欧洲的共同惬意心情而得到加强，这意味着实施这些方针就能迅速对这些国家经济中的畸形生产结构进行强有力的调整而使经济平衡发展，从而赶上和融入统一的欧洲。

但是所有这些经济在几个星期内就从社会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发

展到另一种类型的危机。这种危机带有特殊的病理,特别是短缺(包括劳动力短缺、因而几乎是充分就业),它的特点是国民生产急剧下降和失业上升。这种“转变中的衰退”出乎意料的严重性和所持续的时间马上引起了争论:主导方法的支持者从中看到了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性。而批评者则指出广泛的调整准确地说是由于选择了有争议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效果可惜与以前观察到的效果相似,例如在拉美。

中欧后社会主义衰退的一般特点为,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在2~4年中下降20~30%)、工业生产更大幅度下降、投资减少、实际工资缩减、失业大量涌现以及虽然趋于下降但仍然处于高水平的通货膨胀。至于制度的转变,它比预先设想的要更复杂、冲突更多而且实施的时间更长。这种转变的实际结果和大众私有化的尝试一样,通常是双重的或甚至是反常的(比如捷克共和国,特别是俄国的情形)。

开始时的惬意情绪很快就转变成失望的情绪。但是与起初的担心相反,中欧的社会紧张状况并没有发展成重大的冲突,而是反映在选举当中,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国家政府更迭相当频繁。多党的民主体制正在巩固,特别是通过政治联盟的交替方式,但是俄国却不是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新自由主义的方针将成为90年代的主要方向,虽然这种方针正在缓和、正在发生细微的变化,同时受各国政治背景的影响从而给实用主义留出了更大的空间。

## 走出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遗产

中欧的后社会主义各国的转变遵循一条与前苏联经济明显不同

的轨迹。实际上,在大多数前苏联国家的经济中,特别是俄国,萧条以累积的方式延续着,呈现一些病态的形式:巨大的通货膨胀、内外债增加、货币危机、拖欠情况普遍(税、银行贷款、以及工资)、金融不稳定、预算危机。相反地,中欧各国经济从1994或1995年起虽然增长比较弱,但明显地表现出重新走上了实际增长之路。特别是,尽管新自由主义的华丽词藻和当前动荡的严重紧张关系,新兴的民主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的体制变革的导航方面仍能保持着某种能力和某种真正的合法性。中欧与后苏联的变化的对比关系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那些波罗的海国家与中欧各国的道路比较接近,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代表了一种中间道路,但这种对比从整体上说还是可行的。

下表反映了在1990~1997年间几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萧条和复苏的变化概况。我们看到,只有波兰一个国家在1997年达到和超过其1989年的产值,而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国 家	GNP下降的 总年份	1990~93年 GNP年平均 增长率(%)	1994~97年 GNP年平均 增长率(%)	1990~97年 GNP年平均 增长率(%)	1997年GNP (1989=100)
保加利亚	6	-7.4	-3.6	-5.5	62.8
匈牙利	4	-4.8	2.5	-1.1	90.4
波兰	2	-3.1	6.3	1.6	111.8
捷克	3	-4.3	3.6	-0.4	95.8
罗马尼亚	4	-6.4	2.1	-2.2	82.4
俄国	7	-10.1	-5.3	-7.7	52.2
斯洛文尼亚	3	-3.9	4.0	0.0	99.3
斯洛伐克	4	-6.8	6.3	-0.3	95.6

资料来源:G. 科洛德科:《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几乎变成不相关的……》,《传轨》,1998年6月第九卷第三期,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利则接近 1989 年的水平；与此相对照，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近一半。

## 社会经济状况

中欧各国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的危机的特点以及走出后社会主义危机的特点可以这样来总结。就业在各地均有很大的缩减，但是，比生产的下降要少一些。根据国家的不同，失业从无到有，迅速扩大到 10~15% 左右（捷克共和国除外，它的失业率低于 6%），随着经济的复苏，失业率却仍然稳定在这一水平上（1997 年，匈牙利失业率为 10.4%，波兰为 10.5%，斯洛伐克为 12.5%，保加利亚为 13.7%）。从今往后，其平均水平与欧洲联盟接近，也就是说高失业率。

随着生产的下降、失业的上升（和大量就业人口脱离劳动）、价格的上涨及社会迁移的减少，生活水平也开始下降。收入和财富不均等的增长在各处都能看到，此外还有新贫困人口的增加并根据社会群体和地区情况分布差别很大。这些倾向对许多社会群体来说反映了后社会主义阶段的严酷性，然而与俄国或前苏联国家相比，这些趋势在中欧仍相对比较和缓。对这些方面进行准确的测算是困难的，何况人口中的一大部分人仍在寻求通过非正式的经济来源以减少官方经济给收入带来的损失。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未曾意料到的反常现象：未登记的经营在后社会主义经济中一般比 1989 年前表现得更加普遍。当短缺造成了社会主义著名的“副业”的时候，正如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向非正式经济过渡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税（不应该将非正式经济局限为犯罪经济，因为犯罪经济在中欧虽然在扩大，但没有达到俄国那样广

泛的程度)。

平均实际收入经过初期的下降之后，到 90 年代末回到了或稍微超过了 1989 年的水平。虽然对这方面的变化进行测算是困难的，这种变化又很不平衡，而且消费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却发现与起初希望迅速赶上西欧繁荣的愿望相比还存在差距，而这种繁荣确实常常被理想化了。

## 生产体制和企业的调整

大多数中欧国家的生产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接近欧洲联盟中等规模的结构。农业、尤其是工业在国民生产和就业中所占份额减少，而服务业所占的份额有显著的提高。这种后社会主义的非工业化涉及一部分以前时代遗留下来的陈旧的重工业，然而中欧各国仍然存在向一种不利的专业化发展的危险或者那种将这些经济保持在那种西欧边缘地位的危险，而在本世纪前 50 年中，这种地位是大多数国家本身所固有的。

各国生产体制的调整也以充满活力的私有小企业的巨大发展为形式，这种发展通常表现在服务业。此外，经互会崩溃之后该区域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开始的时候出现大量缩减，造成了经济萧条，但这种缩减却由于跟欧洲联盟国家贸易的上升而得到补偿。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匈牙利、捷克和波兰。

经过起初的经济萧条、迅速向外部竞争开放及严厉的缩减政府补

贴等之后,许多前社会主义企业在开始时候陷入严峻的财政困境。许多企业停止偿还贷款或货款,并推迟支付税款(但是90年代俄国经济中典型的推迟支付工资的做法并没有在中欧发生)。因此,负债在开始时迅速增加,特别是“企业间借贷”的增加,使得政府有必要实行债务调整计划从而使新的银行制度变得脆弱。因此,企业在一种完全动荡和极度变化的环境下实施各种防守型或进攻型的调整战略。这种新型管理的成效很大程度上根据企业、行业、地区和国家情况而有相当大的区别。它也会由于私有化的程序及由此而产生的所有制的新结构而有所区别,然而私有化与调整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和单一的联系。只有外国投资方面明显地显示出这种相关性。总的情况仍然是企业内部构造及其经营方面通常发生渐进的和深刻的重组,以及各国生产体制轮廓中显示出一些变化。

但是,社会主义遗产的问题,今天虽然已经不像90年代初那样尖锐,却一直存在着。税收纪律并非始终严厉,银行与金融体制不稳固,国家的家长制并完全没有消失,贪污腐化仍然存在。与建立良好的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文化从定义上看仍比较缺乏,因此不仅在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下或在更加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力的力量关系的那种新自由主义方法所赋予的功绩的压力下,而且还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但常常是干预主义并对实施方面比较有能力的国家的压力下,许多经济主体的学艺过程往往极其迅速。

## 成问题的私有化

私有化的总结一般都突出工作的成绩,它往往通过私有部门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因此，欧洲重建与开发银行（EBRD）1997年对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估算为75%，对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估算为70%，波兰为65%，罗马尼亚为60%。但是这种测算是迷惑人的，因为公有与私有的界限可能很难确定，而且这种测算所涉及的各国情况千差万别。

在开始的时候，私有化的任务很广泛。对于国有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各国政府在开始时优先采取这种或那种的方法，但是归根结底大多数国家采取了传统销售、向职工或领导干部出售及在相当大范围内发行股票这种大众私有化等方面的混合办法。匈牙利特别为向外国投资者的销售提供了便利；捷克（及开始时的斯洛伐克）通过私有化证券的办法实行了大众私有化，而波兰则对经理和职工的购买给予优惠，并在晚些时候对有限的一部分国有部门实现了大众私有化。

总的情况是对比鲜明的，并依照国家不同而有所变化。真正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协调和再分配方式及其对应症的深刻决裂，在各地均已完成，即使在许多方面还可以感觉到社会主义遗产的影响。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新问题是与以金融为主导的并处于全球一体化趋势中的当代各种资本主义形式相联系的。但是这些新问题也带有后社会主义的独特内容，这在整个地区都能看到，当然各国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公有部门的数量仍然很大，它以直接的方式或者以国家广泛参与许多企业的私有化的方式存在。许多混合的或不确定的形式来自所有制的错综复杂的特点，而私有化的政治进程和复杂的法律进程中各种角色——原经理、银行、私有化基金、外国投资者、各种各样的机构投

资者、政府机构——的战略造成了所有制的这种特点。所瞄准的模式，即根据“企业化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那种以股东决定经理的人选及经理领导职工的权力作为效率保证的模式还远没有实现。各国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倒不如说是经理式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经理的影响力非常大。90年代末，如果中欧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未对作为与旧的社会主义体制决裂的基本要素的私有化的必要性提出疑义，人们期待通过私有化在效率的提高、透明度及促进增长（有时促进平等）等方面会带来的立竿见影的好处看来很难达到。与如此广泛的进程相联系的困难，由于伴随着重大政治和结构的后果，所以，对它的评估将以一种更加审慎的和实际的方式进行。

## 中欧后社会主义家族中的各种资本主义

中欧各国的经济代表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在那里，人们既可以看到那些导致新体制一致性的共同倾向，也可以看到那些相反地保持或甚至加强各国本身制度形态和发展方式的独特性。

这个地区各国经济的共同特点首先与它们的后社会主义特征有关，其中一些情况前面已提到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重建与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也为这种稳定和调整道路的相似性做出了贡献。然而，使它们接近的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各个政府都希望尽早加入欧洲联盟。这种对加入欧盟的一致愿望可以看作是在政治方面和在经济与社会方面中欧各国转变的轨迹的一个基本因素。

但是，不同的因素仍然在起作用，因为人们预想的作为社会主义

本利相关结果的“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出现。在“转轨”开始阶段，各种社会有不同的制度遗产和集体政治的记忆——我们只是将1989年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进行比较。1989年以来相继出现的政治联盟的特殊性也使各国的道路相互区别，即使经济战略一般地仍保留了前面讨论过的那些大方向。各国的外部影响同样起着这种区别的作用，有时使前共产主义体制的联系恢复生气。最后，西方资本主义或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多种多样，尽管有全球化的划一做法，但对它们的模仿需要每个社会作出特别的调整和消化，以及需要在制度方面进行特殊的修修补补，而这种修补一直是对那个时代“好模式”的模仿方面众多历史经验中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这些相互矛盾的趋势的结果是各国形成了不同的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就像欧洲联盟的各种资本主义在目前问题成堆的统一进程之外，均保持着它们在制度、政治、社会和民族方面的特殊性那样。后社会主义的家族氛围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它仍将持续下去。中欧漫长历史的特殊性是否更具约束力？尽管有这些沉重的遗产，但是经济的历史将是开放的历史。

### 三种典型的发展轨迹

像下面对照表显示的那样，三个相互依存的基本要素将前面提到的三条中间道路（中欧道路、后苏联道路和亚洲道路）区别开来：第一是走出社会主义体制的方式，即制度基石破裂和分解的形式和在体制转变过程中政治制度变化的特点；第二是在变革进

## 后社会主义转变的典型轨迹

	中欧道路	后苏联道路	亚洲道路
走出社会主义的方式 (制度基石的分解)	突然的决裂(政治支柱的破坏)	突然的决裂(政治支柱的破坏)	渐进的变化(所有制支柱的腐蚀、思想的妥协)
政治的发展	民主的巩固、联盟的更迭	表面的民主	带有非正式的多元化因素的专制政体(一党制)
政府的合法性	较强	弱	相当强
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税收能力	较强	弱、地区分割	相当强,尽管存在贪污和地方分割的倾向
正式的新规则(法律)	较严厉	软弱	有限的形式主义,但规则比较严厉
政治精英与经济领导层的关系	明显的分化	紧密联系	紧密联系,局部分化
经济的私有化	较快、相对合理	相当迅速(俄国),不太合理	“非国有”形式渐进的和强烈的扩张,这种“非国有”形式并非指严格意义上的私有
社会保障	社会化(从企业迅速外部化)	在大企业中高度内部化	在大企业中内部化,渐进的外部化
宏观经济的增长	3~5年的经济萧条之后(国民生产下降1/4或1/3)出现明显但脆弱的增长	持久和累积的经济萧条(国民生产下降一半)	经济持久的和可持续的增长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压力(10年多时间国民生产翻两番或3番)
失业	稳定在10~15%	少(小于10%)并在不断增加,但统计不完善	少,在增加;农村严重的隐性失业;统计不完善

程中国家的经济角色和国家干预的形式；第三是宏观经济的大趋势。中欧轨迹的特点是政治决裂和在政治更迭基础上稳定的民主、强大的合法性和国家行政管理能力、在经过几年的经济萧条之后紧接着出现经济明显的增长。后苏联轨迹的特点是政治体制的决裂并伴随着政治精英的继续和成问题的或表面的民主化、脆弱的合法性、国家的行政

管理危机及预算危机、累积的及持久的经济萧条。亚洲轨迹表现为一种渐进的和内生的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体制形式上仍继续存在，尽管贪污日益严重，但是国家仍然坚强有力并具有相对的合法性、经济高速增长并伴随着循环的通货膨胀压力。

如果大家进行更具体或更深入一层的分析，即对各国体制变革道路的分析，那么就可以看到在同一种轨迹的内部也有相当大的区别。因此，例如捷克共和国从1992~1998年没有发生政治更迭、保持了民主制度的稳定；在捷克，广泛的大众私有化进行得比较早（中欧独一无二的情况）；与邻国不同，捷克的失业率比较低……

## 再谈国家

国家结构、职能和干预的转变是体制变革问题和进程的核心。继承下来的分析性的划分如国家与平民社会的波兰方案或者借用的划分，如正规经济理论中的国家与市场的两论法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些极化的模式将问题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国家就像平民社会一样在姗姗来迟的社会主义中充满内部冲突，并与国家和平民社会的对立交织在一起。对于波兰团结工会的反对运动，这种描述是有效的，但在共产主义制度结束之后，它就成为现实地认识后社会主义的社会划分的一种障碍。至于那种将国家干预和市场的失败（反之亦然）进行比较的理论，它将经济空间分割成两个交替的次空间，而国家和市场在历史上和逻辑上确实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

在与经济的关系中国家可以有三种不同的作用：国家作为立法

者、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国家作为协调者。其中的每一种作用在后社会主义转变当中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缩减。国家作为立法者在开始几年中极其活跃，它在从事制度和正式规则的改造，特别是那些规范市场的扩大和使市场更广泛的自我调节作用成为可能的规则。同时，国家作为经济主体与国家作为政治阵地的联系也发生了变化。国家作为所有者在广泛的经济私有化中经历了最明显的退缩，然而国家所有制的退缩并不一定意味着私有制的扩大，而经常出现是许多混合类型和多种错综复杂的所有制形式，其中公有与私有的界线并没有适当规定。最后，国家作为协调者已经从直接或间接的微观调节，即从作为社会主义特点的任意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中退出来，但同时可以看到它在宏观调节中的作用和职责得到了扩大并变得更加复杂。在国家与经济关系中由三个角色实际的变化而产生的各种局势，与总的政治阵地的变化和国家内部冲突的变化有关，它们是“转轨”中各国轨迹的基本因素或者从更集中的层次上看，是前面已经加以区别的三条理想类型道路的基本因素。

更一般地说，国家的问题在解释后社会主义体制变化中是中心问题。它对关心经济、制度和历史之间关系的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 参考书目

J. 亚当,《60年代以来苏联与东欧的经济改革》,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9年。

J-C. 阿瑟兰,《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和利润》,巴黎,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1981年。

I. 贝伦德,《1953~1988年匈牙利经济改革》,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W. 布鲁斯,《1945~1985年东欧经济史》,巴黎,发现出版社,1986年。

W. 布鲁斯和 K. 拉斯基,《从马克思到市场:探寻一种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9年。

B. 夏旺斯,《苏联经济体制: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纳唐出版社,1989年。

E. 卡德尔,《社会主义体制中社会所有制的矛盾》,巴黎,昂托博出版社,1976年。

J. 科尔内,《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匈牙利典型》,巴黎,伽利玛尔出版社,1990年。

M. 莱温,《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暗流:从布哈林到现代的改革者》,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年。

E. 佩里和 C. 王,《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改革政治经济学》,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

G. 罗兰,《苏联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巴黎,拉尔玛唐出版社,1989年。

J. 沙毕尔,《发动的经济:苏联类型经济的论文》,巴黎,发现出版社,1990年。

O. 锡克,《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布拉格,科学院出版社,1967年。

孙冶方,《中国的社会需求与经济效益》,阿蒙克(纽约),夏普出版社,1984年。

L. 巴尔采罗维奇,《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转变》,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出版社,1995年。

世界银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华盛顿特区,1996年。

I. 贝伦德,《1944~1993年中欧与东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

W. 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社,1972年。

B. 夏旺斯,《社会主义体制的最后阶段:危机、改革与转变》,巴黎,拉尔玛唐出版社,1994年。

B. 夏旺斯,《从社会主义改革到后社会主义转变:从比较角度看中国》,《当代马克思》,1997年第22期。

R. 德洛尔姆,《在新东方:制度变革与经济转变》,巴黎,拉尔玛唐出版社,1996年。

J. 科尔内,《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2年。

B. 麦考密克和 J. 昂格尔,《社会主义之后的中国:沿着东欧或者东亚的足迹?》,阿蒙克(纽约),夏普出版社,1996年。

B. 诺顿,《走出计划:1978~1993年中国经济改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

V. 尼和 D. 斯塔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建:东欧与中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年。

A. 诺夫,《苏联经济史》,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69年。

A. 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伦敦,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83年。

J. 沙毕尔,《俄国的混乱》,巴黎,发现出版社,1996年。

L. 绍穆埃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初始模式》,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社,1974年。

A. 沃尔德,《共产主义国家的愁容:中国和匈牙利政治痼疾的经济根源》,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

S. 泽齐尼,《经济转轨的教训:90年代的中欧和东欧》,经合组织,1997年。

Barnard Chavance

Les réformes économiques à l'Est de 1950 aux années 1990

Edition Nathan 1994.

---

根据法国纳唐出版社 1994 年版译出

· 世界经济论坛 ·

## 东方的经济改革

——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



著 者：[法] 贝尔纳·夏旺斯

译 者：吴波龙

责任编辑：冯韵文

责任校对：杨 雪

责任印制：盖永东

---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科技印刷厂

---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7.25

字 数：181 千字

版 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 - 3000

---

ISBN 7 - 80149 - 127 - 0/F·037

定价：12.8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1999 - 1572 号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H** 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未来



2022年第4期 49-60 定价：3.00元